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书友驿站品书香



主持人絮语

图书是一个人们乐意谈论的永恒且深远的话题，从古籍到新著，从版本到装帧，从书人到书事……，人们对于购书、读书、藏书津津乐道。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中，书籍代代相传，谈读书的文章也是绵绵不断。然而，品味读书、谈论图书真正走向社会，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还是本世纪的事。这其中，报刊的出现起着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本世纪初，《读书杂志》、《读书月刊》等图书导读杂志纷纷面世，许多报纸增加了读书副刊，如《新华日报》于1942年9月21日创办了“书评专页”。这样，谈论读书的文章接触了万千读者，读书品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事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图书导读书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兴盛期，几乎所有大报都增加了读书类副刊。《北京日报》的“读书”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86年创立的。十余年，我们始终坚持“读书版是广大读者的读书版”这一宗旨，以为读者服务为最高目标，因而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

随着电话的普及和通讯事业的发展，人类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交流更趋便利。因此，在1992年，《北京日报》“读书”版新增了“书友热线”这一栏目，向全社会公布了热线电话。一时间，编辑部铃声不断，有时一天甚至可以接到上百个电话。热线开通为我们和读者联系架设了一座新的桥梁，视野得以开阔，可以更加真切地倾听读者的心声，进一步明确办报的思路。我们许多约稿的思路就是在热线中获得的。“读书”版为读者导航，而读者则可以通过热线为报人导航。可以说，电话热线这种形式为读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讲，这是通讯科技与图书文化的一种结合，它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读书观念。

电话热线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它折射着人们在人生天地中的种种心态，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目前各类电话热线很多，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生热线夺标》丛书的策划者赵卜慧女士、王红旗先生慧眼独具，捕捉到了这种新事物，并且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是难能可贵的。书友热线是报纸上的一个读书沙龙，也是报纸上的一座书友驿站。它映射着人们的读书需要，映射着全社会的读书氛围，也是一定时期全社会读书状况的一种侧面反映。“书友热线”有幸被列入这套丛书，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朋友一点启迪。

曾有人这样说过：尊书爱书、读书藏书是人类文化的天性之一。中国是一个图书的大国，也是一个读书的大国。季羨林先生认为，中国的“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然而“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在市场大潮涌动的当下，读书更成为紧张节奏的人们们的精神家园，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讲的：“读书，可以使人增加智慧，可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读书，还可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使人们不至于沉没于低级的趣味中，而达到精神的升华。”读书可以给人以新知、更可以给人以良好的心境。社会越进步，经济越发展，我们会更加意识到，或许我们逐步远离了“书中自有……”的读书兴味，也并不刻意追求读书致仕，但是我们却越来越离不开书籍了。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

愿“书友热线”永远成为我们和读者朋友联系的纽带，愿更多的朋友能在书友驿站中做客。让我们为营造良好的读书风气，建造一个书香社会而努力。

《北京日报》书友热线专栏主持
1998年元月

编辑心语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在生活、学习、求职和就业等方面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心理压力，随之而带来的，是人们心灵的疲惫、情感的困惑以及对健康的生理需求、对诸多问题难以言表的苦衷……。怎么办？他们的心灵需要抚慰，他们的困惑需要倾诉。面对这一系列现实而深刻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人们做了许多解疑、解惑的尝试，其目的无外乎是激励人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时刻保持身心健康和心理平衡，学会自我调节，轻轻松松地适应社会，面对人生。

近年来，“热线电话”作为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解惑答疑的交流方式，愈来愈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它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这种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等现代化传播媒体的交流方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们的社会心态，而且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课题。

《人生热线夺标》丛书的选题策划，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想法和现实需求而产生的。这套以反映社会、关注人生为主题的《人生热线夺标》丛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贴近人们的生活，从不同侧面反映现代社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们生活和心理需求，借助目前广泛流行的电视、广播、报纸等“电话热线”这一特殊的现代化传播手段，在人们之间架起一座心理沟通的桥梁。

就编辑近几年收集和掌握的大量源自报刊、电视、广播等有关热线专题信息及资料，精心策划，并组织国内颇有影响的“热线电话”栏目主持对其热线加以分类、整理、加工，冠以立意新颖的书名，汇集成《人生热线夺标》系列丛书。我们将陆续推出丛书系列——

- 1.《敞开名人的心扉》——“文化名人热线”
- 2.《天地之间有杆秤》——“律苑咨询热线”
- 3.《只缘身在此山中》——“婚恋热线”
- 4.《书友驿站品书香》——“书友热线”
- 5.《心有灵犀一点通》——“儿童咨询热线”
- 6.《少年壮志不言愁》——“小记者热线”
- 7.《欲知仙源何处寻》——“旅游专家热线”
- 8.《精心呵护保平安》——“汽车俱乐部”
- 9.《牵挂你的人是我》——“妇女健康热线”
- 10.《拨开心灵的迷雾》——“心理健康咨询热线”
- 11.《世界需要热心肠》——“生活帮助热线”
- 12.《天生我材必有用》——“劳动热线”

……

这套丛书即可为困惑时的良师之友，又可为奋进中的精神快餐，也可为劳作后的休闲佳作。

相信，随着我国通讯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家用电话的普及，“热线电话”必将日益更加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并得到运用，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在未来的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998 年 10 月

润物细无声（代序）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颇具特色的丛书《人生热线夺标》。这套丛书收录与记述的是：近年来国内多家传媒开设热线电话，倾听群众的心声，解答人们的种种疑问，与受众进行快速及时的对话等内容。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主办者嘱我为序。我想这多半还是出自我曾参与过热线电话值班的缘故。

1996年夏天，应《北京晚报》之邀，我到晚报编辑部参加了一次文化名人热线值班活动。我那次接电话约一个多小时，与热情的读者和观众朋友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能直接与这么多陌生的朋友互致问候，对他们的关心鼓励表示感谢，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38年了，还从没有过在工作时段内与这么多的观众朋友进行这么长时间对话的经历。我所工作的岗位是如今备受瞩目的大众传媒。无论我主观上如何想去贴近受众，愿更热情、更亲切、更曲尽入微地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带来愉悦；愿与我的观众朋友建立情感纽带；希望能直接与他们进行心灵的交流。但却总仿佛隔了一层屏障，因为在广播时，他们能看到我，我其实看不到他们。尽管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已培育出我的主持人职业意识，那些在心中时时刻刻装着观众，但毕竟，他们对我的声音耳熟能详，而我却不可能在工作场所听到他们想要说的话。这就是一名在大众传媒中为受众服务人员的实际状况。尽管大众传播方式很难实施即刻的双向交流，但这种大众传播方式，在信息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因为它可以起到发布政令、传递信息，从而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动员大众，形成合力，步调一致地去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的作用。1998年夏天，我国发生特大的洪涝灾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我们英雄的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同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让世人看到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伟大的抗洪精神。电台、电视、报纸、刊物等大众传媒所发挥的作用家喻户晓，功不可没。据调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收视率这期间高达87%。1998年夏季的每一天，全国各族人民在电视机前，都会被英雄军民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从而产生与抗洪一线军民心心相连的情感并迅速有效地以各种方式支援灾区的父老乡亲。可见，大众传媒在今天已成了公众不可须臾或缺的亲密伴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人类社会，每个个体还会有自己内心的倾诉愿望。大众传媒可以做到我说你听，尽量满足受众“倾听”的愿望，却还不能做到更普遍、更直接地满足人们“倾诉”的要求。同时这种“倾诉”要求一旦能实现还会迫切需要回应，也就是能及时交换信息、交流体验，使人与人之间能更细腻地理解、沟通，进而得到安抚，感到温暖和爱心关怀，觉得四海之内皆兄弟，永不孤单。人最怕孤独和寂寞，而今在社会飞速发展之际，个人的倾诉愿望是十分迫切的。寻求理解，寻求友谊几乎是每个人的内心愿望，人们还希望表述自己对某种事物的喜、怒、哀、乐，愿意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甚至小小的发明创造介绍给大家，使得周围的人能共享自己劳动的欢乐。同时，他们又面临各不相同的问题，急需有人为他（她）指点迷津，获得同情与帮助。而大众传媒的传播模式不可能满足大众广泛对话的需求。幸喜，热线电话这个新兴形式出现了，尽管出现的时间不久，但已受到

了人们的关注，并引起热情反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独具慧眼，抓住这个热点，把当前电话热线所取得的反响与实际编辑成书，让更多的人对这一新生事物有所了解，也忠实地记录下这个时代中人们的一种真实心声。因此，这套丛书不仅有满足群众需求的功能，同时具有很强的史料性，能为当今以及今后研究大众心理与时代信息的专家、学者提供各种实例。

譬如，热线电话的出现，标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通讯手段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几年，中国通讯事业的发展速度令全世界震惊。记得我 1979 年第一次到美国时，看到他们几乎家家有电话，亲友之间如果愿意甚至可以天天互通电话，我当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也过于奢侈了。因为，那时中国老百姓家里有私人电话的简直凤毛麟角。那时有一个统计数字，说纽约一个城市的电话比中国全国的所有电话拥有的数量多得多。当我坐在他们的汽车中，第一次看到他们用车载电话一边开车一边通话时，我觉得这简直是一种科幻现象。然而曾几何时，中国老百姓家庭拥有电话的比例在城市中已占 20% 以上，手提移动电话几年时间有了几千万台。改革开放把任何人间奇迹都带给了我们。如果没有现今人们拥有的电话数量，怎么可能会出现热线电话这种事物呢？人们如今可以通过电话达到亲情、友情的沟通，通过电话可以求学、求知，通过电话可以经商，可以解决人生的种种需求，现在人们还可以用自己的电话与大众传媒沟通。而且更多的人能够达到带有普遍性的，不属于个人隐私的提问与回答。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本丛书中可以了解到由于电话网络与各种大众传媒的日益密切的沟通，在 90 年代已形成了热线电话的初步格局。过去大众传媒也不断接到观众的电话，但大都是提意见、提建议和有关求医问药之类的事情，而随着电话的普及，传媒已注意并开始了大众传播与私人电话的“接轨”、“联网”。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就设有观众热线，大家随时可以打电话提要求，甚至点节目。有人问，那是假的吧？为什么我总打不进去？假倒不假，只是观众人数太多了，不可能大家都打得进来，不过，这足以说明传媒已经注意到及时地与观众个人直接对话。近年来，各地电台热线电话节目已成了固定重点栏目。这次出版的本套《人生热线夺标》丛书先推出几个独立成篇的单行本。如《北京晚报》的文化名人热线，记述了文化界知名人士与晚报读者，就大家关心的、有兴趣的话题，进行问答与交流，对双方都大有好处，加深了文化界的人士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使观众与文化界名人之间多了沟通的渠道；在本丛书第一批书目中的婚恋热线《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定会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家庭观念以及婚恋观念面临着考验，而且牵涉的面也广，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对公民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幸莫大焉。结婚登记在哪儿办理？需要什么手续？分居多长时间算“自动离婚”？离婚后，一方单位分配的住房，另一方有权居住吗？什么是财产所有权？“不正当竞争行为”指什么？对商品质量有疑问到哪鉴定？怎样请律师？请什么样的律师？你会写举报信吗？……相信这些法律常识与法律问题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律苑咨询热线《天地之间有杆秤》就是为大家解决这方面疑问的一本书。

总之，这些丛书的内容丰富，问题从群众中来所以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上述的一些内容，正是近年来热线电话兴起带来的林林总总的群众十分关心的话题的集采与精选而形成的。

解决大家的问题，并从公众所普遍存在的求知现象、求知内容中了解社会大众的心理，了解当今社会存在的，尚不能全部纳入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的种种现象，是每位社会学工作者的责任，面对如此丰富的社会心态与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势必会引发我们学者的研究热情。因此，本丛书可以做到雅俗共赏。

总之，大众传媒适合向公众发布信息，而电话热线恰恰为公众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方便，两者结合，不仅形成了双向交流，而且能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这就类似于 1+1 不单单等于 2，而要大于 2 的系统论的核心内容一样。大众传媒与电话热线将会在日益沟通、联网中，发挥出更大的教育、鼓舞、团结人的社会效益。

倾听与倾诉更畅通，这不单单表现在科学进步与物质的丰富，还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畅所欲言，互相帮助，沟通情感，共同进步，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民主化的标志。然而任何一个社会，没有法制将不能真正地发展民主。因而，畅所欲言，是遵循法制理念进行的符合全社会利益的行为。

《北京晚报》文化名人热线开通以来，并没有出现过令人难堪的提问，这就说明大家的文化意识在提高，文明程度在提高，表现出公众善良的愿望与热心。

“良言一句三冬暖”，世界需要热心肠。热线应当传达温暖的心情与善良的愿望。现代化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文明的昌盛，已经越来越使得全世界的人们不论在天之涯，地之角都可以共享全球信息，同唱一首歌，同听一支曲。在这各种潮流中让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更亲切、更和睦吧，让我们更同心同德地去接受挑战，迎接美好的未来吧，让电话热线的两端，喁喁而谈，绵绵不断，让杜甫那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的温存的春雨不仅滋润蜀中的鲜花、芳草，也滋润我们每个人的心田。

谢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了这套雅俗共赏、耐人寻味的《人生热线夺标》丛书，谢谢各位读者。

赵忠祥

书友驿站品书香

体味旧书的风尘——说说淘旧书

徐 雁

逛书摊，买旧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究竟如何解决喜欢买旧书但又怕旧书不卫生这个矛盾呢？

首先，“逛书摊，买旧书”，是人生一种很高尚很值得鼓励和发展的雅好。所谓的“新书”、“旧书”之别，只有对出版营销商来说才具有实际上的意义。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没有读过的书，永远都是新书”，应该成为我们读书生活中不可变易的理念。我相信，你在书摊上“淘”来的书中，有多半是属于这一类的“新书”罢！

北京有一位“自打9岁那年随父亲第一回走进东安市场旧书店的门，就算与旧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书迷朋友叫王晓建。他曾经把“几年来收集的数十篇关于旧书店的文章”，编成一部《逛旧书店淘旧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9月版）的书。在这部共有56篇访书随笔、凡15万字的集子里，朱自清、戴望舒、叶灵凤、周作人、郑振铎、阿英、黄裳、梁永、施蛰存、姜德明、陈平原等现当代的爱书藏书家，都纷纷记录下了自己对旧书店、旧书摊、旧书业的怀忆和留恋，内容还涉及香港、巴黎、纽约、东京、牛津等地，可读性极强。这部书可以作为你发展“淘旧书”爱好的一种精神上的凭藉。

其次，要想说明，“淘”来的“旧书”尽管在内容上对于你可能是“新”的，然而，它的外在形式无疑可能是很陈旧乃至破烂的，积尘很多。当然这首先是一种岁月的积淀，在图书流传的过程中，时间和环境为它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风尘”。你假如有机会到图书馆的线装书库（古籍书库）中参观的话，你会感慨，自己所能够搜集到的“旧书”，还远远没有“旧”到“位”哪！

所谓的旧书不卫生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好解决的。假如是封面磨损破旧乃至有所玷污的话，对于纸面平装本，你可以用牛皮纸为它重装一个封皮，过去的许多藏书家都有此习惯，而且不以为苦。著名作家孙犁在70年代一段时间内，就曾“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书衣文录》序）在孙犁那儿，为旧书包“书衣”不仅成为为“旧书换新颜”的一种手段，而且实际上成为他重温旧书后写作题跋的一种载体。可见平常的“包书”小事，在有心人那儿，就可以使“旧貌换颜”和“温故知新”一举而两得，既解决了收藏旧书的卫生问题，又从中获取了阅读乃至写作的契机。

古籍是最怕蠹鱼的（俗称“书鱼子”），所以古人有在农历六月六“曝书”的习俗。连皇史宬也有每年在此日晒帝王“实录”和“御制文集”的业务。宋代司马光则在每年“上伏和重阳间，视天气晴明，设几案于当日所，厕群书其上，以暴其脑”，所以，他的“读书堂”内的藏书，一度保存得相当好。如今，现代印刷的图书已经引不起“书鱼子”来啃食的胃口。但是在阳光下，用右手握着书背，对着左手掌拍打拍打刚刚收集来的或入藏已久的旧书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至少可以让你在翻阅的过程中，少受些微尘的侵害，

而且假如有小生物寄生其间的话，通过这样的办法，也可以略作驱除。

总之，只要爱好读书就免不了同“旧书”打交道，但只要做个有心人，防微杜渐，“治书有术”，那么，“旧书”给你心灵上带来的效益，将远远多于它对你的身体所可能造成的危害。

书籍不是无声无感的东西——谈谈“影响书目”

徐 雁

自从 1966 年前，美国文学评论家考利同史密斯在其合著的《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之中，公布了一份由当时美国教育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者和讲演宣传家等知名人士共同选出的“影响美国文化的 20 本书”目录后，这种选书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注意和欢迎。发展到今日，已足以成为一种称为“影响书目”的新的书目类型而同“推荐书目”、“导读书目”并称于目录学科。

对于读书人来说，中外作家和学者百余年来所留下来的“影响书目”，应该说是我们了解先贤们“读什么书”的最佳依据。所谓“名人影响书目”，就是指社会知名人士依据图书对自己人生道路走向的作用程度，而有目的地遴选出来的图书文献目录。其中如“影响梁实秋的 8 本书”、“影响刘绍棠最大的 3 本书”、“影响叶永烈的 1 本书”等等，往往具有深厚的个案意义，显示了被影响者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研究其文学道路和学术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8 年前，《北京日报·读书》的编者曾约请作家端木蕻良、哲学家宠朴、戏曲史专家翁偶虹等八九位社会名流，自选对其发生重要影响的书目，在读者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在 1891 年曾应俄国圣彼得堡一家出版社的要求开列过一份书单，他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各个时期对他发生有影响的书籍，列举了如童年时代的《圣经》、《一千零一夜》、普希金的《拿破仑》等，14—20 岁时期的卢梭《忏悔录》、果戈里《死魂灵》等，20—35 岁期间的雨果《巴黎圣母院》等，35—50 岁阶段的《奥德赛》、《伊利亚特》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等，50—63 岁的各种福音书和《创世纪》等，并在叙述具体一种书对自己的影响所在时，还常常缀以“影响极大”、“影响巨大”之类的结语，以表明该书对其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的“重要影响度”。萧乾先生在文章中就毫不掩饰他对托翁这份“影响书目”的喜爱。

假如说，一部好书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某个阶段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书籍，就可能成为“一种极有力量的工具与武器，其动力有时强大到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于是有了“震撼世界的 10 本书”、“影响世界历史的 10 本书”、“改变世界的 16 本书”、“影响历史进程的 100 本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书籍绝不是无声无感的东西，而常常是具有‘动力’的，足以转变历史进行的方向——有时候是往好处变，有时候是朝坏处变。”

怎样才算最好的读者

王建辉

优秀的作品需要有优秀的读者。能读书看报虽可以称之为读者，却未必是好读者。

那么——

能读书读报，便可以称之为读者，这是不错的。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文品有上中下的区别，读品则也有上中下的分野。

不过，读品之上中下之分，不单在阅读对象上来分档次，即不仅是由所读作品的档次来分高下。诚然，能阅读钱钟书的《管锥编》，可以说是一个高档次的读者，但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和最好的读者；也不能说阅读金庸《鹿鼎记》的便是一个低档次的读者。阅读对象的不同至多只能反映各人阅读趣味的不同，而阅读趣味固然可以说是读者素质的反映，但对于衡量一个好的读者来说，则不是主要的依据。

读品有上中下的分野，也不只是说某某读书得法，懂得读书的方法。读书得法是一个会读书的读者，但“会读书”是否就是一个好读者，还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个中学生或许也很会读书，但他只是会读课本，也许真正意义上的书对于他还很陌生。会读书还不是自觉的读者，他可能还停留在自在阶段。会读书也就是会在图书上圈圈点点，勾勾画划，这只是好的读者的初级阶段或技术层次。

懂得鉴赏，是比会读书更进了一层的，但还不是好的读者。诚然，好的读者必须会鉴赏，但不能说会鉴赏就是好的读者，这个反推不成立。如同 $2 + 2 = 4$ ，但不能说 4 必定只是 $2 + 2$ 之和。

最好的读者不一定是评论家，评论家则有可能是最好的读者，但最好的读者更可能在人民之中，是无名的读者，是隐藏的高士，是躬耕南阳的诸葛。正是这些淹没在读者之海的最好的读者往往是写作者的真正知音。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读者？

如同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需要有一个综合国力作为标准才算全面，好的和最好的读者的衡量标准也是一个可供自测的综合阅读力。其内容主要有三：一，好的和最好的读者至少是用心在读的，古语所谓“眼到，心到”；二，真正地读懂作品，用张载的话说是，“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用朱熹的话说是使其言皆出于吾之言，“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用现代汉语说则是真正发掘出作品的内涵，知晓作者的心曲，是作者的知音，并且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提供对作品的一种理解认知和理解认识方式。从这一点看，高山流水的故事很有典型性，钟子期是俞伯牙最好的读者。三，在不离原作原旨的前提下去进行新的并非自以为是的发现和印证，发现一般读者发现不了的意蕴和世界，并且通过自己的阅读发现，参与作品的再创造，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并且能够将所阅读所理解所发现化为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思想。南宋有位学者陈善把这三方面的意思略略地说到了：“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此语对我们理解综合阅读力或有裨益。综观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说自己便是好的和最好的读者。因为许多宝贵的东

西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往往轻易地放过了，流失了，我们没有得到，而且我们也很少能成为作者的真正知音。正是在最好的读者这一点上，我们才真正感觉到读书之难。我们往往只不过比最坏的和最蹩脚的读者强些许。最坏的读者与最好的读者造成相反，是那些误解与误读，附会穿凿，强作解人的读者。

杰出的作品需要有杰出的读者，起码也需要有好的和最好的读者。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或学者，往往都“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陈寅恪语）。依此而言，我们多的是芸芸学子，而少的是真正好的和最好的读者。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学会作一个最好的读者。而作为一个好的读者也正是要努力把握“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英国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艾略特曾说：“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一个时代有许多读者，而是每个时代都有几个高质量的读者。”高质量的读者也就是最好的读者。这就把最好的读者的意义说到了极致。除了引述他的话之外，我想补充的只是：一部学术史文化史文明史，是由好的写作和好的阅读共同构成的，是创作史和阅读史的共生。最好的读者同样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一个坐标。如果缺少这样的悟性高、根器大的读者，便如同缺少天才的著作一样，结果只能是悲哀的。

《管锥编》是一部怎样的书

周振甫

有不少读者希望了解该书的基本情况。为此该书责任编辑、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撰写此稿。

1979年，钱钟书先生的四册巨著，一百多万字的《管锥编》（后来又加上一册，成为五册）出版了。这部巨著分析评价了十部古籍中的问题：《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以上属于经部）、《史记会注考证》（属于史部）、《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以上子部）、《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上集部），包括了旧图书分类的经、史、子、集即文、史、哲三部分。钱先生以淹博的学识，通过对十部古籍中问题的评价，旁征博引，书中征引到西方学者和作者多达千人，七种语言的著作达一千八百种之多，又囊括了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致力于探讨中西作者普遍的诗心与文心。钱先生称引西方哲学家的治学：“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管锥编》1251页）。这话可以用来说明钱先生的著作。《管锥编》的著作，在中华历史上是“四人帮”横行的艰危时期。钱先生在刻画屈原不忍去国的心事时，称“眷恋宗帮，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纍臣”（《管锥编》597页），抒发了钱先生和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事，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书中，仅谈艺部分有重大发现可视作定律的论述不下百十则（见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钱钟书研究》第一辑）。

钱先生在《管锥编》里，结合十部古籍，分别标列781小标题，有人把这些小标题分为十二门：文字、哲学宗教、文学、修辞、艺术、史学、心理学、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人生、治学考订（蔡田明《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说明内容的丰富。

《管锥编》是一部怎样的书？像织锦，钱先生运用英、法、德、意、西、拉丁和中文七种文字的文化学术著作的材料，把其中有关问题串联起来，正像用七彩编成的织锦。又像极为丰富的连珠，钱先生用的是“历历如贯珠”的连珠式的文体，“必假喻以达其旨”，取譬明理，取譬明情，取譬明道而一意数喻，使妙悟胜义不至为一喻之所僭夺。用古今中外多种美喻，给以丰富想象，成为美的连珠。又是一部高明的学术和文学评论。郑朝宗先生说：“《管锥编》开宗第一则就扫空了黑格尔的谬论。”“对伟大的作家如屈原、李白等”，“把他们作品中的瑕疵坦白指摘出来”。他又“表微举仄”，“甚至引用《品花宝鉴》中一个人物的话，作为评判庾信文章的例证之一。”（见同上）《管锥编》的著作，又是渊博与睿智的结合。柯灵先生指出：“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镕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柯灵《促膝闲话中书君》，见《读书》1989年第3期）。

1987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刊有郑朝宗先生一文：《管锥编 作者的自白》。文中引了钱先生信中谈到《管锥编》的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等等，皆‘打通’而拈出新意。”郑朝宗先生因此指出：“《管锥编》里无数用以作比的例证，却是作者数十年探讨力索藏之腹笥的珍宝，每逢读书时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意境、手法或语言，作者便自然而然地举出了中西文学中若干神似而非形似的实例加以补充说明，使读者相信世间果有此共同的诗心与文心。”（见同上，《钱钟书研究》第一辑）说明钱先生意在“打通”古今中外作者的诗心与文心，不在作“比较文学”。限于水平，对《管锥编》就引各家说法来作介绍。

请您读读《说文解字》

李凤翔

这里的“您”，是指编辑、记者及一切经常写文章搞文字工作的朋友。对这些朋友来说，读读《说文解字》大有好处，它能使您写文章的时候少写错别字；它能使您审阅、编改他人稿件的时候把住关，不使错别字“漏网”，从而提高您所编辑的报刊在文字方面的质量。

《说文解字》一书，人们又简称它《说文》，是我国东汉时许慎（字叔重）编撰的，“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是中国语言史上的一部巨著。作者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篆文，归纳为五百四十部，据形系联……创立了部首检字法”（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解字注·出版说明》）。清朝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花几十年工夫对《说文解字》进行注释而作的《说文解字注》一书，则是历来被学者们推崇的一部权威性著作。

我们为什么要向朋友们推荐读这部书呢？

首先，这部书能使我们加深对每个汉字的理解。由于这部著作是以“六书”（即古代构造汉字的六种方法：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理论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书，所以我们看过这部书，便会对每一个字为什么要这么造，它的“本意”是什么，它的“引申意”又是怎么来的等，了解得比较清楚。比如，“脸、肝、肺、腿、腰、脚……”等等字，为什么都有一个“月”字旁，这个月和月亮的“月”是什么关系？只要我们看看《说文解字》，便可以明白表示月亮的“月”是个象形字，其小篆为“𠄎”。凡是和月亮有关的字，如“朔、明、朗、期”等等其“月”部分篆书均为“𠄎”。而“脸、肝、肺、腰、腿……”等人或动物身体组成部分等字的“月”旁，则是一个“肉”字。《说文解字》中，“肉”字篆书为“𠄎”，也是个象形字，而“脸、肝、肺、腰、腿……”等等字的“月”字旁，其篆子与“肉”字的篆字完全是一样的，从此可知这些字的“月”字旁，均是“肉”字，这些人或动物身体组成部分的字，均和“肉”有关。所以，“脸”等等字的“月”字旁之“月”与月亮之“月”，完全是毫不相关的两个字，只是汉字由篆书渐渐发展为楷书之后，这两个字的写法才一样了。又如，为什么和人的头部有关的字，如“颜、顶、项、颈、额、颊”等等都有一个“页”字，连“头”的繁体字亦为一个“页”字左边加一个“豆”字。只要我们看看《说文解字》便可明白，“页”字的本意便是“头也”，“页”字本身就是“头”的意思，这就可以清楚，为什么有“页”字旁的字都和头有关系。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便可以了解每一个带“页”字旁字的本意。

其次，读了这部书，能使我们写文章时减少错别字。比如，“凉、冷、冰、冻”等字的左边偏旁是两点（有人称之为“两点水”，其实是错误的）；而“江、河、湖、海、洋”等字的左边偏旁是三点（有人称之为“三点水”）。有人写文章时，有时弄不清其字究竟应该是“三点”还是“两点”，犹犹豫豫，甚至写错。我们只要翻阅一下《说文解字》便可以明白：“凉、冷、冰、冻”等等字左边的“两点”，就是个“冰”字，其篆书为“𠄎”、“像水冰之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凡是和“寒冷”这一意思有关的字，其偏旁只能是“两点”，如凉、冷、冰、冻、冽、凋、凝等等，就连“冬、寒”等

字下边的“两点”也是由“冰”字的本字转化而来。而和“水”有关的字，则为三点。又如，有人写“祥、福、祸、被、褥、裤”等字时，有时分不清其左边的偏旁究竟应该是一点，还是两点，常常写错。其实，一点与两点大不相同，其一点者为“示”字；其两点者为“衣”字。“示”字是什么意思？看《说文解字》便知“示”字的篆书为“𠄎”其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此字从“𠄎”（古文“上”字），从三垂，其下边三垂的意思是：“日月星也”，所以此字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所以，凡带有“示”字旁或“示”字的字，其内容大都和“示神事”有关，如：“神、祥、祸、福、祀、祇、禄……”等，而“祭、崇”等字，其“示”字则在下边。两点的“衣”字旁的字，则和服装有关。凡和服装有关的字，均为“衣”字旁。是两点；凡和“神”的意思沾边的字，则为“示”字旁，是一点。明白了这一点，再写字时就不会写错了。这类例子能举很多。

最后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提倡读读《说文解字》，并不是主张让搞文字工作的朋友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这部书，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搞文字研究的语言工作者。只要我们经常有选择地加以阅读或查阅，就可以了。

谈读书习惯

冯亦代

我爱书，因此买了许多书，曾经在某一篇文章中诉说我对书的一片痴情，只要闻闻书上油墨的清香味，既美妙又动人，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这岂不成了为爱书而买书？买了书是要阅读的，我平生买过许多书，却一直没有充足的读书时光，因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种种原因，使我损失了许多书；有的书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至今想来，心里还有些不舍；我有时也讥笑自己作了书的奴隶。

在无法无天革文化命时，我的藏书可说是毁于一旦。洗劫过后，使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如果我对每本积聚来的书，能够及时阅读，装在我的脑里，则我又何惧藏书的散失。因为身外之物的书容易毁损，而装在脑里的知识，除非我患了老年痴呆症，或是去见马克思老人，否则这些知识将永远留在我的脑里，直到与我的肉体成为一抔灰烬为止。

以凭吊的心情来对待书是要不得的，买了书就要阅读，而不是成为起座间的摆设。于是当我离休下来之后，消磨岁月的就是这些书。我每每为浩瀚的书海发怵，即使我的藏书只是出版物的几十万分之一，我也只有一双昏花的老眼可以与之周旋。人可以登山而穷千里目，但无法阅读所有的书，所以古人可以建阁藏书，而为学则不过五本就了不得了。

我曾经读过一篇谈文人读书习惯的文章，说到海明威为了节省时间，往往在一个时期内阅读四五本书，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在读的。后来在美国遇到一位作家就请教他，他说诺曼·梅勒就在一个时期内，同时看五六本书，乍听之下，我还疑心他在吹牛，经过他的解释，我也信服了。梅勒的读书习惯是手头一本书，看累了便换一本来看，这本看厌了看那本，那本看累了又看另一本。总之他不是一时只限于读一本书，而是读几本书，他这样的读书方法，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的，而是慢慢地在实践中养成的习惯；以后，不这样做反而读不成书了。当然，他说这样做还须有犀利的记忆力，否则，读了几页就忘掉，以后便无以为继了。我说那是由于梅勒有非凡的记忆力，他笑笑说，记忆力也是靠培养来的。

我对于他的话将信将疑，因为梅勒在美国被认为是才子，才子有别于我们这些庸才，当然，我们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始终没有尝试过，前年老伴去世，我坐对书城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每天除了翻翻报刊、听听音乐，其余时间就是读书。我发了个宏愿，要将我已有的书一本本看完。这时我发觉自己原来的读书方法太死板了，因为书的种类繁多，理论书要精读，这需要专心致志，但也最容易使人疲累。有的书须玩味，有的书则只要浏览，书也要不同的对待，须依书的内容而定。这就使我悟到一个时间可以同时读不同书的门径。我现在往往在音乐声中写稿、看报刊，而且也在同一时间内看两本到三本不同的书；至今我还不能做到一时读五六本书，当然我也不必拘泥于此。我发觉这样读书的方法很妙，因为这使人永远保持一个清新的头脑，你的记忆力也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的办法是一时读中国书，一时读英文书，换脑筋时只读古诗词。这样我读书的时间便快了起来，多了起来；但还不能在精读时，几本书连轴转。这是我能力所限，因为我毕竟快入耄耋之年已成老朽，但我还在努力做。

每个人有自己的读书习惯，但我想一个时间读几本书也不是不可能的，有兴趣的人何妨一试。

1992年10月8日于听风楼

功夫在杂文之外

刘仰东 李 乔

刘仰东：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杂文将会成为这个世纪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遗产。同心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大观》，选取了 170 余位作家的近 500 篇作品。读后有一种感觉，凡是代表一个时期杂文潮流的作者，无一人是单纯以杂文名家的。

李乔：这里涉及一个值得深思的创作规律：功夫在杂文外。杂文的特色是精短，但做杂文却要有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准备，包括哲学思想、国学、散文、诗的基础等。杂文尚杂，写杂文必须是杂家，但这个“杂家”最好是杂项多门之行家。

杂文大家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他本人则兼为思想家、文学家、古籍整理家、社会风俗学家和社会观察家。另一位杂文名家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也很杂，他曾自述其杂学分八大类：诗经论语注疏类；小学类；文化史料类；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博物书类；笔记类；佛经之一部；乡贤著作。一个杂文作者，即使达不到鲁迅等人的学识，也最好是一方面的行家，并兼备多方面的基础，否则便摆脱不了创作中的小家子气和捉襟见肘的窘态，也就写不出优秀的杂文作品。

刘仰东：的确，现在有些杂文作者靠一种拼盘式的创作模式写杂文，读者看到的仅仅是一些直白的典故堆砌和现实现象的简单列举，而难见真正精彩意义上的杂文。

李乔：杂文作者应具备杂文气质。杂文气质是靠学识来塑造的。学识广博的学者最易具备杂文气质。如钱钟书先生，他的小说、学术作品和杂文中，处处洋溢着贯通古今中外的“杂”气。《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大观》中的许多作者，或者是文学家、历史学家，或者是教育家、语言学家，或者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是诗人、记者。总之都是某些方面甚至多方面学有所成的优秀人物，他们除了做杂文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著作，甚至杂文在他们的创作中不占主要地位。吴晗写了大量的杂文，但他的代表作却是《朱元璋传》、《读史札记》、《灯下集》等历史著作。他们的杂文所以诱人，正是由于他们靠着杂文气质，自如地运用哲理、学识、幽默，使杂文充满浓郁的书卷气。厚厚两大册《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大观》中的几乎每篇杂文都洋溢着这种书卷气。他们也许可以一两个小时做成一篇杂文，但这一两个小时的背后，却是难以计算的深厚的积累过程，恰如王安石的一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换句话说，杂文不是做出来的，是“酿”出来的。鲁迅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自然是水（大意）。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字。但拾到篮中的未必就是菜。

刘仰东：可是另一种现象也应引起注意：现在许多专家不再写杂文了，致使杂文作品的水平受到一定影响，某些“杂文”其实尚未“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有人曾提倡文学家学者化，也有人提倡史学家文人化；那么我们应该提倡杂文家学者化，同时学者也应当杂文家化。

李乔：回顾二十世纪的杂文，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杂文史是思想史之潜流。过去提到思想，总觉得很玄，似乎总存在于大部头的高深莫测的著作中。其实杂文中往往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甚至是被提炼出的思想

的精髓。研究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到杂文史。思想指有价值的意识形态，思想要作用于现在和将来的社会。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中国和外国，今天和明天都是有实际意义的。思想的苍白是杂文的大忌。二十世纪本身是巨变的时代，思想也在发生着巨变，对待这种思想上的巨变，不仅要看大著作，也特别要把目光注意在杂文方面。

刘仰东：是这样，而且杂文是深刻思想的通俗表现形式，大部头著作不可能人人都去读。鲁迅先生没有写过什么大部头的思想巨著，但谁能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呢？他的许多思想是通过杂文来体现的，这些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李乔：对。杂文所表达的思想也许不易成为体系，但却能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观念，能成大气候。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大观》的梁启超作于1900年的杂文《呵旁观者文》，将旁观者斥为“无血性”者，并说，“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蠹贼，世界之仇敌也”。这一思想对当时的救亡活动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今天读它，也有现实感。

刘仰东：“文革”中恽逸群先生做过一篇《平凡的道理》的杂文，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当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五十年见闻中，有这么几个人物：一个据说是‘从未犯过错误的’，叫饶漱石；一个据说‘一贯正确’，叫林彪；一个是‘天才的领袖’，叫陈绍禹；一个发明创造了两句口号：‘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程度’，叫做周佛海。为什么要提这些臭货？因为二郎神杨戬手中的照妖镜，是无价之宝哩！”以杂文的笔法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发人深思。现在这样高境界、高格调的杂文并不很多。有些杂文连基本的典故、常识都运用不通，甚至出现病句、错别字，与《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大观》所收选的作品相去太远，使人生出杂文是二流文体的感觉。不能把杂文这种高尚的文化品种混同于老百姓的口头文化，口头文化自有其价值，但在街头运用足矣。“谁爱风流高格调”？万千杂文读者也。

李乔：《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大观》的封底印了丁玲女士的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这句话含义深邃，常读常新。杂文之不死，不仅要靠时代的滋养，也要靠杂文自身的生命力。

把信留住

刘仰东 李乔

刘仰东：中国正在日益迅速地走向现代化。我们的生活也随之方便了不少。社会交际中电话、电脑、传真向家庭普及，让我们经常省去了写信，写信封，贴邮票，投递等等的环节。“过去盼信，现在盼电话”，已不是少数人的感受和体验。但是，得到什么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这个规律面前，随着现代化的方便而来的遗憾，同样是难免的。

李乔：是的。这些遗憾想想还是不少的。许多书信有鉴赏价值，能启迪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傅雷家书》证明了这一点。其实真理有时是简单的，一部大著作，浓缩到最后，也仅仅是几句话，这些话有时在作者的书信里就可以见到。《毛泽东书信集》就很值得读读。他的信言简意赅且容量大。他对墨子的评价一般见不到，却在一封写给陈伯达的信中提到过，字数不多，观点是深思熟虑的。现在出版的许多书信集，都很具可读性。

书信又是一种藏品，可以多角度地研究、欣赏和珍藏。信封、邮票、信笺、写信的技巧、书法都能给人以生活的享受。鲁迅当年曾和郑振铎一起费了不少气力和心思专门印制过信纸，可知书信的意义远超于通讯手段这个概念。名人书信的减少，多少年以后可能会影响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书信是能相对真切地反映社会状况、表现人物思想和心理、确证历史事实的材料，一向为史学家注重和利用。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包含了书信的贡献。几年前我做某项研究时，深感有关资料的匮乏，正规的历史文献所记极少，正是几部通信集，如《雪鸿轩尺牘》、《秋水轩尺牘》等，对这项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确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现象：书信随着生活的现代化，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

刘仰东：学术研究是少数学者的事情，前两点则是我们都应该有体会的。文章与书信不同，作文的目的是公开发表，要推敲句子，推敲语气，推敲观点；写信则仅对收信人负责，可以少一点顾忌，可以最大限度地亮出自己的思想，可以谈心，可以说些私房话，这就增强了书信的可读性和精彩度。鲁迅先生的许多语录式的文字，往往就出现在他写给别人的信中。《鲁迅书信集》的大量行市，为我们提供了不知多少警世之言和摄人心魄的议论，称它为一部思想宝库，似也不为过。

李乔：所以书信体裁的作品亟应引起出版部门的重视。近来不乏好的书信集问世，但远远不够。可以按人物结集，也可以按专题结集。不仅名家伟人，一些小人物的信，同样能反映社会生活面貌，更能反映普通民众的性情，也很有意思，值得收藏、品读。我在市面上凡遇到书信集，大部分都要买。但我以为现在需要的是全社会共同对书信的重视，其实人人都在写信，大家都应懂得和珍视书信中的乐趣。

刘仰东：我们的前辈们在这方面有过很好的榜样。小说《围城》里有大量的关于书信的细节描写，方鸿渐及其父亲、唐晓芙、赵辛楣、孙柔佳、高松年、陆子潇、汪处厚、苏文纨、褚慎明都写过或谈论过写信，作者更发了许多围绕信的精彩议论。叶圣陶先生有将信贴装成册的习惯，贴装的标准有二：一是文字精彩；二是书法漂亮。他曾在日记里记道：“余与平伯（俞平伯）写信确如打乒乓球，来回无已，所谈皆不相干之语，近来乃近乎谈玄。

彼之夫人因妇人病入医院，或须动手术，彼亦不以相语，俟余询及而后言确有其事。即此亦可见书信之不切实际矣。平伯言我二人晚岁得此，良为胜缘，观‘胜缘’二字，可见其思致之近乎佛家。”的确达到了一种化境。

李乔：遗憾的是今天有些人只用电脑写信了。《读书》杂志的赵丽雅编辑写信来，我给她回了两次电话，她有点不满意，说你总该写几个字来。像这样识得信的享受价值的人正日渐地看少，令人慨叹。我则是近年来才意识到书信的珍贵。多年来，我一直做编辑工作，与不少文化人、学者经常有书信往来，以前不太注意保留，真是追悔莫及。现在只言片语我都保存。它们不仅记录了我走过的路，赋我以无穷的人生回味，也大大丰富了我的生活情调。其中如作家孙犁先生、学者张岱年先生的来信，书法、文字、思想，皆是佳作，我视为珍品。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增高了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我们应力求做到的是，在适应社会前进步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留下对生活情趣的体味，若套一句流行歌曲“把根留住”，那就是——要把信留住。

书人无妨侃大山

郭洪新

我很乐意与大家谈谈侃大山的问题。首先必须澄清一点：侃大山和吹牛可不一样。侃大山是句方言，意思就是漫无边际地谈话、聊天。侃作和乐、刚直讲。《论语·乡党》曰：“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这是说孔子上朝时，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的样子。而吹牛是指说大话、吹牛皮，害人又害己，有时还能误国。两者不能等同视之（现在也有人把聊天说作吹牛，我以为不妥）。

侃大山的意思类似于今天我们常讲的交流和沟通。我们知道，交流、沟通得好，是极有助于工作和生活的。曾有人讲，什么人侃什么，雅人侃雅事，俗人侃俗事。这话有一定道理。雅侃和俗侃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人们之所以对侃大山颇多争议，恐怕是看到社会上侃大山者多粗俗且放纵，因而对这个词也产生了反感。前几年以《渴望》为代表的一批被有些人看作是“侃出来”的电视剧又在社会上引起了对侃大山的种种议论。以前的争议咱们今天不去讲它，就谈谈读书人与侃大山吧。

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就是指敬惜字纸，勤耕苦读，视读书为人生快意的人。读书人之间的侃大山，层次相对较高，谈话的内容也就多趣味多思想，引人入胜。在闲聊中人们的大脑是处在一个全面对外开放的状态，最易于接受和分析外来的信息。美国有一位叫做海伍德的学者就特别提倡“相互讨论读书法”。他认为几个同读过一本书的人对书中问题展开讨论对记忆、消化和实际运用大有裨益。不仅如此，侃大山时大量信息交流与碰撞，易于出思想，出火花。不少学者和作家的创作灵感就是在侃大山中获得的。侃大山也是一种休闲，学人的闲并不妨碍思想火花的迸发，“忙起来根本就没有灵感”。（王力语）

中外读书人似乎历来都有侃大山的习惯。魏晋时代，在读书人中间还曾盛行过一股雅谈、清谈之风。文人清谈常常通宵达旦。若抛开内容单从这种谈话的形式而言，也不妨把当时的清谈叫做侃大山。我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常常邀请著名学者和名流漫谈，共享妙语连珠的快感和优雅的氛围。外国也不乏侃大山之人，17世纪末叶兴起的沙龙本身就是文人雅士闲聊的场所。音乐大师肖邦和作家乔治·桑的家曾是巴黎最吸引人的艺术沙龙，社会各界的名人每天如流水一般地不断，听音乐，谈文学。爱因斯坦的业余时间经常和朋友一起阅读和讨论科学和哲学著作。就是在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沙龙的描述，譬如列夫·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

现代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了，人们自由支配的业余时间相对减少，大家聚在一处聊天往往成了难事。因此我觉得倒是应该鼓励读书人多在一起聊天交流。同时我们不妨也尝试一下现代科技的手段。因为，现代社会为读书人侃大山提供了不少便利。我们不仅可以进行一般意义上的闲聊，还可以利用各种媒体来“聊天”。国外有些报刊和电视台设有“闲话专栏”，而且很火爆，著名主持人往往都是星级人物。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还为侃大山创造了更为开阔的空间，在那里人们不仅可以和认识的朋友聊天，还能够与世界各国的朋友谈学问。侃大山随之有了国际通用名——CHAT。

书市与书展

郭洪新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书市”、“书展”活动异彩纷呈，浓浓的书香吸引了广大读者……

在一段时间内，集中丰富的图书品种，选择适当的场所，以销售图书为主而举办的集市，谓之书市或书展（BOOKFAIR，BOOKMARKET）。这是不少国家通常采用的一种宣传和推销图书的方式，具体做法：举办单位（书店、出版社等）准备充足的图书、选择大型的公共场所、确定举办日期、事先进行宣传，吸引广大读者选择。书市相当于扩大的图书展销，其规模大，声势大，举办时间较长。

中国早在公元4年，在汉代宰相王莽于长安扩建的太学附近曾出现“槐市”，主要由太学生在槐树林下聚市，买卖经传书籍或磬乐器以及家乡土特产品，每月开书市两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书市的雏形。到北宋时期，都城东京（现河南开封）的相国寺庙会，每月5次定时开放，书籍、玩好、字画、碑帖等都在寺内设市经营。

国外最早的书市，是1564年由当时图书业组织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举办的书市。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书市、书展还有：“莫斯科国际书展”、“英国爱丁堡书展”、“泰国国际书展”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1次举办大型书市，是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于1957年11月1日—10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共准备了中外文书、刊、画册等2.5万多种。目前，国内各地举办的书市、书展相当多，规模较大的是“全国书市”、“北京书市”、“西安书市”、“沈阳书市”、“山城书市”等。

书展总体上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种。专题性的是指专门展销某一类别的图书，如企业管理图书展销，教育图书展销。书市的时间通常为十天或半月，一般在大中城市举办，或与出版社联合举办。

书市、书展这种销售方式的优点是，声势大，品种多，有利于引导读者买书，满足群众中兴起的读书热，买书热的需要。书市期间，许多出版社还组织编辑参加售书活动，请一些作者来书市和读者见面，举办座谈会，使书市成为联结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纽带。

亟须建立一门“读书学”

曾奕禅

读书是一种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可是几千年来蕴藏于读书实践活动中的规律与经验，并未作出一门专门的科学来研究和总结，作者站在时代高度，提出——

我深感大有建立一门“读书学”的必要。顾名思义，所谓“读书学”也就是以读书的实践活动作为研究的对象。积人类长期读书实践活动之经验，值得我们探讨和总结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其内容极为丰富。

从读书的指导思想来看，何为正确的科学的，何为错误的反科学的。人们的指导思想各有不同，因此人们对于选读的图书的要求自然也有所不同。按照不同指导思想去读书，其结果也就大有不同。

从读书的社会作用来看，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分别来进行考察和总结。比如说，把它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看，可以考察它与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关系；把它放在文化发展史中看，可以看到它在人类社会文化积累，提高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中的作用；把它与读书人自身的素质修养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它是人们察物明理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如此等等。总之，它的社会作用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所以读书实践活动应当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读书的方法来看，这是读书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为读书，但效果各有不同：有的人事半功倍，有的人事倍功半。除了其他的因素影响之外，与方法是否得当关系极大。哪些方法是科学的因而能够奏效的，哪些方法是非科学的难以奏效的，很值得探讨。但也应当承认即使是方法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方法之中有些是带有普遍性的，有些毕竟只是具有特殊性，在实践中必须因人而异，不能强求一律。应当说，凡是能够提高读书功效的方法就是好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应当尊重实践。

从读书的内外条件来看，应当承认它们对读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说，在一定的时代中，有的人竭力鼓吹什么“读书无用”论，人们读书的热情自然也就受影响；反之，如果整个社会重视读书，提倡读书，读书之风也就盛行起来了。内部条件，指的是读书人自身的自觉性强弱的问题。被迫读书与自觉读书，其功效之不同是不言而喻的。

从读书的分类来看，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既有共同的要求又应当有不同的要求。想象得到，阅读古籍与阅读现代作品，阅读政治理论书籍与阅读文艺作品，阅读外国人的论著与阅读本国人的论著……对于它们的要求以及在阅读过程中各自产生的心境、感想和体会决不可能是一样的。在这里，同与异，相通与隔阂，共鸣的深与浅，必然各自呈现不同的状态，很值得我们加以琢磨。

如上所说的种种问题，都可以作为整个“读书学”的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细细研究。追溯科学发展的历史，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从粗糙到完美，经历过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有些学科开始时也被人们认为“无学”（比如说，原来就有人说“新闻无学”、“编辑无学”），后来它们不仅各自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还由此而分化出许多新的子学科。当今学科发展的趋势是，既综合又分化，既分化又综

合，在不断地综合与分化的过程中形成和派生出许多新的学科；而新的学科的不断涌现，正是整个科学日益繁荣的表现。

恩格斯讲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需要而且应当努力造就出自己时代的巨人，同时还急需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读书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建立一门“读书学”不仅可以对于人类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读书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同时还将反过来指导当今时代的读书实践活动，使之不断地深化。因此，它决不是巧立名目，决不是赶时髦凑热闹，而是顺应科学的发展，顺应时代的发展，顺应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之必然要求。做好这项工作，确实是功在当前，利在千秋。

多半是独语

金马

目前，社会上流传“南有罗兰，北有金马”之说。金马先生是位著述颇丰的大陆作家，已出版著作 20 余种。据悉，大陆出售的各类贺卡，上面的格言隽语，几乎有一半出自金马笔下。

近年来，我围绕“当代生存智慧系列”写了一些书，做了一些文章。这是因为面对全球性生存智慧竞争的严峻挑战，使我的内心深处不得不时时承受着巨大的冲击或强烈的震撼！使我深切感受到：只有政策上的改革、开放，而没有个性生存状态的调整，心理状态的适应，潜能、素质的开掘和提高，要想使我们的国度脱颖而出，将是不可想象的。新世纪精神文明的时代特征，将要求鲜明的创造个性和坚韧的自立精神，因此在注意发挥我们人口众多的集体优势的同时，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个体创新潜能的自我开掘、心理优势的自我培育、生存技巧的自我把握……以便由这样的、亿万、美丽神奇丰富的、创造新生活的时代精灵，合手托举出富于当代生存智慧和竞争活力的民族魂魄，从而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弹跳自如的生存面貌，积极适应世界村邻的挑战，悉心倾听未来生活的呼唤。

这里，特别想强调说说的是，人类确乎不是单纯的精神存在物，确乎有不可或缺的生物性需要，也不能离开物质文明的哺育。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当然不能不是人类的头等大事、前提性条件，但是，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地取代人类的精神需求和情感世界。而是需要随时客观地审度自身在物质文明发展的方面可能达到的阶段性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求得二者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当物欲作为一种生存条件和整体地提升人类生存姿态、生存价值、生存格调、生存情趣的时候，当它自然、自在地存在着的时候，是美而不俗的；然而，当物欲成为一种奢欲或惟一的生存目的，贪婪地制造着吞噬精神的氛围时，就俗而不美了，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了。这是因为，人们评价一段历史的价值时，总是喜欢以审美的态度而不是以饱欲的态度作为基点的。当着精神的、审美的、情感的、伦理的、道德的因素，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明显地向上运动（而不是衰微下降），从而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欲望、创新行为，并由此而导致物质文明的再度大发育时，是历史真正富于文明价值的阶段。因为人终究不是只需满足物欲的动物，而是“社会动物”、“精神动物”、“情感动物”、“审美动物”、“理想动物”、“慧灵动物”。人们希望的终究不是从草驴式的生活待遇提升到诸如熊猫之类的珍禽异兽所享受的超级生活待遇为满足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如果不是把真力气、真功夫、真本事、真心思用在国民从出生到仙逝的整体文明生存姿态与生存智慧的教育上去，以最大的（可能性的）投资和优势的力量用以改善，提高国民的创新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素质方面，都将终于难以达到同历史一起赶路、同人类文明同步发育的目的。而且将会有意无意地制造文明反差实际距离的日渐扩大，因为世间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会静止地坐待其他国家和地区赶超过去！何况，当世界村由各国国民素质整体进步所形成的文明高度发育时，只靠单项的和个别方面的指标的增加或所谓超越，对于改善自身作为“地球村民”的生存力、自如性和自尊心将是意义甚微的。说到底，真正的物质文

明的进步，不仅反映在物质生活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反映在生存价值和审美情趣的升华。合理的物欲，创造光明的世界；贪婪的物欲，毁灭文明的视野。因此一切的智者均不希望重现美国作家爱默森所说的那样，“紧跟着改革，总有一个放荡淫乱的时代”，而是祈盼做到法国作家雨果所说的那样，“物质的繁荣，我们需要；意识的崇高，我们坚持”。

中华民族，又一次来到了世界村的十字路口……。

我们又一次面临着重大的选择。但笔者坚信：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旦与完善个体生存智慧的春潮合流，那是东方的“火中凤凰”再生的盛典。笔者为此而心中时时触发的点滴感受，丛丛独语，之所以用散文笔调形成文字，则为的是为此盛典的早日实现捧上一掬心灵的萤火……。

重逢名著

赵长天

西方古典名著好是好，可是由于多距今时间遥远，与当今读者情趣有一定差距，难以产生共鸣。在此情况下，提倡阅读名著有什么意义呢？

和西方古典文学名著，我们似乎已经久违了。

我们曾经带着近乎唐僧西天取经的虔诚，兴奋地、饥不择食地闯进那片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和几百年前的外国人交起朋友。在别的国家，那些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恐怕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经历和体验。那真是饿汉掉进米仓里，那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况且那不是米仓，那是琳琅满目的食品超市；那不是大观园，那是个超级迪斯尼乐园。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足够的忍耐力来慢慢浏览，来细嚼慢咽。我们乘坐一辆飞快的车，从繁华的南京路驶过；南京路上的每一家书店都值得盘桓留连一整天的，我们却一掠而过。若干年过去了，托尔斯泰、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亚……慢慢离我们远去几乎已经变成尊尊塑像，留在遥远而朦胧的记忆中。而对于更年轻一些的朋友，这些文学大师或许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寄居在陈旧的文学史书籍中。

如果不是华夏出版社邀请我参加名著缩写工作，我大概也不会重新翻开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更不可能去对照几个版本，就像修改自己的小说那样去斟酌陀翁写下的每一句话，去理解一个个人物、重现一个个场景、琢磨段落篇章之间的关系。我是写小说的，我知道一般的小说是经不起被人这么琢磨的。有些文字，乍一看美奂美伦，仔细读来，实在没什么名堂，况且是几百年前的东西。十多年前我们有些轰动得洛阳纸贵的作品，现在读来会怎样呢？更不要说细细琢磨研究了。

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缩写的过程中，我被《罪与罚》深深吸引住了。尽管陀翁的叙述语言今天看来确实繁缛绵密得不太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尽管那些详尽具体的场景描写在视觉艺术高度发达之后已经失去了当时的魅力，尽管发生在彼得堡的这个事实在阴涩沉滞得叫人压抑，但我依然被大师对人性的透剔剖析所折服，因大师对社会的深刻鞭挞而震惊。经过几百年岁月的冲刷，附着在作品身上的那些衣物服饰或许都败坏了、冲走了，可是作品本身依然是金子铸就的，沉甸甸，亮闪闪。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历史，相信千百年来无数智者筛选的结果，千万不要轻率地把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品丢弃，而用一些时髦的赝品来取代。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性

王金陵

有人讲，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极富音乐性。如何理解这个说法？作者又是如何运用音响手法的呢？

当你全心投入到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时，会感到这部书既给你以视觉享受，又给你一种听觉享受。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各种门类都是相通的。中国有这样的传统说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画中也有音，一幅《黄河》画会使你听到奔腾的涛声。这是音在画内，有时音在画外。例如米勒的《晚祷》，画了一对低头祈祷的农家夫妇，你却能听见画外的钟声。而诗它本身就有音韵，给读者以视觉与听觉兼而有之的美感享受。至于词，它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乐曲。

那么小说呢？不少作家的作品有音乐性，如屠格涅夫等等。罗曼·罗兰既是作家又是音乐理论及音乐史家，所以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充分运用了音乐与音响的手法来塑造主人公的形象。

当小约翰初生时，作家再三描绘莱茵河奔腾的水声、敲打窗户的雨声和婴儿不停的悲啼声，以表现小约翰来到人间的痛苦。直到传来教室的钟声，奇妙的音乐使他平静进入梦乡。在以后的行文中也不断出现水声、钟声，这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象征。

随着约翰的逐渐成长，罗兰不断对音乐世界进行描绘，以突出主人公的特殊天赋。例如写他跟飞云交谈、他听到树叶的颤抖、他听见马铃按着车轮的节拍在歌唱。又如他初次按着琴键，感到这些不同声音像是一群从琴箱里跳出来的小精灵。若同时按下两个键，那么跳出来的是两个小精灵或是相互扭打的仇敌，或是两个相亲相爱的密友。约翰就这样在音乐世界里遨游，从六岁起就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当约翰已成为作曲家时，他经常被外界的喧嚣困扰。所以，每当夜色茫茫，就无限留恋无声的外在世界，正是此刻，他内心流淌着美妙的乐曲。作者把作曲家的心灵表现得真是惟妙惟肖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首交响曲。罗兰曾说过，这部作品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约翰少年时代心清如水，对大千世界的生灵一往情深，有极大的音乐天赋。虽有许多灾难，但他以惊人的意志去征服。作者用蕴含无限生气的快速节奏来抒发他生命中的第一乐章。青年时代的约翰已在音乐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开拓崭新的天地。他要跟形形色色的仇敌，有时甚至要跟自己的困惑斗争。罗兰把约翰的这个人生阶段定为英雄与命运搏斗的第二乐章。细细读来也真像能听到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激昂悲壮的弦律。

主人公的成熟与爱情的喜悦和创伤，作家用柔和、深沉的调子来处理，这就是作家所谓的第三乐章。约翰始终没能得到爱情的幸福，但他终于在音乐事业中走上了巅峰。约翰的人生道路已到尽头，但仍要跟死神作最后的斗争。朋友，你将随着作家的笔看到并听到：当死神挟着寒霜坚冰、轰雷闪电降临之时，他竟大踏步迎面走去。一股浩然之气冲上天际，陡然间地动山摇、云开雾散、阳光灿烂，大千世界的生灵唱起了欢乐的颂歌。约翰就在这欢乐颂中得到了复活！约翰就在这欢乐颂中得到了不朽的永生！

简谈《白鲸》和赫尔曼·麦尔维尔

陆天明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是一个拥有悲惨人生经历,却又终至辉煌的作家。他从15岁起先后做过银行文书、店员、农场工人,并在各种各样的远航帆船上度过将近十年残酷的海员生活,一直到30多岁才写出他的成名作《白鲸》。但小说出版后的40年间,却一直受到他当代人的冷落,作家本人生活也极为艰困。死去3天后,一家小报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世人。当代人的不理解,似乎断定了这个叫麦尔维尔的美国人从此灰飞烟灭。但谁曾料想,又过了几十年,到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就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文学巨匠海明威开始走红的时候,《白鲸》却在欧美各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竞相为他写传记、出全集、翻译他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版他的作品。研究他作品的人蜂拥而至,并且相继三次把他的代表作《白鲸》搬上银幕。

世人在作家去世几十年后,确认他这部巨著的辉煌,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书里十分翔实而又惊心动魄地写了一个19世纪捕鲸者的故事。当文学走进20世纪,正竭力地在为摆脱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一套“编几个故事、描几个人物、讲一点道理”的小说做法而苦苦努着劲儿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麦尔维尔早已经在这部《白鲸》里,用它宏大的气势、无与伦比的表现力和独到的艺术风格,突破了这种旧框架,精心地(而又粗犷地)、深厚地(而又绚烂地)、多层次地通过建构一连串的意象(或象征板块),来发掘人类走向自由、走向文明、走向自我确认、走向伟大的创造、再生等种种具有明喻意义的精魂和情结点,在高深层次上熔铸了人类对历史的体味和对生存的思寻。小说里的那条白色的鲸鱼、那个大海、那个亚哈船长、那个叫作“伊尔梅尔”的“我”、那个黑人“魁魁格”……的象征指向是极为明显的,但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象征深透到了总体的语境和分支的每一个话语流程之中。而只要你撇开了寻找意义的“不良居心”、完全放纵了自己去追随这种流程,这样所获的阅读所得(相当于一杯又一杯略带一点涩味却又香醇无比的黑葡萄酒),绝对是可以让人流连忘返而又品味再三的。

最后要提到的是这部小说1930年版采用了美国著名艺术家罗克韦尔·肯特画的插图。这是世界文学名著插图长廊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以说是文学与绘画艺术的极完美的结合,极罕见的一个范例,同样值得反复把玩赏析。

看家的书

米博华

梁山好汉，上线的人物都有一手看家的本事：宋江的术数，吴用的算度，李逵的板斧，张清的石块……有绝活才有领袖之体、军师之体、元帅之体、将军之体。

做事宜独擅一种专业，而术业得以专精又需钻研某一种学问。画马的常描《百骏图》，写字的揣摩《玄秘塔》，尚武的专练“鸳鸯腿”，布阵的演习“连环阵”。如此而已。

我还迷糊糊定位写了小杂感，不入理路，不入雅室，个体手工切豆腐干。虽说此志远非鸿鹄，却也学点筋筋节节的小知识。然则知也无涯，书也无限，纵览过去，不辨马牛。所以，以定位之身读定向之书，也就很自然了。此之谓，欲学看家文章，必读看家之书。而读法呢？如棋之复盘，一遍遍读烂，不厌其烦。

合格的小杂感须以见识、知识、文采——三足而立。故而三项建设一齐上马，精中选粹。细加筛选，计六本，公诸同好，恳望方家别笑。

其一，是把《费尔巴哈论》和老子《道德经》结合起来读。观察要靠眼光，分析要讲方法，“费论”最为得力。此书缜密而雄辩，常读则顿生辩论之勇。微言生大义，需论者所见辽阔、精深。读“五千言”，乃可步入形而上的思辨殿堂，万事万物的变化线索俱在手中掌握。我们必须感谢这位在智慧方面早熟的中国人，其对“成”、“盈”、“直”、“曲”、“枉”等诸范畴作了极富变化的概括。他创造了一种规则而不是具体的运动形式。运动形式“皈依”规则，是规则导引运动形式，而运动形式是规则的一种直观说明。“五千言”是个伟大的预言。但此一类书只宜夜读。市声不能使人沉思，欲望令人不能默想。万籁俱寂之时，心平气和之时，看上一段，反复琢磨，当会有电石起火，脑子里“咕冬咕冬”沸水的感受，是大启迪。

其二，常置《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于枕侧、于恭桶边，也宜在拥挤的公汽上找到相对和平的一隅翻翻。这两种类书材料最为宏富，而所叙材料多为街头巷间老百姓所熟知的稗史佚事之类。作考据，未足征信；写给老百姓看的小文章，却是栩栩如生的“菜码”。文史材料，可看作是小杂感的调味品。没它，照样写；用上点，就有些味道。杂感虽小，到底也是手艺，就需要兼顾色香味，在钢铁逻辑中撒一点“芝麻盐”，务使其丰满鲜活。类书的好处是省事，所用常例，所举诸事，都可以从中找到。欲问详细，就要循着线索再看《纲鉴易知录》之类的科班读本。

其三，可读周家两兄弟文选。称岳者自然是无双峰，讲思想的贡献，周作人是没法和鲁迅比的。但文采，“两周”似乎都灿然。文采最终要藉着语言实现。而“两周”的造句能力、造句水平，堪称一流或超一流，气死袁中郎，羞煞李笠翁，确是神了。鲁迅的语言，奇绝；周作人的造句，稳健。奇绝中有变化，激越之情搅得环球凉热；稳健中不寻常，平和之气宛如暮鼓晨钟。反复读，一句句拆开读，始可不断获得某种新的语感，造句的成色、水准大为改观。当然鲁迅的好处远不止这些。

所谓看家的书，不是惟一的书。这比较好理解。只能讲，有些家什，用着比较顺手，又比较实用而已。家什自然是越多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左

牵黄，右擎苍”未始不是更好的选择。若能亦文亦武，左右开弓，既能盖楼，又能垒鸡棚，那就该谢了天又谢地了。我是说，建设有些是基本的，而基本的是要反复研习的。

“公少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愤而捐书弃剑，不学无术，竟又不成。”为什么，因为干事情总不能少了看家的。

一位长于描写二战的作家

潘 平

最近在市面上常常看到约翰·托兰的二战作品，颇具吸引力。

自 1982 年《日本帝国的衰亡》（该书常被誉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姊妹篇）问世以来，约翰·托兰逐渐被我国读者所熟悉，他的作品也一部接一部地译成中文，迄今已有 7 部，第 8 部亦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读者见面。在中国文化人整天叫嚷出书难、读者流失的今天，托兰享此殊荣（他的作品印量均很大），值得研究。

约翰·托兰是爱尔兰裔的美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其作品多次获美国文学奖和金质奖章。托兰早年专攻英法文学，并矢志当一名剧作家。在 43 岁出版第一部作品时，他已写过一二百个短篇、25 个剧本、5 部小说（大都没有发表）。这种历练，对他的写作生涯产生了良好影响。据托兰自述，他早年曾受一位叫布朗的剧作家影响。布朗告诉他：“不管你写什么，别讲出来，而要表现出来。”他的作品均是建立在实际、真相和人道的基础上的。读他的书，你会发现他常常用深切的同情关心着小人物——当兵的和老百姓的命运。即使是对那些丑类，也不脸谱化。如他写关于希特勒的书时，便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多方采访（不下 250 次），运用众多的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形成了他笔下的希特勒——希特勒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矛盾得多。“由于天堂被剥夺了，希特勒选择了地狱。”

在托兰众多的战争题材作品中，反映亚洲战争的有 6 部（日本占 5 部）。他自述写这些作品的目的是协助促成东西方的接近。他十分厌恶欧洲中心主义。托兰在 1960 年才有机会到日本，此前，他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对日本人及其怪异行径持对立态度。当他乘坐的飞机在立川航空基地着陆时，他的态度开始改变。他追述说：“在我于冬日昏暗晨晖里驱车前往东京的途中，我感觉到：身裹和服的日本妇女们，就若出自远古，穿行于晓雾之中，这幅景象，令我心灵颤动。”正是这种情结，因此才有了饱蘸情感表现战争的极端无益和悲惨的《日本帝国的衰亡》、《战争之神》，反映历史上最为动人心弦和凝聚着生机阶段之一的《占领日本》（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托兰一直认为，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教训，立足现在，认识过去，给我们的教益只会更多。他之选择太平洋战争（上述三部及《问心无愧》），是有他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 1985 年访问中国之后更加坚定，这就是：21 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不光存在于日本而且存在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种超卓的职业伦常和精湛技艺将使世界的领导中心由西方东移。尽管亚洲目前存在种种棘手的问题，下一世纪仍将是亚洲人的世纪——人类和各国将终于学会接受彼此的歧异，生活于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之中。否则，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一个 22 世纪，他断然言道。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之我见

李治亭

近些年出现了历史人物传记热。这的确是学术界的新气象。近 10 年来，学术无禁区，探索所至，古今人物传记纷出，盛极一时。以清史而言，清帝十二人，已有七帝的传记出版。对史学来说，历史人物是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们的活动构成的。离开了人，也就不成其为社会，历史就无从解释。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研究人物的永恒性的。

从社会的需要来看，我觉得，历史人物传记最易为群众所接受。一部杰出人物的传记，实为人生经验的最好总结。他（她）的业绩，大智大勇，机遇与成败，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总能令读者从中获取人生的借鉴。如把人物传记比做人生的教科书，大概不过分吧！我想，这正是人物传记所独具的魅力。

我不是说凡人物传记都具有魅力，我指的是那些成功之作。何为成功之作？这个问题，非一言而能尽述。要而言之，我以为，首要的是要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传主生活的时代特征。认识一个时代，是认识、分析、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时代，或者说，也是该时代的“产儿”。每个时代的特定内容，无不在人的身上打上深深的印痕。实际上，杰出人物的一生，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而每个人又各有自己生活的特定环境。它既是时代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时代的直接反映。清太宗、吴三桂、尚可喜等同处明清易代的大变动时代，而他们生活环境却不尽相同。清太宗走上历史舞台时，满族正在迅速形成，并与明朝处于对峙状态。我与孙文良教授合著的《清太宗全传》，就从“神话溯源流”写起，把他置于满族的由来与形成，以及同明朝争衡的历史进程之中，逐次展现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吴三桂生长于明清争战之地，由此走上明清争战的舞台。我开篇就写军事重镇山海关及关外军事台堡、烽火台，烘托出战争的氛围，用以表现他在战火中崛起的不同凡响的经历，尚可喜等携众万余人、千艘战船与大量火器，弃明投清（后金），恰好反映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发展趋势。时代大背景与小环境的有机结合，使时代风貌具体化了。以往，多用阶级矛盾的公式来图解或替代具体的时代内容，未免失于简单化。

历史人物是昨天或前天的活生生的人，既是具体的，又是个别的。人物各有其个性。这就要求人物传记一定要写出传主的鲜明个性，否则就会“千人一面”。所谓个性，我的理解是，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包括形体在内的总和。例如，道德、习惯、性格、思维方法等等，总汇为个性。能否把人物跃然于纸上，重现当年的真貌，关键在此。从大量史料中筛选反映人物个性的内容，需要下一番功夫。剔除溢美或贬抑、诋毁之辞，去伪存真，都是必不可少的。以某些史实为据，进而分析传主的心态，更见功夫。我选取吴三桂年少闯围救父的史实，用以表现他敢战、对父“忠孝”的思想素养；“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当他窥测到朝廷已怀猜忌时，便毫不犹豫地交权，解甲归田，反映出他的老谋深算的个性，这同吴三桂贪恋权位形成鲜明对照。

突出人物个性，使之形成完整形象，也须借助文学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司马迁的《史记》堪称典范。一些传记，只记述“大事”，连人物的相貌、性格、嗜好、心理等都不涉及，又旁征博引史料而缺少自己的语言，读

罢全书，仍难形成传主的完整形象。

说到作者同传主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即作者应使自己进入角色。如同演员，只有溶入角色，才能演得成功。同样，作者在撰写人物传时，应把自己置身于传主所处的环境之中，追踪其思绪，跟随其行动，凡事须先问自己：我若在当时该如何处理？人们指责吴三桂背叛农民军而降清，是为大地主大军阀本性所使然。试问：李自成的部下抄了他的家，拘禁其父，霸占其爱妾，他能否再去投顺？即使今人遇到这种情况，也难以做到！吴三桂也有血肉之躯，也有自己的情感和追求，我们只有真正把自己溶入历史之中，才能真实地体察到他的心理活动，正确地解释其行为。

每当我撰写人物传时，我的身心仿佛跨越时空，返回到传主生活的环境，他的成败得失，善恶苦乐总使我心潮跌宕起伏，把自己的情感倾泻于笔端，声情并茂而下。我体会，这样做颇有助于写好人物传记。你要我谈想法，我思索再三，写了这几点，是否说清楚，说透了，我确无把握。姑且说尝试吧！历史人物传记亟待需要进行深层次探索，让更多的人都喜欢！

四时读书乐——书人书事

忆吴晗与《中国历代史话》

周应鹏

经过 20 多年的风风雨雨，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三本史话的《中国历代史话》（北京版）丛书已经陆续出齐。在这套书的全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当年为此积极倡议、亲自组织、奔走呼号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教授却再也看不到了。饮水思源，不能不使我这个当年在他的指导下工作过的编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悲痛。

60 年代初，我是北京出版社文史组的组长，开始和吴晗同志接触是商讨编辑他的杂文集《学习集》。吴晗是知名的历史学者，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在多次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位知名史学专家的追求却是历史知识的普及。他说：普及历史知识就是切切实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像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值得珍视的事情太多了，要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知道。他不但这样主张，也身体力行。他为中华书局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写过许多普及历史知识的文章和历史小故事。

听说出版社有意多出一些历史普及读物，他很赞赏。我提到已找到了许立群同志在延安时写的《中国史话》，问他能不能在这方面做点文章。吴晗很赞成。几经研究，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拟定了《中国历代史话》编写计划。计划要求：《中国历代史话》中的每一部都是独立成章的断代史，但从纵的来看，又是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在写法上，要求叙事具体生动，雅俗共赏，遗闻轶事、研究新成果都可包容。但不允许有违背史实的虚构。吴晗说：这套书出好了是功德无量的事。

这套书由谁来写？吴晗主张，应该让历史学家自己拿起笔来。当时他是北京历史学会会长。他希望史学界摒弃那种轻视普及读物的偏见，他说：只要把历史知识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历史学家才算真正尽到了责任。我们请吴晗担任这套书实际的主编。他欣然同意，并愿意写一本，是他的“老本行”《明朝史话》。为了集思广益，物色作者，由吴晗出面，请一些史学专家集会。被邀请的有史学名家翦伯赞、宋史专家邓广铭、辽金史专家陈述等多位。其中最年轻的是冯其庸。

为了树立样板，决定先写出一本。经过磋商，约请程应镠教授写《南北朝史话》。其他作者也都大体约定。《南北朝史话》排出校样后，准备打印若干份，分发各位作者。不幸的是，正当《中国历代史话》的编写工作按计划进行的时候，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发生了。吴晗教授含冤而死。北京出版社也一度被撤销。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中断了十几年。

雨过天晴，后继者经过努力完成了吴晗教授未竟的事业。在《中国历代史话》全部出齐时，我们谨以此告慰吴晗教授。

灯下窗前常自足——怀念唐弢先生

陈平原

还像往常一样，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第一件事是选出几本品相最佳者，准备送给几位特别喜欢书籍的师友。猛然间想起，唐弢先生已经不在人间了，不禁黯然。

记得第一次奉上我刚出版的小书，先生礼貌性地翻看了一下目录，接着就品评起书籍的装帧和印刷。俨然把它当一件工艺品来鉴赏。知道先生的脾气，以后送书，事先总不忘挑挑拣拣。只是书生爱书，总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明知这几年书籍装帧大有长进，每次见到自己的新书出版，还是觉得有不尽如人意处。先生当然也会谈论书籍著述的优劣，可那是以后的事；第一眼总是“以貌取人”，关注的绝对是书籍的形式美感。这或许是所有书迷的“通病”，先生似乎也未能免俗。

先生《述怀》诗称：“平生不羨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读书人所以“灯下窗前常自足”，绝不只是因其能与古人“话衷曲”，更包括摩挲书籍时的快感。就像集邮者和古物鉴赏家对其藏品的态度一样，读书人之爱书有时近乎不可理喻，只能借用郑振铎的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唐弢先生自称“为读书而藏书”，对“为藏书而藏书”的旧式藏书家很不以为然；可这并不妨碍他的“嗜书如命”，读《晦庵书话》不难明白这一点。

唐弢先生是著名的杂文家、鲁迅研究家和现代文学史家，可我最喜欢的却是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的书话。先生自己说：“我并没有把《书话》当作‘大事业’，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乎写点什么，作为调剂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书话〉序》）推崇其自以为“闲书”的书话，并非贬低其作为名山事业的专门著述，而是因为前者与我的个人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

我第一次当面向唐弢先生请教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是在1983年春天。那时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专门上京来访名师查资料。可我拜读并喜爱先生的《书话》，却早在我上大学以前——单从接受的先后，也不难理解我为何格外推崇先生的书话。

我对书籍的那么一点知识和兴趣，与先生《书话》的启迪大有关系。以至四五年前，当我也出版自己的书话集子时，在序言中专门谈到，希望像先生那样将书话写成“独立的散文”。这话既表示对引路者的敬意，也为自己定了个标尺。只是自觉有点悬得过高，无法做到像先生那样“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抒情”（《书话序》）。故集子出版后，犹豫了好一阵，还是不敢奉呈先生。私心以为还能在专业著述之余写点不算太差的“学术小品”，假以时日，会有长进，那时再奉呈请教也不迟。谁知当我的第二本学术小品集出版时，先生已归道山。因而，先生大概不会知道，在专业研究外，他还有这么一个私淑弟子。

这辈子无力经天纬地，只配亲近书本，和文字结缘。之所以明知没有多大出息，还能“灯下窗前常自足”，除了家庭熏陶师友教诲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人的题跋和今人的书话——它们教会我热爱书籍，而且是我专业研究之外凭兴趣翻书时绝好的向导。而在所有的题跋集书话集中，我最先接触

并大感兴趣的正好是唐弢先生的这本《书话》（增订本题为《晦庵书话》），故不妨称其为我“读书的向导”的向导。或许有一天我读书真的入了门，那我也将永远怀念这最初的向导。

追求真理考信求实——罗尔纲先生治学、著述二三事

钟文典

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道德文章素为人们敬仰。他崇真求实，惟真理是从的学术思想也素为人们所称道。

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罗老曾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历史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最尊重事实。只要大家都承认并真正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研究历史，把史实搞清楚，就不应该存在不同的观点。如果对历史事实不加稽考，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弄清事实的真相，就宣布自己有了什么“观点”，或者说自己的“观点”和他人有什么不同。那么，这种所谓“观点”，实际只是脱离历史真实的、个人主观的看法，只能称作主观，而不能称为观点。因为，正确的观点只能产生于对历史事实稽考清楚之后，根据实在的情况得出来的。

基于上述见解，罗老做学问十分重视对史实和史料的考辨。怎样做好史事史料的稽考工作呢？罗老谈考据经验，认为首先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克服孤立、片面地看问题，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历史的本质。第二，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要“在宏观的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在微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第三，要胆大心细。“胆不大不敢怀疑古人，跳不出人家的圈子。心不细则不能做钩沉索隐的求证工夫。”第四，要慎重地思辨和取舍。科学研究只有经过长期静心的不断钻研和探索，才能分辨出事物的是非、真伪，粗疏急躁是办不好事的。第五，要忠实于科学，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断案要慢慢地下”，“证据不够，要悬而不断”。这就是说，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只有老实人才配当历史家”。

罗老对史事史料的考释，从假设入手，通过考证解决问题。假设，并不是随心所欲，先定框框，然后围绕自己主观的设想去拼凑证据。而是把假设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然后以大量可信的资料给以证明。罗老对南京堂子街壁画的考证，就是从茫然一片中认真细致地观察，看出：画应有人物而没有人物，画中有与清代及古代形式不同的望楼建筑这两个最显著、可以代表全部壁画的特点，从而提出：那些壁画不绘人物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制度，望楼建筑可能是太平天国新创的建筑的假设，然后通过大量史料的稽考论证，使问题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罗老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的自序中，讲到《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的写作时说：“我做考证，并不是为要证明某一看法而去考证的，而是要考明某一问题的实情究竟是怎样而去考证。所以常有考证得出的结果与当初‘以为是这样’的看法相反的。”罗老认为对的，他坚持，从不碍于情面而放弃原则，敷衍妥协。他对人家的错误意见“不客气”，对自己的错误意见也“不客气”。罗老关于李秀成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1964年秋，因为考证李秀成学姜维伪降钟会的故智，劝曾国藩为帝，并非叛徒，而遭到一场大批判。“文革”期间，大批判火上加油，罗老被迫写“检讨”。但是，无论是1964年，还是“文革”十年，虽然所写的“检讨”文字高可盈尺，但他始终只检查自己受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毒害，而

没有认为自己与李秀成伪降的考证错了。谁都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够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事。说明一个真正的学问家坚信真理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无私无畏。正如罗老所说：“在学术研究上，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有时就不免触人之怒，犯人之忌。”但是，“真理如果在自己手中，虽千万人反对也要勇往直前。”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在“大批判”当中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曾家口碑 和她于1977年扶病挣扎写给罗老的亲笔信，现在已经披露于世，真相大白，完全证实了李秀成确属伪降的结论。罗老这种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

余光中的读书境界

伍立杨

余光中是身居海外的中国大作家，他那浮雕式的文学语言，以感情的狂狷浪漫而又约束于古典的均衡清远，在高华灵动的语感之间，包含着博大深邃的当代人文思想。

他不仅以综合的诗、交响乐般的散文、力能扛鼎的文学评论，雄视于当代世界华语文坛，并且他的读书境界，也是孤标灿灿，令人心仪。余先生的作品雄踞当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弹性和密度的试验，——即要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有这样的底蕴，则他的读书方式，也颇有它特别的地方了。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读书观点，当是以读出智慧为高，并非只是纯粹知识的积累和增加。知识爆炸当然增加了为学的途径，但是“知识爆炸不一定是智慧增高，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智慧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开卷如开芝麻门》）余先生的话当蕴涵两层意思，一是智慧的选择，一是智慧的汲取。这样的读书其目的和意义又在于“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这可以说是对读书哲学的精辟概括，同时也揭示了古往今来的读书三昧。

有人认为读书是逃避现实，余光中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读书既是扩大现实，也同样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而“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这无疑为奇谲独到的超拔说言。叔本华认为重要的书应当重读一遍，其所谓重要的书，也即是余先生说的智慧之书，那么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余先生以为当首先看文字，先翻一两页，文字不好，就不读了。这种态度，并非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也一定混乱。”他曾经叙说香港报纸副刊众多专栏作家中颇有几枝妙笔“这几枝妙笔意气风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是从文字和文采着眼，因为这似乎就是文学的根本。去年春天余先生赐信给我，说他1990年为九歌出版社主编了十五册一套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收纳宏富，选录标准也在这一路，可惜大陆看不到。

读书读出了兴味，确乎可以绿满窗前草不除的。他认为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坐在桌前，不一定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嗅嗅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书斋·书灾》）精读固不可少，略读也很必须，余先生称之为“点头之交”，因为一日需要深交，才好去找。

在《何以解忧》中，余光中以为美酒烧愁只能烧起一片壮烈的幻觉，不能到心。在他本人，读书才是解忧的妙方。包括曼吟古诗，翻译自己钟情的外国文学名作，以及夜观苍穹和驾车独游，无一不是读书的外延。身居台湾的中国大作家李敖，藏书逾十万之数，余光中藏书也逾万数，他们平时驾驶道奇、林肯、凯迪拉克种种名车出游，后箱里也装满了书籍。诗穷而后工，物质的过于发达甚至阻碍了文学的素质提高，但在真正的大作家，有闲并不减缓他们的文采与思想，心灵的大痛才是他们接通人类生活的熔点，所以他们虽然住华屋、驾名车，享受现代工业的种种优势，因为善于利用其优势，

仍然领人类文化发达之先锋。读书乃其一端，并不太受到后工业时代气焰的冲击。

合作的辉煌

丁亚平

4年前，当南京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在上海找了老翻译家杨岂深，在北京找了钱钟书、冯亦代、叶君健之后，又找到萧乾与文洁若夫妇时，萧乾在夫人文洁若的鼓动之下，一口就将《尤利西斯》这个大工程应承了下来。如今4年过去，虽然他们面对这部旷世奇书，艰辛耕耘，付出巨大心力，但是，这些年来，他们在将自己全部的工作热情、全部的时间精力倾注到这个大工程上时，却也颇觉愉快。

全书十八章，现在他们已经翻译到十七章，就剩最后一章了。他们仍在忙乎着，仍然每天早晨五点就起来静静地坐到工作灯下，仍然是一天一人初译一页原文、一人校译十页译稿地这么译下去，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现在已经逐渐尝到成功的喜悦，和战胜困难、实现梦想的温馨与幸福。

由南京方面传来的最新消息说，他们的中译本上卷刚出版一个月，印数就已高达十余万册。这堪称当今文化生活中的奇迹。据悉，该书中卷七月初推出，年内全书出齐。与此同时，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也将同步推出他们译的《尤利西斯》中文繁体字本。此外，译林出版社在出齐上、中、下三卷平装本之后，还要另行推出一套上、下两卷的精装豪华本。这些，都令他们欣喜、激动。

但令他们更为欣喜、激动的是他们之间首次进行即获大成功的非常默契、和谐的辉煌的合作。在性格、年龄和阅历上，两人原有许多不同。两人比起来，文洁若喜静，萧乾爱动；文洁若内倾，萧乾外向；文洁若不擅言辞，萧乾颇善交际；文洁若勤奋刻苦，萧乾倚傍性灵，疏于坐冷板凳；文洁若对创作心向往之（她曾出过两本散文书），却是一直还在译坛耕耘，萧乾对译事往往敬而远之（在过去，翻译只是他的一根救命稻草），主要在文学园地里流连徜徉；文洁若在翻译战线上很坚决地打着阵地战、持久战，萧乾则无心恋战，只打游击，甘作一个“游击战士”。两人努力配合，互补短长。译《尤利西斯》的过程中，文洁若强调一定得把原作所描写的事物完全弄懂才可着笔，萧乾则更看重译的时候要用最准确无误也最文学化的语言把自己所理解的传达给读者。有时候，萧乾丢了个“小零件”，文洁若就给补上；又有时候，文洁若译得太“硬”的地方，萧乾就给作些文学“疏散”与梳理工作。翻译的美学和成就，半个世纪以来的美丽而灿烂的梦想，就在这样一份最感人最和谐的配合中，在毅力与耐心中，在相互扶持中完成了。

文洁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室的老编审、资深翻译家。自1950年由清华西文系毕业分至出版社（先是三联书店，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来，勤勉劳作，迄今已出译作30余本。而萧乾更是著作等身，著、译（包括在英国出的五本英文著作）近百册，可谓成果丰硕。但他们四年来联袂支撑的这项大工程，则是他们的扛鼎之作，圆梦之作。

文洁若精通日文、英文，早在1947年在清华读书时就接触过《尤利西斯》。至于萧乾，他和《尤利西斯》结缘，那就更早、更深。1929年在燕京、1932年在辅仁读书时，他就曾听美国教授包贵思和雷德曼（后者还是个爱尔兰裔的神父）分别讲起过。1940年初夏，他第一次啃读了这本“天书”，并在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

影响。可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1942年，他在剑桥读研究生，重点研究了乔伊斯等心理小说家，对《尤利西斯》有了比较深入的钻研与认识。

被誉为西方现代文学大师的詹姆斯·乔伊斯的这部代表作，也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作品写的是布卢姆和他的妻子摩莉以及他们的“精神上儿子”斯蒂芬·迪达勒斯三个人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十八个多小时里的活动。萧乾与文洁若在对这部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的魅力无法抗拒之后，经由自己的心与手，自己的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这部旷世奇书献给了中国的广大读者。他们合作的辉煌与深刻在于，不是简单的夫唱妇随，是一双热热的心灵在作证，为中国，也是为世界。

嗜书如命以文为乐——追忆廖沫沙同志

李筠

廖沫沙同志是一位满身书卷气的老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嗜书如命，以文为乐，在党的新闻、思想、文化战线上，以笔为枪，为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奋战了一生。他既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又是学识渊博的文人。

廖沫沙同志，湖南长沙廖家垅人，生于1907年1月16日，原名廖家权，后来用得最多的笔名是繁星。1930年入党，30年代开始投身文坛，逐步成为著名的杂文作家。其实，他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上过几年私塾，读过初小、高小，湖南长沙师范毕业，按现在说法不过是中等文化程度。后来在上海艺术大学旁听了两个学期，连正式大专的文凭也没有，更谈不上硕士、博士了。但他的学问很大，很渊博，特别是在文史和马列理论方面，列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当之无愧的。他为什么能从破落的农家子成长为著名作家，奥妙就在于他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书痴，由刻苦自学而成才。

沫沙同志从小就是个书迷。1922年小学毕业后，该上中等学校了，但整个暑假他都埋头读书，竟耽误了第一师范的考期，以致失学了。后来发奋自学，补考插班入了长沙师范。其对读书的痴情，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他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师范毕业后，为谋生流落到上海，一时工作无着，生活困难，但他并没有混日子，而是一头钻进了上海东方图书馆，天天啃着干粮，苦读起来。一方面，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以及大量的进步书刊。另一方面，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托尔斯泰、高尔基、左琴科的著作以及《浮士德》等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这对他确定革命的世界观和走上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0年沫沙同志入党后，在长期的激烈的革命斗争中，他仍是手不释卷，笔不辍耕。他的信条和做法是；做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写什么，为革命而学，为战斗而写作。沫沙同志有一个集子，书名为《纸上谈兵录》。那是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时发表的军事评论集，评论1947年4月到1949年4月的解放战争的战役、战斗及其发展形势，约六十篇，差不多是每周一评。沫沙同志在后记中说：我从来没有拿过枪，上过阵，为什么写起军事评论来呢？因为军事问题是当时的主题，是革命的需要。于是他就学起军事来。首先是精读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其次还读了许多中外军事名著，如《孙子》、《吴子》、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等，同时还要阅读大量的战报、国内外的有关报道。由此，他也养成剪报、摘抄资料的习惯。沫沙同志又总结出—条经验：“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边写作，—边读和学。

沫沙同志曾写了许多文章，对如何学习读书，读什么，怎么读，读和用的关系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仅在《三家村札记》专栏中，他就写有《不要囫圇吞枣》、《读书备忘两则》、《学用要—致》、《开卷有益和坐井观天》、《教然后知困》等，都对指导青年读书起到应有的作用。

30年前林彪、“四人帮”—手制造了三家村文字狱，邓拓、吴晗死于非

命，廖沫沙同志奇迹般地成为惟一的幸存者。文革后，沫沙同志曾戏称，他之所以大难不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得益于他的书癖。有书读，他就可以忘却一切烦恼。钻到书里，乐趣无穷，特别是反复读马列的书，圈圈点点，批注点评，读通了过去未懂的道理，自信真理在握，处之泰然，有何惧哉？写交待材料也能写出俏皮来。

沫沙同志于1990年12月27日谢世，得以高寿善终，至今整整5年了。他留给我们许多精神财富，挚爱读书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可贵品质。现在有的人哀叹生不逢时，良机不我降；有的爱钱大胜于爱书，有的浪荡时光，虚度年华。其实，成才之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在学校读书，固然幸运，在工作岗位上，照样能苦读成才。我们追忆沫沙同志的人生轨迹，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示的。

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钱学森与《城市学与山水城市》

顾孟潮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一部纯学术理论著作，一部未经刻意包装的朴素读物，仅仅出版了一年多时间便得以再版。作为编者和作者之一，我确有点喜出望外。静而思之，我意识到，书的出版成功应当首先归功于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思想和专家们的辛勤劳动。

作为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专家、工程控制论、系统论专家的钱学森，对城市建设、城市规划也十分关注。早在 80 年代中期，他就首倡组建了一门新学科：城市学，用系统工程整体观点研究城市问题。1990 年 7 月 25 日、26 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关于菊儿胡同危旧房被改建为“北京的楼式四合院”的报道。钱学森内心十分激动，当即致函吴良镛教授，表示祝贺。信中提到：“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溶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由此，钱学森的名字和山水城市紧密联系起来，山水城市也成了国内外城市学专家研究的重要课题。

应该说，钱学森关于山水城市的构想已孕育很久了。早在 1983 年，他就撰文强调中国园林是景观、园技、园艺三个方面的结合，并提出，要以中国园林艺术来美化我们的城市，使我们的大城市比国外的名城更美。经过了几年的努力，1993 年 2 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山水城市讨论会”，钱学森提交了《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的论文。文章最后提出，山水城市的设想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的结合，山水城市不该是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吗？论文在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对于城市化逐步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钱学森的关于城市学和山水城市的倡议可以说适逢其时，不仅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响应，而且得到不少城市领导的支持。有些城市还明确提出建设生态城市、山水城市的战略目标。目前，这一研究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作为历史的记录，也为了便于开展系统研究，我们编辑了这个集子，收集了钱学森的有关论述和大家的研究成果。

在第二版刚刚问世时，我们再次拜访了钱学森先生。据说，他现在基本上闭门谢客，接见我们实属破例。他还特别允许我们照相、录音。由此可见，他对山水城市研究是十分重视的。当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时，他已经在客厅等候我们了。他依然那样朴素、谦逊。谈到前几年我国的城市建设，他回忆说：几年前，我就看到，北京市建起的一座座长方形高楼，外表如积木块，进到房间则外望一片灰黄，见不到绿色，连一点点蓝天也淡淡无光。当时想，难道这就是中国 21 世纪的城市吗？提起山水城市，钱老没有忘记为北京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些专家。他说：至于我那篇城市论文不过是将梁思成先生、吴良镛教授、贝聿铭先生等的思想用“山水城市”一词表达出来而已，发明权应归他们的几位大师！钱学森的人品如同他的学问一样，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越挫越奋——邵道生与国民心态研究

郭洪新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什么该遵循，什么该重新肯定，什么该重建，成为许多人思考的难题。在独自思考的同时，人们往往以渴望的目光，注视着社科工作者理性的回答。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邵道生先生，相继推出了《中国的困惑》、《怎样做人：一种“不能太……”的说法》，而且同时流行起来，足见读者是盼望已久了。

夏日的一个早晨，我敲开了邵道生先生的家门。视时间如生命的他，正在打字机前神情专注地工作着。谈到他的两部新著的热销，他认为，首先应该归功于把社会科学研究搬进现实生活之中。的确，从这两部书的内容看，他研究、撰写的都是社会所急需的，老百姓关心的，用通俗的话来说，都是社会的一些焦点、难点、热点、疑点，譬如，在《中国的困惑》一书中触及到了不少诸如社会风气、伦理道德、腐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

研究这些课题是有很大难度的。一是老祖宗的书没有现成的答案；二是洋人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三是这些问题很敏感，不少人回避犹恐不及。因此，尽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在社会学领域喊了很久，却依然少有触及现实的力作。邵先生对此有他的主见。他坚信两点：一是不能回避，中国的社会问题一定要由中国人去研究，这是自己的责任；二是要看到社会的大环境越来越好，堂堂正正地做学问，何必担忧。正是这种治学态度，使我在读罢这些书后，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早在80年代初，邵道生刚到中国社科院心理学所时，他便树立了以社会心理、国民心态为主的研究方向。每年几乎花费一半时间到少管所、劳改队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70年代末至今，他发表了数百篇文章，专著、译著40余种，总计500余万字。他的研究受到读者的喜爱，很具生命力。

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现实问题没有理论。邵先生则不以为然。他说：“不少人有这样一个理论误区，对外国的东西迷信得要命，似乎越深奥、晦涩、越看不懂，理论水平就越高。其实不然。毛选、邓选中几乎没有难懂的话，却处处闪烁着理论的光辉。洋人的理论是研究洋人社会的结果，不是不可以借鉴。但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只能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总结出来。”邵先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作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反复思考和提炼、总结，因而他写的书深刻而严谨，价值自然很高。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几百万字的著作大都是在患病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争分夺秒，奋力拼搏，为社会贡献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谈到疾病，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感到生命给予我的时间已经不多，因而更需要抓紧时间，把更多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越挫越奋。邵道生请人把这句话写成一个横幅，挂在书房中，时刻提醒自己，要经受住人生的一次次挫折。

从邵先生家中出来，盛夏的暑气已被淅淅沥沥的雨水驱散。走到爽洁的马路上，我猛然想到，专家学者的这种走出象牙塔的研究，对我们这个正在变革的社会而言，不正像一场夏日的及时雨吗？

清新典雅的出版行动——方鸣及其策划的“东方书林之旅”

郭洪新

与读书界同仁谈天，不约而同集中到一个话题：“出版狂”方鸣和他策划推出的一套颇具影响的丛书——“东方书林之旅”。在这套装帧、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的高品位文化读物面前，大家都感觉到了心灵的震撼，并为出版艺术的美妙而动情。

读书是一种心灵和视觉的享受。但当我们在浩如烟海的书林中徜徉时，却不难发现出版界对图书的“包装”重视不足。单调的白纸黑字、古板的封面设计，令图书与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不相称。“东方书林之旅”在图书的外表上大胆创新，书的套封精美清雅，护封则讲究色调与图案的和谐，配以淡色高级牛皮纸；书内正文采用浅黄色纸张，给人既亮丽雅致又古朴清新的美感。见到这套书，就像看惯黑白电视的人，第一次欣赏彩色电视。

另外，策划者匠心独运，将六个书系以宋词词牌名冠之，而这些词牌的文化意蕴恰恰与作品相符。“满江红书系”收录以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为主题的思想型学术著作；“采桑子书系”研究当代思潮和现代文化现象；“清平乐书系”以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现象为主题；“西江月书系”重在研究西方文化现象和世界文化潮流；“如梦令书系”以优美的散文笔触，书写人生的境遇和体验；“一剪梅书系”主要是随感录、断想集。据方鸣介绍，之所以如此，是力图追求人文精神与当代人心灵间的感应、契合与交流。

为了强化丛书的文化意蕴，策划者在每一种书的封面上，均印一首与该书所从属书系的词牌一致的词，使其十分传神地把书的内容的文化意蕴连接和传递出来。譬如，在《东方诗魂》一书的左下角印着晏殊的词：“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封面儒雅的人物画，古色古香的边沿，广博高妙的内容，加上这首宋词，使整部书洋溢着书香，体现着品位。尽管这套书涉及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文化、人生随感，甚至包括许多近些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如摇滚音乐、镭射影片等，但由于每种书都冠有宋代词牌和妙词，令人读来轻松顺畅，备受启迪。每种书虽观照一个方面，但作为“东方书林之旅”的一部分，它们又相互关联，相互照应，万川归一，整体上构成了一次规模和声势巨大的出版行动。

在水波迭兴的出版界，“东方书林之旅”的推出，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使不少读者成了乐意追随的“旅游者”。这让我禁不住要谈谈策划者方鸣。这位年仅38岁的图书编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77级高材生，30岁即任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副主任，在出版界早已小有名气，颇有影响的《婚姻革命》由他责编，作为“出版社的国家队”——人民出版社的少壮派，他坚信出版是一种“艺术”，先后策划编辑出版了《三个面向丛书》、《东方学术丛书》、《百卷本经济全书》、《名士雅品小集书系》等20多项大型丛书、套书，其中10余部获全国或省级以上图书奖。他自谦为“超级书迷”，为了寻求出版艺术的真谛，他不趋时尚，坦诚地守着为他人做嫁衣的阵地。谈及这套丛书，他说：“我们一路相邀，边走边唱，且思且梦，亦读亦行。哲学，宗教，思想，历史……。书林浩瀚，风光无限；生命，情感，追求，体验……。人生壮丽，理想永在。我们在读书的旅途上相聚，这是心灵之约。”

从“东方书林之旅”中，我们看到了精品图书的艺术魅力；从方鸣这批青年编辑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出版事业的希望。

拾麦穗老人的执著——丘良任先生与《竹枝词》

蒋寅

《竹枝词》原是唐代流行于巴山楚水长江中游地区的民歌曲调。中唐诗人张籍有句云：“向南渐觉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可见它的传唱是非常普及的。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士大夫游宦贬谪多向南地，浪漫而绮丽的巴楚文化、生动活泼的民间音乐，给白居易、刘禹锡这些生长在中原的文士以十分新鲜的刺激，当他们像屈原作《九歌》一样用《竹枝词》的民歌曲调，仿民歌的风格作诗时，就为唐诗增添了一种绝不同于南朝乐府民歌的全新的艺术创造。

白居易作竹枝词四首，刘禹锡作有《竹枝词》十一首，摹写风土民情，天然流利，宛转多姿。风气一开，后人竞相仿效，晚唐有李涉、皇甫松、孙光宪步踵而作，宋代自苏东坡、黄山谷、范石湖、杨诚斋以降，作者不乏其人。元代杨维桢《西湖竹枝歌九首》传为名唱，和者百计。明清两代，地域风土意识愈益强化，遂有全面歌咏一地风土的《竹枝词》专集出现。若搜集齐各种典籍所载的《竹枝词》，总数将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数字。这笔财富不仅对诗歌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民族文化史研究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以古人的观念，“竹枝泛咏风土”（王渔洋语），后人专以纪一时一地风物民情，尤贵在搜奇猎异，所咏无非是方物土产，奇风异俗。有时还涉及一些特殊的内容，如明代邝露有《农桑竹枝词》三十一首，清代叶燮有《吴江大水竹枝词》四首，佚名有《长沙抢米竹枝词》七十四首，何振鏞有《长沙大火竹枝词》十首。在地域上，竹枝词歌咏的地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远及海外（尤侗有《海外竹枝词》一百首、局中门外汉有《伦敦竹枝词》一百首）。其中尤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上海一带为多，一是最不开化的地方，一是最开化的地方，二者都有让人惊奇叹异的东西，故为人津津乐道。正因为竹枝词写作有这种猎奇动机，所以其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民俗民情的地域文化资料，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神话学乃至文化人类学尚未开发的一座宝库。

现已 80 多高龄的丘良任先生，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潜心搜集《竹枝词》。近十多年，他常年跑图书馆，查阅、复印、抄录，又托友人多方访求，从无以计数的浩繁典籍中搜辑得上千位作者的数万首《竹枝词》，而且多为几十首上百首的专集，相当一部分还是罕见的钞本、稿本，最终使《竹枝词》的巨观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先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二百二十四家撰写《竹枝纪事诗》一书，以竹枝词本身的形式来论述竹枝词，每首诗下系以叙录，或述其源流，或撮其内容，或论其影响，或稽其本事，凡珍本善本均说明收藏处所，而诗中内容有关乎社会风俗、可印证古史记载的也予以指示，迭见胜解。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丘先生写了《竹枝词与中华各族民俗》《竹枝词与山海经研究》两篇文章，用《竹枝词》中保留的古史和民俗资料与古籍相印证，为古史和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丘先生的辛勤劳动为发掘、整理竹枝词这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作出了可贵贡献。他的功绩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肯定，《竹枝纪事诗》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赢得广泛好评，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曾以“拾麦穗的

老人”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拾麦穗”是丘先生的谦称，说实在的，他是在挖掘一座金矿啊！近闻这部《竹枝词》的总集已被黄山书社接受出版，那么就让我们翘首企盼它的问世吧。

丹扉话题

王景山

台湾女作家丹扉的杂文集《热门话题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是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马宗融先生的女公子马小弥女士，从丹扉在台出版的《微雨轻尘集》等 12 个集子中，精选 97 篇编成。

既是杂文，人情世态的涉及面自然是广的，但她谈幼教、谈联考、谈留学、谈住房问题、谈治病求医、谈安乐死、谈流行歌曲、谈男女平等、谈养儿防老、谈新女性主义，一直到谈“拳头枕头”电影……大概两岸读者都会承认这是热门话题。

其实丹扉本人，亦是话题。

丹扉自命为“杂文手”，被誉为资深专栏作家，已出版杂文集 20 余册，现为台湾《仕女》杂志发行人，知名度是颇高的了。但她的本名郑锦先，反倒鲜为人知。她生于 1926 年 9 月 8 日（农历八月初二），现在是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了，但完全不像。我在读其文又识其人后，说她是老年的年龄、中年的身影、青年的精神、少年的心情，她似乎是默认的。

丹扉是福建龙游人，父亲一直做法官。抗日战争开始，她们全家从漳州迁往四川成都，初中读的是教会学校华美女中，高中读的是省立成都一中，大学进的是内迁的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1948 年在南京毕业。抗战八年的内地学生生活，给丹扉留下深刻印象，她的杂文中不时忆及，直到现在，她身上仍保留着当年的那种学生气。

她于 1949 年春从上海去台湾，当时她的父母和兄、弟、妹都在大陆，只说单身去玩玩即回，谁知这一玩就是 40 余年。40 多年来，在家庭里，她为人妻，为人母，养育了三个爱女，称为大猫、二猫、小猫，成为她杂文中永恒的主题；在社会上，曾任记者、编审、总编辑，其间还曾任中学教师达 10 余年之久。先后为《皇冠》杂志、台湾日报、台湾时报撰写专栏，活跃于台湾文坛。

丹扉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是：“本色”。台湾著名女作家、《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在《剪影话文坛·说不尽》中描述丹扉是，“脸部不施脂粉，头发清汤挂面，衣着长裤短衫”，并认为她能说出别的女性所不敢说的话，而又绝不是妇女运动者，“只是她本色如此”。马小弥在《热门话题集》编后记中指出：“丹扉文风朴素自然，信笔写去，家长里短海阔天空，轻松隽永，有锋芒却不毕露，细细想去，又颇有新意”。我以为这些评论，都是极有见地的。

丹扉杂文的“本色”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她为文从不讳言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以“家务卿”议论“家务”，以“妇道人家”发表“妇人之见”自豪。特别是她在以母亲为题的系列杂文中，把纠结在一起的为人母的艰辛、悲酸、欢乐、慰安和对下一代的挚爱、期待、焦虑、无奈，一一写出，感人至深。然而她又不是只关怀着一己的子女，由小见大，由此及彼，杂文中从家庭琐事引出了众多重大社会问题。

其次，是她的杂文无架子，无说教气，无训人的凶恶面孔。虽也议论热门话题，虽也贬斥不良现象，虽也快人快语，甚至一针见血，但却多娓娓而谈，妙语如珠，寓庄于谐，谑而不虐，让人感到她不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

而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平等待人。再次是行文平易，不事雕琢，全无朦胧隐晦之处，直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适怎么说就怎么说。然而她的平易不是平淡，更不是平庸。短话长说，滔滔不绝，飞流直下，欲罢不能，是她杂文的总体气势；有曲有折，有分有合，有浪花朵朵，有水珠四射，是她杂文细部的形迹。

女性作家而以写作杂文为主者，海峡两岸都不多见。集“家务卿”与“杂文手”于一身，并扬言是“妇道人家”发表“妇人之见”如丹扉者，恐怕更是绝无仅有。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乐于以丹扉为话题向读者介绍的。

陈重远和他的三本“古玩书”

叶祖孚

1769年，乾隆年间的大藏书家李文藻写下了《琉璃厂书肆记》。1912年，清史馆总纂缪荃孙写下了《琉璃厂书肆后记》。建国以后，琉璃厂的古籍专家孙殿起和雪梦水又先后写下了《琉璃厂书肆三记》和《琉璃厂书肆四记》。这些文献都为琉璃厂古旧书业的发生、发展、人物、店号作了详细的叙述，为我们研究古都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但是琉璃厂的古玩业却没有资料，它们匆匆忙忙地开业，又匆匆忙忙地歇业，变化频繁。到解放前夕，只留下几家奄奄一息的古玩铺，没有系统的文字资料。这使得很多人长期以来引以为憾。

1986年陈重远先生离休了。他年轻时在琉璃厂古玩铺学过徒，他家好几代人都与古玩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用十年的时间不辞辛苦地访问了古玩业500多人次，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90年7月他写了第一本书：《古玩史话与鉴赏》，这本书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后很短时间内重印了4次，印数达2万多册。最近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了他更加完美的著作《古玩谈旧闻》、《文物话春秋》两本书，又引起了读者的普遍重视。这样，他就为读者捧出了他呕心沥血撰写的三本“古玩书”，也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他的书告诉了人们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北京解放前夕，琉璃厂一共开设过122家古玩铺，这些古玩铺的铺位所在，师承关系，并由此形成了几大门系。琉璃厂开业时间最早的古玩铺是博古斋，它开设于道光年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歇业。琉璃厂开业时间最长的古玩铺是德宝斋，开业于1851年，1945年歇业，一共开业了94年。德宝斋的名字还与我国著名铜器文物毛公鼎联系在一起。道光末年陕西岐山出土了一只铜鼎，咸丰二年（1852年）陕西古玩商携鼎来北京琉璃厂求售。德宝斋的刘振卿与博古斋的祝锡元最先见到这只鼎，刘振卿请当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来鉴定，陈介祺确定这是西周初期成王时铸的鼎，鼎上铭文是说成王册封武王之弟毛公的事，因此他把鼎起名为“毛公鼎”。这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器之一，是件价值连城的国宝。陈介祺用3年俸银收购了这只毛公鼎，珍藏了53年。陈介祺去世后官僚端方强买了这个鼎。端方死后，其子女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道胜银行，日、俄、美等国都愿出高价来赎买这只鼎。后来叶恭绰先生赎回了鼎，精心保护，最后收藏在中央博物院。像这类趣味盎然的文物故事，三本书中有大量的记载。

由于古玩是我国悠久历史的证物，因此它也是帝国主义者垂涎三尺的宝物。帝国主义分子很早以前就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除了直接从圆明园中抢走以外，还勾结一些不法奸商盗窃国宝偷运出境。普爱伦勾结琉璃厂古玩商岳彬偷盗龙门石雕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30年代普爱伦将龙门宾阳洞中石刻雕像“帝后礼佛图”照了相，然后与岳彬订立合同，以5年为期，由岳彬派人将这块雕刻打碎，运往美国，再将碎石块粘成原状。现在这一石刻一块陈列在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一块陈列在美国堪城纳尔逊艺术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国家在岳彬家中搜出了他与普爱伦订立的合同以及凿碎了由于黏对不上因而留下的两大箱石块。由此证实了岳彬与帝国主义勾结盗卖文物的事实。

陈重远写的三本“古玩书”，包括了琉璃厂、隆福寺、西湖营各个方面的古玩文化，集中地描写了我国传统的士文化的一个侧面。我国的爱国知识分子都以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士文化为己任。鲁迅是这样的，邓拓也是这样的。陈重远的“古玩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我国士文化的知识，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列宁《哲学笔记》与我的哲学史研究

张岱年

西方的哲学著作大多是长篇大论、论证详密；而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则比较简短，多系精言隽语、而辞约义丰。已故老友温锡增同志有一天对我说：中国哲学书大多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西方哲学书大多是绕弯儿，往往是绕了很多弯儿才提出自己的观点。温先生是西方哲学史专家，他的这段话确实指出了中西哲学著作的不同特点。现代西方的许多哲学著作动辄五六百页，其实大部分是冗赘重复的词句，未免浪费读者的时间。

现代西方哲学著作中也有以精言隽语的形式出之的，最重要的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我初次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在20年代末读李达所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时候，其中引述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若干段落，我读后深受启发，欢喜赞叹！50年代，《列宁全集》中译本出版了，其中38卷是《哲学笔记》，使读者可以窥见《哲学笔记》的全貌。最近重新编印《列宁全集》，其中《哲学笔记》较38卷本更为完全。最近中央党校又出版了林利等译校的《哲学笔记》，这是值得欢迎的。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有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执，康德企图综合两者，而走入先验论与不可知论，其实并未解决问题。列宁《哲学笔记》论人类认识的发展阶段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38卷本181页）这段话虽然简短，确实解决了理性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列宁又批评康德说：“在康德那里，认识把自然界和人分隔（隔离）开来；而事实上认识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同上书88页）我认为这一对于康德哲学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深刻的。

列宁高度赞扬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力图加以改造，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了深切的阐发。《哲学笔记》中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同上书240页）这是一段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非常深刻的论断，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哲学笔记》中“辩证法的要素”一节有一条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同上书238页、239页）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必须对于事物、现象、思想、观念进行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加以综合，才能达到正确的、全面的认识。

50年代以来，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因而对于列宁关于哲学史的论述特别注意。列宁《哲学笔记》中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同上书188页）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指南。我研究中国哲学史，一向注意对于中国哲学中概念范畴的分析与解释，读了列宁的这段话，就更加肯定对于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的重要了。近年以来，很多同志写出了关于中国哲学范畴史的论著，都是受列宁的启发而开展研究的。

近些年来，似乎唯心主义哲学颇受青睐，我则认为唯物主义哲学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而辩证法更是最重要的思维方法。列宁《哲学笔记》中充满了深切精湛的观念，将永远发放着灿烂的光辉。

我读书的一点“传奇”

权延赤

那时我笨。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始终弄不清别人走路为什么两腿打弯？更弄不清5个苹果吃掉2个还剩多少的“还剩”是什么意思？语文、算术、体育年年补考仍然不及格。

三年级的暑假，我读了《三国演义》。至今我都惊讶是怎么读“懂”的？而且入了迷。不认识的字很多，但越是不认识的字越能刺激我想象无边；越想越神奇，越想越诱人，越想越美妙。这大概要归功于汉字的“象形”吧？我记得那时废寝忘食，两天两夜不合眼；读得又哭又笑，想得手舞足蹈。按捺不住去给小朋友们讲，自然是把《三国演义》又演义了十万八千里。接着，一口气又读完了《水浒》和《西游记》。

一个暑假读三本书，“立竿见影”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语文课本发下来，半天便读完，只留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算术书竟也一口气读完，它比《三国演义》简单多了！再翻翻我的学生手册：三年级以前，各门功课没有高于65分的成绩；三年级以后，没有低于95分的记录。我再没上过什么自习课，只是到处找书看。看的是文学、政治、历史等书籍，数理化却跟着成绩好。小学6年级请假117天，学生手册上有记录。老师能容忍，因为到校参加数学统考，全市只有两个满分，我是其中之一。中学两次参加数学竞赛，两次均获第一名，奖状保存至今。

倘说这三本书给了我生命的新起点，那么，将我生命的终点与起点不可改变地联结起来的便是一本薄薄的残书。

大学毕业后，由于“文革”造成的种种原因，我一直在部队里“打杂”，与所学“自动控制”专业隔天河相望，直望过了“而立”之年。我借酒浇愁，两天一醉，并有三次被送入医院抢救，很没出息。一位宣传处长劝我：“小权，要振作起来。别的路走不通，就写写东西试试么。”

我喝茶解酒，流泪排毒，想了三天，决定试试。兵营里没老师，只能向书求教。十年浩劫，哪里去找文学书籍？费尽气力，在当作垃圾的废纸堆里找到一本薄薄的没头没尾的残书，是马烽的短篇小说集《我的第一个上级》。其中《韩梅梅》是完整的一篇，并且是我学生时期读过的课文，我没读几页便泪如泉涌了……

同样是这篇文章，如今我读了十几天，读了几十遍不止。一字一词一句一段地细细琢磨。文章就是这样：读一遍也能说懂，读十遍也可说不懂，读几十遍也只能说懂了一点。不过，懂与懂不一样。放下马烽的书，我试着写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当时部队在山西，这篇处女作便寄给了《汾水》。5天后，文章被采用，并被收入《三十年优秀短篇小说选》。

现在，我发表了400余万字的作品，读书也有几千卷。有些书读过就忘了，但那本薄薄的没头没尾的残书，我一刻不曾忘，今后也不会忘。

童话、神话名著对我的启发

方掬芬

我从艺 40 多年，一共演过 40 多个角色；其中为大家熟知的有：《马兰花》中的小鸟、《玛申卡》中的玛申卡、《以革命的名义》中的别佳、《报童》中的蚰蚰、《奇怪的 101》中的远航等等。现在虽说年纪大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蹦蹦跳跳了，但我的心却始终和孩子们在一起。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会特别兴奋，感到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说起来，我能从事儿童戏剧工作，与我的家庭熏陶和读书生活是分不开的。我的母亲从前是小学教员，父亲是小职员。受他们的影响，我在念高中时上了师范学校，上大学报考的是戏剧专业。刚上完一年级，苏州解放，我和另外 3 位同学被苏州市学联推荐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6 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我又成为她的一员，一干就是 30 多年。在此之前，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时，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并养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现在，不管工作有多忙，回家后也要看一会儿书。

作为一个演员，如何才能演好一个角色？我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要深入实际生活，这是艺术的直接源泉；另一个是要阅读大量的书籍，这是艺术的间接源泉。有时，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重要。比如在接到《以革命的名义》剧本时，我阅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有关章节，观看《列宁在十月》等电影，还看了苏联小说、美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尽可能熟悉剧中人的时代和生活。最后，我争取到了别佳这个角色。此剧曾在莫斯科演出，在中南海演出，并被拍成了电影。

在读过的各种文学书籍中，我最喜欢中外著名的童话和神话，尤其是安徒生、格林及吴承恩、蒲松龄等人的作品。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品，我读了很多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和体会。那些富有积极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童话和神话，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的故事，歌颂了真、善、美，抨击了假、恶、丑，它对于我知识的丰富、性格的培养、想象力的发挥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爱看童话，还演过不少童话，如《马兰花》、《大灰狼》等。孩子们看童话剧时非常开心，是因为各种可爱的小动物更容易被他们接受，他们能从中学到许多事理。我也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把世界上著名的童话介绍给小观众。现在，孩子们拥有不少学习、娱乐的方法，像游戏机、电视机、卡拉 OK 等，但童话、神话仍有它自己持久的魅力。希望孩子们去阅读它！

《家》与《西行漫记》促使我走上革命路

夏淳

关于读书的好处，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诱人的说法，像“一书在手，事事皆通”，说得未免有些神了，唯“开卷有益”这种说法确还有点道理。我虽说不上是手不释卷，但也还算是比较喜欢读书的。如今，忙的时候，我用读书换换脑子，既是一种休息，又丰富了知识。大部分的书，我常是在病中住院的时候，把它们读完（或者叫作啃完）的。

回想起过去读书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有的书甚至对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对家庭、社会的认识都有重大的影响。从读高小时起，我就对课外读物有兴趣。那时所爱看的书都是什么《七侠五义》、《小五义》、《济公传》之类。稍后一些就比较爱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再后才喜欢看《聊斋》、《红楼梦》。说起来，这些都是所谓“闲书”，可对我干的导演这一行还真有好处。譬如，我导演《雷雨》、《茶馆》、《天下第一楼》这一类戏的时候，这些书中的场景、人物、语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九·一八”以后，我在思想上起了比较大的变化，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意识占了重要的地位。这时，我结识了一些爱好文艺的有进步思想的同学，他们不断地介绍给我一些进步书刊和文艺作品，其中对我有明显影响的是巴金的《家》。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和《家》中的人物都对得上号，书中的几个年轻人物也和我的兄弟、表姐极相似。觉慧的一些进步思想和反抗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对我那个封建大家庭的诸多丑恶现象感到厌烦，感到苦闷，进而产生了憎恨和要抗争的念头，而这种反封建的思想的萌芽是促使我毅然参加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契机。由于参加学生运动，我被原来的学校开除了，后转到镜湖中学就读。学校教英语的老师是斯诺先生的秘书，他给我们介绍了《西行漫记》。这部书看得我真是有些不忍释手，从此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了解，对党的领袖人物产生了直觉的敬爱之情，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信念。由此可见，一部好书对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起到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

我以后参加了“演剧队”，不论是从革命的需要，还是从戏剧专业的需要，都要看书学习，补自己之不足。于是，我真有些嗜书如命。油灯之下不忍就眠，常至窗外见曙方肯掩卷休息。所读的书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有关革命的理论书、哲学书，如《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另一种是文学方面的书，几乎凡是能弄到手的世界名著都一一读过。在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哥德、狄更斯、马克·吐温等文学大师的作品时真是如入宝山，感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每读一卷，都觉得心灵又得到一次净化，思想又得到一次升华。更大的好处是给自己奠定了读书的爱好，至今仍保持着这种习惯。

《吹兵》对我的启发

张凯丽

电视剧《渴望》播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北京日报《读书》版编辑找到我问：“你能成功地扮演刘慧芳这个角色，与你平时读书学习有关系吗？”我说：当然有，而且关系很大。下面就谈谈对我扮演刘慧芳这个角色发生过直接作用的一本书。

我看过许多书，也为书中人物掉过许多泪。但为了一个极其平淡的故事着实伤感了几天的，是三毛的《吹兵》。它叙述的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和一个哑巴炊事员之间一段平淡且又感人的故事。

小女孩在上学的路上被一头疯水牛穷追不舍，逃进了教室，牛仍在操场等待着，而班长却通知小女孩去打水。她拼命地跑到水房，打了水却跑不回来，蹲在地上呜呜地哭着。这时，在学校住着一个哑巴士兵帮着小女孩把水送进了教室。从此，小女孩和哑巴炊兵相识并成了好朋友。同时也就有了一段两个人之间欢乐美好的时光。

三毛用流畅细腻的笔调写出了炊兵与小女孩之间那种平淡却又无限绸缪的感情，读来令人心动。哑巴炊兵不知道“吹”和“炊”的区别，因此把“炊”写成了“吹”。小女孩便天天教他识字。哑巴总在他值日的时候帮她提水，并天天在校门口呆呆地等着她。只有看见小女孩，“他脸上才哗一下开出好大一朵花来”，连书包也抢过去背。没有钱给小女孩买礼物，他就选最好的芭蕉叶子，隔几天就精心地为小女孩做个垫板。小女孩总是把一颗颗话梅不断地塞到哑巴的嘴里。两人放学后常到操场上坐翘翘板，哑巴很怕摔了小女孩，不敢坐，就用手压。小女孩让他升，他就升；让他落，他就小小心心地落。他们宁静地玩笑，夕阳下的操场有的只是两幅无声无息的剪影……后来，再后来，老师坚决地、不容分说地阻止了小女孩和哑巴的交往。从此，他便总是在墙角哀哀地望着小女孩，在地上用指甲一连串地写了十几个好大的问号。小女孩也哀哀地写了许多个“不是我”……军队开拔了，哑巴不顾老师歇斯底里的吼叫，飞快地跑进教室，送给小女孩一大包在当时孩子眼中珍贵如金的牛肉干和一个地址，并向她认认真真地敬了个举手礼，然后带着他满心的悲伤走了……老师没收了地址，把牛肉干也喂了狗。从此，在茫茫的人海中，小女孩再也没有寻到哑巴炊兵那双会说话的哀哀的眼睛和略显不挺的身影……

读了《吹兵》，那平淡故事中所传递出的不平淡的情感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当读到小女孩为不敢违背老师不得不“负心”于哑巴而懊悔，在心底喊着“亲爱的哑巴炊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过你……请给我写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的时候，我早已湿润的脸颊又泪水潸然了。

我之所以为书中这些平淡的故事如此动情，是因为我爱这些平凡的人和他们的人生轨迹上衍生出的那些平凡的故事。因为从生活里、书本上，我感受和体味出那些平凡的小人物蕴含着如此不平凡的情感力量。在这些故事里，它浸透着真诚，浸透着善良，更蕴含着平等、同情、爱心等等一切一切的人间美好之情。我常默默地想，如果没有了这些，那么人们何必还以社会这种群体方式生活在一起呢？我真羡慕那个小女孩，羡慕在她的童年里竟有

那么一段难忘的经历和故事。我想，如果是我，我便会常常向别人讲起，我也许会永远去寻找可爱的哑巴炊兵，永远保留那最后哀哀的一瞥。我真想那小女孩就是我，但，终不是我。

作为平凡人的我，也特别喜爱反映平凡人的故事和作品，这或许在于平凡中折射出的情感更贴近于人的本性吧！世界的主体也可说是由平凡的人和事构成的，普天下的芸芸众生大都是平凡的。我们都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一点财富。所以，无论伟大名人还是普通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家都是平等的。

正是基于对平凡的人和事的热爱，当我在《渴望》中扮演刘慧芳时，我几乎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因为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人物就生活在我们的中间，我也就相对容易地在那些平凡的故事中找到那种既淡且浓的情感。我爱慧芳等等剧中人在平淡生活中所显露出的那份质朴、善良和真诚，正是因为他们首先打动了我，也才使我能够力争用自己的心灵去打动观众。慧芳的几场动情的戏，我在拍完之后还哭了好一阵，我想那不能说是戏，而是我从心底里流出的泪水，为一个慧芳，或者说为许许多多的哑巴士兵、小女孩等等这些平凡的人和故事所流出的泪。

一个平凡的演员，演了一个平凡的角色，引起无数平凡人的共鸣和喜爱，我想我将会终生保留这一份重重的情感，收藏起这一份平淡中的绸缪之情。在今后的为人为艺中，我将继续追求那朴实无华的、说不尽道不完的普通人的不平凡的本质，再现那支撑着我们共和国大厦的无数普通人的伟大精神。

书林论短长——书城话题

发展经济读书有益

张岱年

张岱年先生在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和潜心治学中，对读书有着精深的见地。他对读书与经济建设关系的看法，想来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现在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指引之下，新中国真正起飞了！经济的起飞必将促进文化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谋求发财致富的途径。于是纯粹学术受到一定的冷落。学术著作很少人问津，读者少，出书难！似乎书没有什么价值了。其实这是一种可悲的误会。

事实上，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离开了知识的提高是谈不到发展经济的。而科学技术又是与理论思维密切联系的。在一个知识水平不高的国家里，经济何能高度发展呢？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切合实际的。如何才能先富起来呢？必须靠知识的提高与更新。知识的贫乏必然造成财富的贫乏。财富的充足以知识的充实为条件。

人们常说现在是信息的时代，信息主要是科学技术更新的信息，是知识更新的信息。惟有信息灵通，事业才能发展，其间有必然的联系。

书是知识的载体，是智慧的结晶。书记载了古往今来学者追求真理的记录。读书，可以使人增加智慧，可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读书，还可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使人们不至于沉没于低级的趣味中，而达到精神的升华。在发展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培养读书的习惯，是十分必要的。

在“文革”时期，曾经流传“读书无用论”，与当时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口号是密切相连的。这些荒谬的论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错过了良好的机遇，虚度了十年的光阴。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沉痛的！时至今日，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只有在学术上努力前进，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今日的世界是技术竞赛的世界，也是学术竞赛的世界。书，也是国际竞赛的一种工具。

书，也有好书坏书之分。有许多害人的书，必须加以铲除。对于伤风败俗的坏书，是必须严厉加以销毁的！

现在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素质，而提高人民的素质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培养读好书的良好风气。这是关系民族盛衰的大事，是不可掉以轻心的。我希望广大群众都同意读书有益的观念。

让我们认真读书

戴文葆

真是时光如流，像李白《古风》所说：“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又是一年春草绿！在向广大读者贺新年时，还是应该提议请多读书，认真读书，尤其希望在青少年朋友中继续广泛开展读书活动。

图书出版事业是国民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出版界以向优质高效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工作思路，首先着重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与此同时，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出版体制与框架；抓“九五”规划的制定；落实建立科技出版基金、少数民族出版基金，以及学术著作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资金与出版技术进步专项资金等；举办国际电子出版系统、国际音乐音像出版技术等展览会。而且，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不仅评价参评图书的思想内容，同时严密检查图书的编校质量，并将进一步注意其印装质量。在宏观方面，落实了人才培训中心的筹建方案，加强法规管理的力度。所有这种种具体措施，如经过切实持续有效的努力，胜过行文的要求和口头的劝告，将会对出版物的质量和出版业的繁荣发生积极的影响。

图书不但记载社会进步的历史，展示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反映社会各界的意念与愿望，书籍本身也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生产力，参加现代化建设，塑造一代高尚的新人。因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重要的是需要养成读书、爱书、求书的习惯，并进而培养在适当场合用适当方式讲评所读书的能力，使我们自身具备为祖国现代化事业奋斗的条件。

无须论证，好书是人们忠实的朋友；没有书籍的屋子，就是不见阳光的黑屋。我国已经打破闭关自守，自我禁锢，正在建设兼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人们必须掌握基本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培养遵纪、守法和民主精神，树立远大高尚的理想，这就不能不靠多读有益的书籍。实践出真知，这话是对的，然而并不是绝对的，许多高深专门的知识，并不是以个人低头发蛮劲，或如王阳明劈竹子那样，所能取得真知的。要靠钻研许多传世不爽的专门著作和文献的指引，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去开拓未来。

读书也要讲求方法，心急不得，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读三两本书就成为博士。有的书应精读，有些要略读。有的可浏览，鲁迅讲过“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许多有价值的专著，特别是与自己执的业密切相关的，要专心仔细地阅读，有时还可有重点地温习。阅读时往往不能一下子处处皆懂，不要畏难，读这本书未弄懂的问题，以后读另一本书时就能豁然明白了。知识是螺旋形上升积累的，所以必须养成爱读书、肯钻研的习惯，脑子里常常有问题在思索。

有时买到质量很次、内容不好的书，怎么办呢？确有极个别出版者或是一些不法书商，有两张能说会道的巧嘴，三只洞察中外的眼睛，能做出奇奇怪怪的书来。请不必心烦，硬着头皮看下去，正好可以锻炼识别是非的能力。

《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当作开展学理思辨、进行分析解剖的好材料，这不正是提高自己，从而体会读书之乐了吗？

读书不仅获得知识，开阔眼界，认识社会与自然，还可扩大胸襟，给人以高尚的情操。一旦不巧碰上水火、刀兵，泰山崩于前，也会懂得临难如何

做人的道理啊！

新岁话读书

罗国杰

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从读书中吸取养料，提高我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已成为新时期整个社会和每个人的一种深层次的精神要求。

多读书、读好书，善于从读书中启迪自己的思想，培养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境界，强化自己的意志，从而坚定不移地追求真善美、抵制假丑恶，是我们适应新时期社会的发展，使自己成为“四有”新人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读书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与行的统一，是我们特别应当强调的。

从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来看，多读一些伟人、名人、英雄、模范的评传、传记是不可少的。每个人不可能都成为伟人、名人、英雄和模范，但伟人、名人们的事迹、思想、品德、行为，特别是他们的理想、信念、毅力和对待事业的极端责任心等等，能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多方面的教育，激励我们不断向上的勇气，还能够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催我们反省，督我们自新。最近几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都是值得认真阅读的好的传记书籍。

多读一些历史，特别是有关我国历史的书籍，了解中华民族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及无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贡献，了解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为国献身的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还要多读近百年来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历史，多读在这段时期内爱国志士为了救国图存，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这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反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对我们反对崇洋媚外抵制霸权主义，从而树立民族正气，增强自立、自强的意识，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于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来说，多读一些同本职业相关的科学、技术的书籍，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培养自己的爱岗敬业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陶冶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对于形成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和发挥每个人的创造精神，都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工作上精益求精，一个人还必须养成对提高自己职业工作有关的知识的热烈追求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一定能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读书贵求真

卫兴华

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无非以“万”字鼓励人们多读书。但古人读书的范围毕竟有限，远没有今人所遇的“知识爆炸”情景。当今中外出版物浩如烟海，新著又月日递增，令人目不暇接。

书多，特别是好书多，是好事。好书能使人开阔视野，增长智慧，陶冶心灵，涵养情趣，领悟人生，振奋精神，坚定意志，奋发进取。但在书浪滚滚中，必然会泥沙俱下，良莠混杂，庸劣之作亦所在多有。“开卷有益”之训，应限于好书范围。庸劣品不仅浪费读者时间，还会有负面效应。因此，读书应增强选择性，减少和避免盲目性。若按书籍质量粗分，有上（优秀）、中（一般）、下（庸劣）三类。应选择优秀，摒弃庸劣。

好书，有真知灼见，需细读、精读，精以求真、求深。一般书籍则可粗读，粗放型浏览，但“粗中有细”，如沙里淘金，也许会发现些许闪光的亮点。

书有不同，人亦各异。有的天赋高，善快读强记，博览群书。天赋加勤奋，会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师、泰斗，达到“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的境地。我自己天赋不高，无博学强记之才，常感书籍浩瀚，而岁月苦短，时间苦紧，有望书兴叹之感。只能遵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格言，突出一个“勤”字，一个“苦”字。“勤能补拙”，苦中有甜。勤，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人一能之己十之”。具体地说，要眼勤、手勤、脑勤。眼勤，指勤读、多读。要尽可能多读点好书，但更要重视读书的质量。“水过地皮湿”、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不可取。与其多而疏、快而浅，不如少而精、细而深。要求实、求真，掌握其要义。手勤，指随手写眉批，划重点，并注明同一论断或提法在该书或其他书的何页还有（借来的书除外）。还要写卡片，写心得，存资料。这既有利于对所读书籍内容融会贯通，又有利于为科学研究积累学术资料。脑勤，是勤中之重，指勤思考、勤汲取、勤比较、勤鉴别、勤过滤。对大师们的权威性著作，也要开动脑筋，探求其究竟，撷英咀华。而且任何人的著作，不会“句句是真理”，敢于对其“拾遗补缺”，甚至在某点上提出质疑。对一般性著作，更要辨真伪，明是非。目前，理论学术界，假冒伪劣商品也不少。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东西也颇多。至于讲大话、空话、套话乃至假话的“四话”作品亦常见。更令人厌恶的，是有人写论著，搞资料性述评，对别人的论述断章取义、任意歪曲、无中生有、颠倒是非、胡评乱批、猎取名利。实物市场已开展“打假”，而著作市场更为复杂，打假还待起步。在此情况下，读书更要重视提高鉴别力。“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斯言！

总之，读书要经过自己的选择、鉴别。要有吸收、有消化；有过滤、有摒弃。对论著中的引证和论据，不轻信，对论著中的褒贬，不盲从。要经过自己查证、核实，再决定取舍。

读书贵求真，以此自勉。

关于阅读中国文化典籍三人谈

《谈书会》是书友驿站新辟的一个栏目，将以几人对谈的形式来谈论有关读书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曾镇南、党圣元、张德祥三位同志，就有关阅读中国文化典籍的若干问题，开了一个谈书会，相信他们的见解会给读者带来收益和思考。

张德祥：经常跑书店的人也许会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从前几年开始“热”起来的中国古典诗文鉴赏辞典至今仍很有市场，并且，在这种“热”潮还没有消退下去的时候，另一种“热”又起来了，这就是古籍白话翻译“热”。

党圣元：我最近正应邀参加《资治通鉴》的白话翻译工作。像《资治通鉴》这样卷帙浩繁的巨著翻译为白话出版，是很大的工程！我认为，这种古籍的鉴赏疏解读本和白话翻译读本，实际上是一种古籍的导读性、普及性的读本，它们的作用就是在古籍与现代读者大众之间架起桥梁。这种现象说明广大读者对中国文化典籍有接近、阅读的兴趣，也说明中国文化典籍对现代读者大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曾镇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一个民族重视自己的文化典籍，把它当作构建、发展自己的民族精神的思想资料普及开来，流传下去，这是一个民族增强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必须认真、持久从事的工作。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能够延续五千多年？为什么屡经风暴、劫难仍然生机不竭？这是值得深思的。在构成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智慧和生存活力的诸因素中，中国文化的深厚博大，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的古代文化中，有很多珍贵品，我们要把这些珍贵品世代代传下去。

张德祥：前一段时间，我觉得文化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或者一种相悖的文化态度。一方面，某些文化论者把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落后完全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化论者在引进外来文化思潮时，又有意无意地想从中国传统又化中“挖掘”出一些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等值的東西来，如在老庄那里找存在主义，从李商隐那里找“意识流”，从《易经》中寻找预测学，从气功中寻找神秘生命体验，等等。

党圣元：你说的这种现象，也许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博大精深，说明了一种精神根基和文化智慧的存在。所以即使有些人一方面在情感上迷醉于西方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又不得不承认汉民族文化中的精神智慧的存在，不得不承认它作为东方文明的文化母体意义。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价值。所以具体来看，前面说到的广大读者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浓厚兴趣，应该说是一种好的现象，反映了人们来自于精神文化上的需要。

张德祥：也许还有一种生存需要。一定文化正是一定生存方式的结果，一定的生存方式也必须需要相应的文化。所以，这些图书的“出版热”、“阅读热”就必然会出现。

党圣元：从经验来看，有些“热”是不正常的表现。有的人爱制造热点，趁热达到“热”之外的其他目的，以前图书市场的混乱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有些出版单位为了牟利，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推波助澜，把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也推出来占领图书市场，如竞相刊印算命、相术方面的书。我们要时常警惕这种拜金主义与低级趣味搭档，迎合、刺激非正常阅读心理，以达到牟利目的的出版“热”，以防止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走出坟墓侵蚀人

们的灵魂。

张德祥：看来，不能否认出版社的出书计划对图书市场的某种调节作用及对读书心理的影响作用。

曾镇南：所以，出古书也应当有一定的规划。当前的情况，就提供普通读者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史、哲知识的读物而言，出得过多，有的则失之粗糙，缺乏精选精编，像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等这样的精品出得不多。

张德祥：读本优劣很重要，至少应当让读者从中所得到的知识是准确的、能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和有持久价值的。

党圣元：说到这里，我想起前两天在书店看到的一本书，该书序言的第一句话说，《庄子》是“中国第一部哲学智慧书”，这就犯了常识性错误。像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常识性错误在这几年的各种所谓新编辞典、手册、便览、集成等类出版物中相当严重。还有一种情况是随心所欲，如有些文史工具书不讲究体例原则，书名大得吓人，而其中内容少得可怜，专拣容易的或已经有了的东西抄抄摘摘。

曾镇南：这与近年来的浮躁学风不无关系。有些人只想以“新”、“奇”、“大”引起轰动，走捷径，缺乏求实扎实的治学态度。

张德祥：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古代文化知识有限，如果从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开始接受古典文化，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党圣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是谈谈如何“读”吧。古人读书讲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一步步地深入堂奥。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一些读者，对古代文化史常识知之甚少，但见别人谈论《易经》，自己也就赶紧找来读，其实未必能够真正读懂。所以，读书不能赶浪潮，赶热点。既不能抱着猎奇搜僻或学绝招的心理，也不能有不求甚解、求大求全的浮躁情绪，应当把提高文化修养、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出发点。

张德祥：这个出发点很重要。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学习，一方面是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同时又是品质情操的熏陶过程，是文化精神的浸润默化过程。

曾镇南：在这个方面忽冷忽热不行，急于求成也不行。这是就主观方面而言。就客观方面而言，我倒觉得应当重视在整个社会上创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氛，以影响广大青年和学生。我记得50年代文化界曾有过对我们民族文化史上有杰出贡献的人物的纪念性活动，如对屈原、汤显祖、关汉卿、曹雪芹等人物的纪念。这种纪念活动一方面可以创造一种文化气氛，另一方面也是大众了解文化史的一条途径，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这种作法应该恢复。

党圣元：文化气氛、文化环境确实很重要。这几年群众性、普及性的文化名人纪念性活动很少，应当加强。当然，对于历史人物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为一时的功利目的而不顾及其他。

张德祥：例如对孔子的评价。不是将孔子彻底扫到垃圾堆里，就是将孔子推上圣坛，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反复多次，不断地“翻烙饼”，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没有多少意义。

曾镇南：对待中国文化典籍、对待有影响的古代文化人物，持科学的态度很重要。不能苛求古人、厚诬前贤，但又不能将古人神化、现代化，视其中的腐朽也为神奇。传统文化典籍中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混为一体的，我们要

善于鉴别。“批判地继承”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关键在于具体应用。

张德祥：在阅读传统文化典籍时，增强民主与科学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感情，科学态度和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养成自觉地对古籍进行批判继承的能力。

党圣元：总之，要有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全面肯定传统文化，又必然产生复古主义倾向。目前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封建的思想还很浓厚，落后的习俗还很顽强。封建遗毒与拜金主义都腐蚀着人们的灵魂。

曾镇南：这一点我有同感。我刚从福建归来。在那里，封建主义的沉渣很触目。很多身着洋装、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有的很年轻，但往往是烧香拜佛、求神问卦、信风水的热心者。“五四”时期鲁迅写过《热风》，对社会上反科学的种种丑恶、愚昧现象进行抨击。《热风》里描写到的种种封建性的东西，有些至今仍然存在，有的甚至变本加厉。可见反封建仍然是一项不能忽视的工作。

鲁迅著作与大众文化市场

按照《著作权法》，鲁迅著作已超过保护期，因而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鲁迅著作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在当前的“名著热”中，鲁迅著作受到了大众文化市场的欢迎，成了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肖振鸣（鲁博书屋经理）：鲁博书屋作为鲁迅博物馆开设的专业性较强的书店，以经销鲁迅作品、鲁迅研究专著及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方面的图书资料为主，堪称“精品书屋”了。书屋不在热闹的街面上，从经商的角度看是很不利的。常有朋友问：鲁迅的书好卖吗？市场是最说明问题的。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已经是第六、七次印刷了，价格也从几十元翻了好几番。1993年版售价291元刚刚售罄，1995年版又以每套420元问世，这期间不过一年多。尽管价格三级跳一样上涨，但销量仍是很大的，时有脱销现象。北京图书市场已有半年多不见《鲁迅全集》有售。而各家出版社纷纷推出的从不同角度组合编辑鲁迅作品的各种版本，如《鲁迅小说集》、《鲁迅杂文全集》、《鲁迅精品屋》、《鲁迅警世名言》、《鲁迅的风月闲谈》等出现在京城的大小书摊上，给今年的“名著热”增温不小。新近推出的一套五卷本鲁迅著作解读文库——《走进鲁迅世界》，更以其帮助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走进鲁迅世界的新颖创意、实用体例及雄厚编著实力为特色，在“名著热”中独树一帜，一上市就备受青睐。我们这个小书屋明显感受到，近一两年内普通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对鲁迅作品的兴趣明显增加。现代作家中其他名家如周作人、胡适、老舍、郁达夫、林语堂、徐志摩等的作品也很受欢迎。可见优秀作品总是具有生命力的。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正在以一种自然的心态，在事业中，在生活中，在休闲中追求着高品位的精神生活。

陈漱渝（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迅研究室主任）：鲁迅著作的重新编注、校勘，成了当前出版界的一个新热点。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基于读者（特别是知识层读者和广大青年读者）对鲁迅著作的迫切需求。鲁迅著作中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深刻内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不失其强烈的针砭意义。鲁迅作为社会改革家的光辉形象，愈来愈为国内外读者明晰地认识。

导致多家出版社争出鲁迅著作，还有一个不必讳言的因素，那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鲁迅作品已超过法律保护期，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已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鲁迅著作已成为社会的公有财富。只要尊重原著，尊重已有精神成果，改编、注释、整理出版鲁迅著作已不应受到任何方面的不恰当的干预。自然，不同版本的鲁迅作品集学术水平会有高低之分，甚至可能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但经过读者的品评，岁月的流逝，优秀的选本会长远流传，而粗劣的选本则无法避免被淘汰的命运。竞争是促使精品佳作产生的动力，而独家垄断只能使鲁迅著作的出版呈现出芳林寥落的景象。

说到《鲁迅全集》的出版，我想起1989年在台湾看到的情况。当时台湾当局查禁鲁迅著作的堤防已经坍塌，一年之中就推出了三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我们为什么长期以来只能有一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存在呢？以我之见，现行《鲁迅全集》的版本虽然是一种因收罗比较齐备，校勘比较精

确，注释比较详尽而享有声誉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在胡乔木、林默涵同志主持下编辑的，其中凝聚了参与者的辛勤劳动与学术智慧，但由于近些年鲁迅研究的深入开展，鲁迅佚文、佚简的相继发现，这一版本也亟待增补修订。此外，鲁迅的文化遗产，包括创作、翻译、古籍辑校、科学论著与美术作品选编五大部分，但现行《鲁迅全集》仅收创作，无法满足读者——特别是研究者的需求。因此，编辑出版不同规模，不同体例的鲁迅作品集，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要，应该予以积极支持，正确引导。总之，在鲁迅著作出版方面，也应该防止“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情况。

王世家（《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与鲁迅著作出版“热”相比较，自80年代末到目前的几年内，鲁迅研究显得较为沉寂，其标志是研究队伍逐渐缩小，研究专刊纷纷停办，研究著作难以出版，号称全国最大学会的鲁迅学会，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学术活动难以开展，筹备多年的鲁迅研究基金会，至今没有结果。鲁迅研究由鼎盛步入不景气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我觉得，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鲁迅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平稳扎实地不断向前拓展。鲁研界的核心杂志《鲁迅研究月刊》，已坚持出版了15年之久，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注目与好评。近年来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大多在这份刊物上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的涌现，给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带来虎虎生气。这批青年学者都十分注重多方面的汲取中外文化养分，不断丰富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因而他们不但能在前人已经提出的研究课题中仍有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得出新的结论，而且提出并解决了许多前人尚未解决的疑点与难点。还有一些其他学科（如哲学、语言学、佛学）的青年学者也相继汇入鲁迅研究队伍中来，使近几年的鲁迅研究局面更加丰富、壮观，对鲁迅的理解也更趋深刻。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鲁迅作品兴趣大增，意味着对鲁迅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的同时，也为研究准备着继续发展的基础。

李文儒（副研究员、鲁迅博物馆馆长助理）：虽说鲁迅作品多种版本的出版，其编选方式本身就包含着研究者对鲁迅的新的诠释，但从出版者的市场意识看，主要不是限于少数研究者，而是着眼于研究者以外更广大的大众市场。像鲁迅这样经典作家的作品的市场行情看好，无疑是一件莫大的好事，至少显示出让人欣慰的大众文化发展趋向。由经典的介入而打破言情、武侠以及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庸俗品一统大众文化市场的局面，说明了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国民文化水准的高低，国家文化是否真正繁荣，无论如何是和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经典精品，本民族历史所创造的经典精品，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成正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精品的出版看好，发行走俏，是社会发展的鲜明的标志。

但此中的情况也很复杂。出版者对经典精品的精包精装，固然是为了突出被包装者的价值位置，可是购买者中有没有完全是或包含着仅仅看重经典精品装饰自我的作用？出版者的做法有没有迎合这样的消费者的因素呢？如果经典的命运，大众对经典的了解，只限于口头上、影视中，只陈列在书柜间，那么，是经典的悲哀还是民族的悲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从事文化文学研究者、出版者的悲哀。鲁迅著作出版的“热”与鲁迅研究的“冷”的反差，多少就隐含着这样的悲哀。繁荣经典精品的出版是出版者

的事，而让经典精品真正的而非表面化的进入大众之中，则是研究者和出版者的共同责任。

经典作品与一般流行品比较起来，有难于进入普通人心灵中的特点，这就需要中介的力量与作用，需要跨过去的桥梁。所以从事文化文学研究的专门家责无旁贷地负有架桥铺路的职责。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封闭式研究的象牙塔中，而要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社会、大众，要做将经典文化普及于大众中的工作，要把深入研究与广泛普及结合起来，要把研究成果及时地向普及方面转化，其实，这也是研究的深化。基于这样的想法，考虑到广大读者对鲁迅已有一定的了解而渴望更全面更深入地进入鲁迅世界的阅读要求，我组织多年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分析时代的文化特征及阅读接受心理与方式的变化发展，探寻将研究成果向普及方面转化的新的形式，编撰了一套总名为《走进鲁迅世界》的鲁迅著作解读文库。这套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说明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我想，在经典与大众之间，我们开展创造性工作的天地还是很广阔的。

中华本土文化纵横谈

本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俗学创始人钟敬文、国际知名民族学家林耀华、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王春瑜、青年民俗学家张铭远及“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责任编辑韩金英等同志就本土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的座谈，颇具启迪。

钟敬文：中国在本世纪初与本世纪末出现过两次“文化热”，第一次以蔡元培、周作人、费孝通等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为代表；第二次以“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等书籍问世为标志。两次“文化热”都程度不同地存有批判传统文化的倾向，却都意外地带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实绩。这些实绩以关注民间文化为主要倾向，运用历史与现实调查相结合的实证方法，确立了本土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

林耀华：本土文化主要指民俗文化，也涉及部分民族学。民俗学与民族学关系密切。国外英美学派将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包含在文化人类学之中，而欧洲学派则把文化人类学等同于民族学。我国民族学受英美派影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均设立人类学系。民俗学最早由英国学派提出，主要研究风俗习惯，属民族学的范围。美国历史短，较注重研究现实，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新兴学科在那里比较发达。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发达，可民间文化记载却有些不足。大量民俗学著作的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由最初的七教授倡议，到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省级民俗学会的成立，说明我国本土文化研究势头正旺。“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出版是令人欣喜的。

韩金英：我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这套丛书旨在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选择那些历史上极少记载的反映民间文化习俗的选题，如《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皮影》、《馈赠礼俗》等，其中不乏很有学术分量的煌煌大作。近年来的重要民俗学研究成果几乎都收入其中。

钟敬文：“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有助于中国民俗学科学体系建立。我曾设想民俗学结构体系有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等6个方面。这套书中的不少高质量专题性论著，对以上六个方面都有贡献。

张铭远：关心中国文化不能停留在表面，限于泛泛的空谈，而应深入实际研究问题；不能仅限于对经典文化的研究，限于哲学、思想史的探讨，忽视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个主体部分，即民俗文化。对于下层文化的关心，将有助于使中国文化研究更加注重整体性、全面性。

郑杭生：风俗习惯不仅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民俗学关心的文化事象侧重于传统性，社会学关心的文化事象侧重于现代性。现代性与历史性有联系，民俗学所关心的是今天仍然活着的传统，属于现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与民俗学息息相通。因此，“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汇集的各方面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同样引起了社会学的关注。例如《摩梭文化》、《家谱与中国家族文化》等都是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家族的文化特征与功能的。《巫与民间信仰》、《中国行业神崇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是社会风俗史研

究的重要内容。

王春瑜：本土文化是文化史的根，应当花气力作深入研究。最早的文化史著作，几乎没有一本是研究本土文化的。三十年代末期商务印书馆为张菊生祝寿而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严格地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是文化史，没有从传统的中国文化史的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旧学的延伸，其中的《中国水利史》、《中国盐政史》、《中国交通史》、《中国税制史》、《中国政党史》等，属于经济史、政治史范畴。本土文化的研究带有文化抢救的性质。解放以来，大量文献散失，现在不抢救，很多东西就会断根，成为文化之谜。现代世界文化之谜，很多缘于战争，在和平环境中，不该造成文化之谜。

林耀华：“中华本土文化丛书”以专题性为特点。《中国鱼文化》图文并茂，阐述了鱼崇拜从最高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到民间连年有鱼（余）的历史地位的衰落过程，崇拜的具体行为都有图片反映。这对民族学的研究也是很有益处的。

韩金英：专题性著作并非本丛书首创。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剖析了他家乡血缘亲族的社会关系，以及在这关系网下的生活习俗。这本书于1944年由美国太平洋学会出版，成为在国际社会学、民族学界影响巨大的著作。

《金翼》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开创了与国外学术界对话的专题性研究的先河。

张铭远：十年来，民俗学的复苏首先经历了开创期，一批普及性、概论性的入门书籍问世，满足了各高校开设民俗学课程及民俗爱好者的需要。这对迅速重建中国民俗学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民俗学发展期的标志是大量专题性著作面世，这表明人们开始用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民俗的实际，其中包括老一辈学者的专著，也包括一批青年学者的专著。可以预见，民俗学的下一个时期将是深入时期。

王春瑜：本土文化的研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难是有些文化现象与迷信相联，如“叫魂”固然落后，但它是人类文明某一阶段的标志，可惜有些民俗志、地方志将这迷信部分删掉了。首先是保存，其次才是研究。清代县志记载的一些民俗已消失，为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又如民间秘密会社与反动政治、迷信相联系，把涉及这方面的文献研究清楚，对当代会道门类组织的破案，有着现实的意义。

郑杭生：本土文化的研究包含多方面的文化事象，其中当然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的人打着民俗的旗号贩卖迷信、落后的东西，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坚持对文化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与科学的阐述，从而将本土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珍视老舍不朽的文化价值

老舍先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老舍文集》是老舍作品精华的结集，是老舍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为了帮助更多的读者了解老舍先生和《老舍文集》的价值，于是之、赵园、甘海岚三位同志开了一个别开生面谈话会……

好像老舍还活着

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于是之

祝贺《老舍文集》的再版，不容易。出版社下了大决心了，令人尊敬。

我从小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书，头一本就是《老张的哲学》，在文津街那个大图书馆里读的，那时候，进那个图书馆还很忐忑呐！

北京解放后见到先生，那是他到北京人艺给我们读《龙须沟》剧本的时候，这个题材很难写，但先生写出了新意，我们演员都喜欢演，终成不朽。

另一个不朽大作——《茶馆》，不必多说了。它使新中国的话剧第一个出了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十六卷的《老舍文集》就要买到手了，我将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好像先生现在还活着。

老舍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赵园

老舍的意义尽管已经有了大量的阐释，然而由学术的角度说，已有的阐释还远远不够——尤其对老舍作为重大的文学史现象，对其“文学史的意义”的阐释。

我个人最近几年，是由“老舍与北京文化”这一角度研究老舍的。“北京”是一巨大文本。元明清三代至今的文化创造，使北京拥有了中国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文化积存，而老舍提供了解读这一文本的较为理想的编码系统。事实上，老舍影响了30年代至今一代代人解读北京的方式，其影响还远及国外。“胡同”的作为艺术对象，成为“北京”的重要标记，相当程度上，出于老舍的创造。“艺术的胡同”则是由老舍首先制作成功的。人们由老舍所提示的路径进入北京，进入北京的胡同、街巷、杂院、四合院、店铺，以及旧式王府、贵族宅邸，他们所留意的，正是老舍指点给他们的那些。老舍作品作为前在经验影响于人们观察与感觉北京的方式是如此巨大，以至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我这里还未说到他对于此后“写北京者”的影响。

于是，老舍的意义就远非“文字”所能局限。经由影视，经由更多样的传播渠道，他甚至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北京人的生存方式和对自身生存的体验。上述“影响”，远远越出了“文学史”的范围，构成更广阔的文化现象。由此意义上不妨说，老舍强有力地参与了对北京的“建设”。虽然北京正经历巨变，但老舍的存在仍处处可感。已有的文化都不会无端地消失，也因它们已深入地参与了千万人的生活，已是他们的经验、感觉以至他们的生存方式的一部分。据说去年的一套受欢迎的挂历题为“胡同印象”。去年受欢迎的，还有一批关于胡同的书。“胡同”并未因高层建筑、豪华商场的出现而

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倒像是更引人注目了。你从这些现象中感到了老舍的存在——他仍走在北京人之中，在北京的胡同与马路上徘徊。

在我看来，无论由研究者的角度，还是由普通北京人以及渴望了解北京的人们角度看，《老舍文集》的全部再版，都是一个好消息。

老舍的文化价值

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 甘海岚

老舍先生学贯中西，著作等身，他留给我们的八百多万字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曲艺、理论著述和译作，显示着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他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价值。从北京文化的角度看，老舍及其创作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集萃着中华文化精神的北京文化抚养、培育的产物。老舍和北京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创造的关系，北京的风物水土、历史文化、社会风情滋养、生成了老舍的文化品格，而老舍又以自己的文学生命再现、补充、丰富和创造着北京的文化，构成北京文化灿烂景观的一部分，以至当我们谈到老舍，就不能不想到北京和它那风韵独具的文化；而提起北京的文化，自然会与老舍的名字联在一起，老舍的创作和北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如：老舍与北京满族文化、民俗文化、戏剧变化（包括京剧、话剧）、影视文化、大众曲艺、书画艺术、教育文化、宗教文化，等等，都各从不同角度标示着老舍在北京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老舍著作不仅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用典籍的形式留存后世，而且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以其切近现实的鲜活生命力显示着它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当代北京人的文化生活中，老舍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如：老舍作品持久地为人民群众提供着高层次的文化精品，丰富着当代北京的图书、戏剧、影视文化市场；老舍的创作风格对当代北京的文艺创作影响至深，致使新时期以来文坛出现了一批师尊老舍，把表现北京地域文化风采作为自觉艺术追求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京味小说、京味话剧、京味影视，甚至一时间形成“老舍热”和“京味文化现象”；一批摄影家、画家借鉴老舍风格，热衷于表现北京地方风情，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民俗事象成为他们着意表现的对象，老舍笔下的人物屡屡被借用到绘画创作中，用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风貌；老舍和北京的几个大剧院曾密切合作，对北京的剧院建设、剧院艺术风格的形成、表导演人才培养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其影响绵延至今，泽被今日剧坛。在当今北京社会生活中，更有一些文化事象缘老舍而生，形成老舍著作的衍生现象。如老舍塑造的许多艺术形象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名人”，参与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虎妞成为悍妇的代名词，祥子则是人力车夫的代称，诸如此类，约定俗成；老舍著作中描绘的场景还被依样搬到现实生活中，成为有京味特色的文化娱乐场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老舍影响之深广，证明着老舍不朽的文化价值。

当然，老舍不仅属于北京，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利弊得失说“ 武侠 ”——武侠小说创作、出版、阅读、研究三人谈

胡文彬：80年代以来，台港新派武侠小说、旧版武侠小说、新创作的武侠小说三流合一，出现了一股“ 武侠热 ”。这其中有好的作品，也有一些粗制滥造、品位不高的作品，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抵制、要引导。当前武侠小说的出版势头比前几年有所降温。这种现象使我们看到，作为通俗文学中一个重要支脉的武侠小说深深植根于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有着深厚的创作源泉，拥有相当多的读者。但是，就许多读者来说，对于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当前武侠小说创作、出版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研究和了解的。

刘荫柏：中国武侠小说的渊源很深。周秦时已经出现剑侠，《庄子》、《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中均有记载，为古代游侠、刺客中之佼佼者，他们的行为是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但是从整个武侠小说发展历史来看，真正反映剑侠活动的武侠小说却兴于唐代。唐人“ 传奇 ”中的武侠小说，不仅成就较高，对后世文学影响也较深。如《虬髯客传》中风尘三侠、《霍小玉传》中黄衫客、《酉阳杂俎》中僧侠等，均成为被后世称颂的奇侠、怪杰；《传奇》中聂隐娘、《甘泽谣》中红线等，更是为人赞叹的女剑客。康骈《剧谈录》中《管万敌遇壮士》、《张季弘逢恶新妇》，旨在戒骄矜，寓意更深。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后世武侠小说中。清人蒲松龄之《武技》，王韬之《女侠》，均含此意。《水浒传》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功的长篇武侠小说。

刘峻骧：我读武侠小说是小学时代，对旧武侠小说最喜爱的作家是王度庐、朱贞木、白羽、还珠楼主、望素楼主。这些人的小说对我有相当深刻的影响。我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体文化——武术哺乳下民族的大众的文学，真正的武侠小说应当既能阐释中华武术所深蕴的东方哲理、民族伦理，又能深刻反映人生。这是武侠小说拥有众多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旧武侠小说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新派小说中有金庸、古龙、梁羽生、萧逸四大家蜚声海内外。他们的作品中虽有粗糙之作，但精品也是有目共睹。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所达到的哲理深度，是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成功之作。

刘荫柏：人们喜爱武侠小说原因很多。首先，武侠小说因具有较强的娱乐和消遣性，又投合国人对自己传统武术的崇拜景仰之心，故能激起民族的自豪感，给人以较强的刺激、悬想和快感。其次，侠士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强烈正义感、责任感，不欺凌弱小，不畏横暴的高尚品格，出生入死、从容不迫的气魄和过人的胆略卓识，以及对技艺精益求精的精神，能跨越时间和地域的界限，对久经苦难、悒郁不快或正积极奋起中的人们，产生某种心灵上的共鸣。只要人类对于能够适应和支配自身存在环境的超自然力量的渴求没有消失，只要人间还有某些不平事，就有武侠小说能够存在的土壤。

胡文彬：正因为武侠小说历史悠久，深受一部分大众欢迎，所以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更应该严肃认真，注意社会效果，对读者负责；出版家应该有计划、有选择地出版，严格把关，而不是盲目地追求经济效益。综观已经出版的武侠小说，我看是翻印台港的多，再版旧的多，新创作的又是模仿的多。在艺术水平上，应该有所提高，写出有新风格、新特点的武侠小说来。我认为真正好的和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不仅思想性要强，艺术水平的要求也

要高，“俗中有雅，雅俗共赏”，虽很不容易达到，但有志于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刘峻骧：近几年关于雅俗文学争论甚多。我主编《东方龙》文学丛书时，提出过十六字编辑方针：“直面人生、倡导国风、雅俗共赏，悦智怡情”。我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类型都有高低、精粗、文野之分，而不能把某一类作品打为低下的。武侠小说有大量粗制滥造之作是实，这与出版业对其不作精深要求有关。文学是语言艺术，精炼是起码要求。幻想可以驰骋，细节却要真实。而那些粗劣作品，像目前出现的假劣商品一样是骗人的奸商行为，应为智者贤者不齿。如果评论家能认真针砭点拨，编辑能严格把关，武侠小说同样会出现传世之作。有的朋友把雅、俗文学比作文学太极图中那两条首尾相联、互补共存的阴阳鱼，而太极图中那条神奇而富有活力的S线，可称雅俗共赏线。我认为一切认真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家，都应当追求它。

刘荫柏：随着“武侠热”的兴起，引起学术界、评论界的注意。前几年大家集中讨论了“俗”与“雅”的问题，近两年来大家关注武侠小说历史的研究和如何引导读者正确阅读、欣赏武侠小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单纯地阻止和片面地否定武侠小说，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也达不到预想的目的。

胡文彬：作为通俗小说一个重要支脉，武侠小说有它重要的一席，应该让它进入文学殿堂。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和《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读者了解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历史是有帮助的。据了解，还有一些同志在撰写有关武侠小说史的专著。大家角度不同，看法有异，会有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但是，我认为目前更需要多一些赏析性的文章和专著。《文史知识》每期发一篇有关武侠小说的短文，就很受欢迎。新近出版的《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等书，就备受好评。这说明读者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要求获得更多方面的知识。我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目的就在于为读者提供一部较好的工具书。创作、出版、研究虽然分工不同，但在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这点上应该是共同的。

刘峻骧：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应写出高品位的小说来满足读者的需要。我准备写的《晚清奇侠传》系列长篇，现在只完成《峡谷芳踪》，第二部《血滴子的后裔》还没有完成。我在努力争取自创风格，写出自立香堂的武侠小说。我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土特产”，它与中华民族武术文化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对于武侠小说现在创作、出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创作中的粗制滥造、出版中的无计划、无选择和重出版轻评论等倾向，我们应当给予重视。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对待，一切问题都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改正，这对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样的。

“《周易》热”评说

“《周易》热”是眼下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这股“热”当中，既有理性的研究和热切的求知，也有无知的曲解和盲目的迷信，还有种种好奇的疑问。李燕、刘正、李昕东三位《周易》研究方面的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座谈，辑录部分内容如下……

李昕东（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近年，我国涌起一股“《周易》热”（《周易》又称《易经》）。研究、喜读《周易》方面书刊的，日见增多，这类出版物大量出现在书店里和书摊上。《周易》这部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地位最重要的典籍正逐步为人民所认识。如研究得当，易学必将对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燕：（中央工艺美院副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周易》源远流长，和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同步迈进。它最早是一部卜筮的书，但在长期运用发展中打下了各个时代的烙印，且有无数无名学者参涉其中，最后经孔夫子和他的门徒阐释，方形成了今日我们看到的《周易大传》。它已大大超出了“卜筮”，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成为意欲囊括“天道”、“地道”、“人道”的一部哲学典籍。先父李苦禅曾说过：“《周易》是一部伟大的数理哲学经典”。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李昕东：许多人对《周易》的内容不甚了解，总觉得“周易”二字很玄，难以琢磨。

李燕：就其名称简单地讲，“周”指周普，“易”指斟酌（在甲骨文中，“易”的字形是两手持杯酌水状），“周易”的字面涵义就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斟酌之学。”因古代织机先有经线后有纬线，故称具有指导实践价值的书为“经”——经典。自孔夫子提倡弟子学《易》起，《易经》之名就不胫而走了。近年“《周易》热”的出现，从向人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上讲是件好事，它为人们挖掘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刘正：（国际易经学会会员）：这股“《周易》热”中，似过多地侧重于命理算卦的方面，市面上的书籍也多是这类。故此，中国周易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刘大钧教授指出，不少读者对《周易》不甚理解，误以为它只是一本算卦的书，而没有看到它深厚的哲理层面，更没有把它与现代全方位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会把《周易》研究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李燕：更有甚者，如老子所说：“智慧存，大伪出”。现在竟有人大量盗印介绍《周易》的书以谋利，还有人假《周易》之名宣扬封建思想，这恰恰违背了《周易》“泰”卦的“尊卑交感”思想与“革”卦的革命思想。易学作为一门极高深的学问确具有一定指导现实实践以及预测未来的作用，其应验率也有实际记录。古代大军事家皆重视《周易》，原因之一就是它可用特殊手段了解全然封闭于己的敌方信息与动态，如此胜战之例，屡见于史籍。国外已有人在运用易学的预测功能了。我们作为《周易》祖国的子孙，当然不应落在人家的后头，但也不应顾此失彼。

刘正：《周易》传到西方已近四百年。目前，与中国易学并行发展的西方易学已形成。西方人热衷于易学的原因与海德格尔、怀特海等人的哲学盛行相关，上述哲人均受惠于《周易》。同时，玻尔、杨振宁等科学家用易学理论指导物理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更促进了易学在西方的盛传。以我的家学来讲，研究易学，有四个阶段：卜以决疑——传道授业——参透天机——

了却生死，其核心是哲学。

李昕东：许多气功大师同时也是易学专家，而易学学者也不乏气功的实践者，因此，很多人错误地把气功与《周易》等同视之，其实，这两者并非一回事。

刘正：气功与《周易》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气功属中国古典人体科学的内容，而中国古典的人体科学理论以《周易》为基础。最早把《周易》思想与人体科学联系起来的书是《黄帝内经》。而最早把《周易》直接与气功相联的是汉代魏伯阳，他曾写过一本《周易参同契》，此书至今仍被气功界奉为经典，不了解《周易》就难以深入理解气功理论。

李燕：同样，不少《周易》学者也非常重视修炼静功，因为一个人沉入气功状态时，常常会对《周易》有一种飞跃的理解。这方面我们三人都有切身体会。《周易》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精神也非常重要。从《周易》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古代就崇信“天道”。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天”是无形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龙的形象作为天的化身，以使用有形之物说明无形内容，“乾”卦首次以龙的生姿变化来阐明“天道”的哲理，从而使龙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刘正：《周易》的涵盖面很广，理论广博精深，易学史上有句著名的话：“《易》道广大，无所不备”，就是感此而发的。

李燕：《周易》几乎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拿绘画来说，中国造形艺术的美学核心——“意象美学”，便是由《周易》确立的，先父早就持此观点。现在，许多人盲目地向西方现代抽象派绘画学习，仿佛意象美学产生在西方，这是十足的错误。其实，西方的抽象派美术是以日本为折射镜，受益于中国书画的，但他们并未学好，有的只是试管产物，未必成活。

李昕东：当前，深入研究易学，主要目的还在于促进社会稳定、科技与管理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数学中的二进制，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八个主族，生命遗传基因的64组碱基对都与《周易》的演卦方法相巧合。而且，《周易》包括许多经纶治世的精湛思想，如阴阳平衡的“中道”理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等，这对于决策科学的发展，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都有一定的作用。可以想见，易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刘正：易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大学科，现在，全世界已有七八十个国家成立了一级易学研究组织。在此基础上，国际易经学会也在80年代初应运而生。目前，易学在我国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1987年，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国际周易学术讨论大会”首次在我国大陆召开。此后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周易研究中心与中国周易研究会相继成立。

李燕：许多读者认为《周易》过于深奥，难以读懂，这是有原因的。《易经》从远古产生，历经两千多年才被孔夫子定为《周易大传》传世。它是世界上成书历史最久的书，时代内容跨度很大，用文言文写成，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和觉悟思维为主，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读者接触西方思维结构的文化占了主导地位，对自己祖先的思维结构倒有所生疏，因此觉得《周易》过于费解。然而，《周易》也并非深不可测，其中许多思想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如“履霜坚冰至”（踏到霜就知道严冬要来了）等等。我认为，初读《周易》的朋友最好不要过急，应当逐步深入下去。出版界也应尽量避免粗劣著作流入社会。

刘正：最后，我向广大读者推荐几本参考书。入门书：《周易概论》（齐

鲁书社版)、《易经与中国文化》(学苑版)。中等深度的书:《中国易学预测学》(红旗版)、《周易与中医学》(北京科技版)、《周易全解》(吉林大学版)。高深的书:《大易集成》(文化艺术版)、《周易与怀特海之间》(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版)。另外,由中国周易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周易研究》(季刊)也很值得一读。

漫谈《围城》与“钱学”

电视剧《围城》上映后，小说《围城》大为畅销。很多读者希望深入了解小说的意蕴和艺术特色，并进而了解“钱学”（关于钱钟书及其著作的学问）。

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钱钟书研究》丛刊特约编辑）：电视剧《围城》播放后，反响很好，钱钟书、杨绛两位先生也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功。这对于广大观众深入了解《围城》这部被称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了解钱钟书先生及“钱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李世耀：（《钱钟书研究》编辑）：对比小说，陈道明的表演应该说是成功的，但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似欠准确，举手投足间，似多了点潇洒，少了点无奈。关于《围城》的主题，见解很多。或认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所表现的是陷于绝境的普通人；或认为《围城》反映的是“爱情之神的围困与逃脱”；或认为《围城》揭示了中国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等等。

罗新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译审，写有《钱钟书译艺谈》等论文）：把《围城》从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就像从甲语言翻译成乙语言，是不同文艺形式之间的“翻译”；而翻译不可能完全等值等效，经过编导和演员的阐释（interpretation），难免失真或走样。电视的形象、直观的特点，使我们对人物的外形、情节的发展、故事的环境，较读原著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但原著的诙谐妙喻，却无法全部曲达以出。如方鸿渐到省立中学大放厥词，女学生听了，“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这句话怎么化成视觉形象？表现为耳膜破了？！——这还是字句之间的浅层次。作品的寓意、哲理等深层次，更多的要通过阅读，从原著中探求。

李洪岩：《围城》艺术上的特点在于充满修辞机趣，遍布奇譬妙喻；讽语、警言，俯拾即是，仿佛一部人生格言大全，浸透着作者对世态宇宙的洞察以及作者本人的超人智慧和灵性。另外，小说中耐人寻味的隐蔽线索与结构，融化于全书的学问和典故，以及对某些真人实事或明或暗、闪闪烁烁的写实成分，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人们在读钱钟书的作品时，每每有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的倾倒，那切中要害的三言两语，见人所难见，道人所未道。他的文学作品是这样，他的学术著作亦是这样。

罗新璋：钱先生是用做学问的方式去写小说，用写小说的方式去做学问。所以，读他的学术著作，也像读他的文学作品那样叫人感到津津有味。我原想，普通人不会对钱先生的学术著作感兴趣，但我听说在《钱钟书研究》编辑部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半数以上是知识分子圈子以外的“钱迷”们写来的，甚至法卡山前线的战士也写来了信。这大概与钱著的艺术性不无关联。

李世耀：钱钟书确是一个大学问家，有人曾把他称作中国当代的“大儒”。如果以博学论，这种称呼并不过分。譬如，洋洋百万言、尚在续写的巨作《管锥编》，以《周易》、《左传》等十部中国古代典籍为线索，纵横古今，骋逞中外，运用文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深入透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卓绝的见解，这部书被国外学者称为“经天纬地的著作”。它同《谈艺录》、《七缀集》等著作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钱钟书学术研究的共同特征：运用各学科的知识，研究

具体的文学现象；又从具体的文学研究，升华出对人类、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他的著作中常常得心应手地摘引古人、西人的原文；而且喜用言简意赅、容量较大的文言表达，所以读懂他的著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从70年代起，先国外、后国内，逐渐形成一股研究钱钟书著作的热潮。目前，这种热潮在学术界正日趋扩大。

李洪岩：“钱学”还是一门具有群众基础和广阔前途的学问。本来，“钱学”一词不是个严谨概念，钱先生本人未必首肯。不过，大家都这么叫，我想也不妨沿用。就目前来看，“钱学”一词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指“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一门学问”，包括作品评论在内；二指“钱钟书的学问与学说”。钱先生曾风趣地希望大家不要“向‘钱’看”。但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读钱著仿佛热恋，叫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钱先生对“钱迷”们的“无可奈何”，大概也只有无可奈何了！

罗新璋：钱钟书这样学贯古今、言通中西的大学者，是值得我国学界引以为骄傲的。钱先生学问之大，读书之多，人所难及；在写作方面，尤其是学术研究方面，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钱著对中国文化的特质，似乎并没有什么高论，但把中国文化中的妙处都指点了出来，文学古籍中的精华都钩稽了出来。钱先生说过一句俏皮话：“要把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方面能得头榜状元的，似非钱氏莫属。钱先生的著作，从六七种语文里，引了古今上下成千上万部书，“博”得令人惊讶，叹为观止。“博”是钱著一大特点，也是一大迷人之处。

李世耀：就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而言，“钱学”肯定属于高层次、高品位，所以才有普及的问题，才有“读一点钱钟书”的提法。不过，读者诸公不要一听高深，就打退堂鼓；只要你能翻开一本来读，说不定很快就会给吸引住。钱氏诸书，用白话文写的，就比较深入浅出。如其第一个集子《写在人生边上》，从文字上讲，中学生读来不应感到困难。即将进入社会的中学生，看看《写在人生边上》的快论隽语，定会有所启悟，定能受到激励。文科大学生，翻翻《谈艺录》，当可知道一种治学方法。现代人没那么多时间遨游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堆里，那么读点钱著，可谓尝鼎一脔，得其三味。

李洪岩：这里有必要介绍几部著作。普及性的“钱学”读物有花城版的《钱钟书论学文选》，甘肃人民版的《钱钟书人生妙语》，上海教育版的《钱钟书 谈艺录 读本》；工具书性质的书籍有中华书局版的《管锥编 谈艺录 索引》；资料性的书籍有华中师大版的《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回忆录性质的有杨绛先生著的《将饮茶》（三联版）。最早出版的一部“钱学”研究专著，是郑朝宗编的《管锥编 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版）。尔后有成都版《碧海掣鲸录》、中国广播电视版的译本《钱钟书》；文化艺术版的《钱钟书研究》属丛刊性质，年内将推出第三辑。还有中国友谊版的《管锥编 述说》等。至于研究“钱学”的论又，更是不可胜数，可参见《钱钟书研究》附的索引。看来，说“钱学”是一门“显学”是不过分的。

说“《三字经》现象”

近年来，以“三字经”为形式的出版物多起来了，其中有的编写得很好，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大受裨益。“三字经”的写作形式在我国有悠久历史，除了旧时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三字经》以外，各种内容和用途的《三字经》还有很多。古今这种“《三字经》现象”颇值得研究，特别是如何评价今人所编写的各种《三字经》，更值得议论一番。

叶祖孚（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最近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写的《新三字经》出版后，由于文字简练，内容生动，很快风靡全国。有的地方也相继编写出版了一些新的《三字经》。《三字经》是旧时社会流行的一种启蒙读物，相传是宋王应麟著，明清学者继续补充，1928年由章太炎重订。它三字两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内容宣传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涉猎各个领域，所以影响深远，是中国旧时家喻户晓的一本读物。《三字经》之所以深入民间有它一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中华民族是个酷爱歌唱的民族，当人民在田野上劳动时常常引吭高歌，抒发他们的思绪感情。《诗经》就是搜集了来自民间的各种诗歌。汉字字字为节，四声抑扬，也容易组成像诗歌一样的简短文字来表达一种思想。汉魏乐府、唐诗宋词、金元散曲都是这样的文化。《三字经》之所以流传，就是因为它文字简练，又有音韵，读起来容易记住，所以人们用它来向儿童进行启蒙教育，使他们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社会的正规教育。

我赞成广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撷取古代思想宝库中的精华，采取可以利用的形式来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思想道德方面的修养。但《三字经》毕竟是本启蒙读物。我国传统文化广博精深，是个极其丰富灿烂的宝库，如何利用它来向广大人民进行系统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是我国广大学者、专家和教育家们的神圣任务。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新三字经》和《童规》等的一时流行，成为出版界的热门话题。显然，每一种流行自有其得以流行的原因。

长期以来，儿童人格养成和道德教育的薄弱一直令人关注。《新三字经》的成功首先反映了社会对道德教育的巨大渴求。需求造就流行，但有需求并不一定有流行，它还需要适时宜的制作和包装。《新三字经》拣起了旧时代童蒙教材的形式，注以新时代的内容，旧瓶新酒，古为今用，打破了我国教育和儿童读物形式单调、过于成人化的面貌。这种改善儿童教育的努力显然是十分可贵的。

问题在于，在二十世纪末，这种曾为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谣经诵的形式真的仍然有效吗？这种流行，真的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创造，而非快速消逝的时髦？使儿童教育贴近儿童，具有儿童的特点和儿童的形式，无疑是必要的。因而，必须认清和把握现时代的儿童特点。和一个世纪前不同的是，通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全面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学习方式乃至生存方式。昔日重要的传播方式和教化手段如歌谣、童谣、民谣等几乎已退出了现代生活；上一代人所习惯的以读、写为主的文化环境已变为以视、听为主。印刷媒体早已取代了口头传播，电子媒体则正在挑战印刷媒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势。很难想象，对儿童而言，三字经歌谣会比卡通片、游戏机更具吸引力。新酒的味道固然不错，旧瓶的外观也古朴可爱；但是孩子的口味变了，他们更喜欢雪碧和可乐。因而，《新三字经》的成功，形式大于内

容——它是以形式取胜的；同时，信息又大于形式——这一具体的形式也许会“速朽”，它所提供的信息却价值常在：改善我们的儿童教育大有可为，让儿童教育属于儿童。

肖衍庆（原同心出版社总编辑）：一本被冷落了几十年的小书，竟然被我国十几家出版社所借鉴，编辑出版了当代十几种新编《三字经》。一时间，从南到北，兴起了新《三字经》热。

曾经有人怀疑“三字经”这种形式，字少，难写作，否定了这方面的选题。实践证明，这种怀疑是多余的。写好虽不容易，但这么广泛地被利用，说明广大读者是喜闻乐见的。三字一句，文字浅明，琅琅上口，易记易懂。不仅可以表现古代内容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也可以表现现代纷繁多彩的社会生活。60年代初，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三字经》），论述这种形式的好处。他主张运用这种形式，写出我们这个时代农业、工业和基础知识等方面的普及读物，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同心出版社就是在这篇文章启发下，编辑出版了一套《新编中国“三字经”》，运用这种形式，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分门别类，编写了“勤学篇”、“道德篇”、“古代史篇”、“近代史篇”、“文学篇”、“科技篇”、“地理篇”，为跨世纪的一代提供了“知我中华”的普及读物。书中不仅有插图，还有必要的注释、评说。这就不仅为青年读者提供了方便，也为家长的辅导创造了条件。

细心观察，“三字经”这种形式在群众中并没有被冷落，在民间，医药学、种植学、治家学等等生活常识，常用这种形式加以总结推广。近年，许多民规村约，也采用这种形式。如今，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并形成一大景观，说明这种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借鉴的时候，不生吞活剥，不简单模仿，力求谋新，读者是会欢迎的。

从“装帧”到书籍设计——图书文化的一个变革

宁成春、吕敬人、朱虹、吴勇四位成就卓著的中青年书籍设计家曾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书籍装帧展览。因为以个人名义举办书籍装帧展在国内尚属首次。他们举办这次展览更重要的目的是，向参观者传递一个图书文化的重要信息：书籍装帧已从为图书美容的地位升华到对图书的再创造。这是他们多年探索的结果，同时代表了国际图书装帧的流行趋势。

从“装帧”到书籍设计

朱：我想装帧可以理解为设计者与作家作品的一种对话。要对话首先要理解，理解就要深入到文字、文学的意味中去。

吕：如今的装帧已不能停留在做书的“外包装”的认识程度。日本著名设计家杉浦康平先生说：“一本书就是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不是静止的，是流动的。它只有富有生命力，才能够打动读者。”我觉得这是当代书籍设计的一个理念。

吴：书籍装帧的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今天搞设计的同行要懂，文字编辑也要明白，比如书籍风格、民族化、书卷气、文化品味等等。

吕：现国外正在使用的“bookdesign”一词，意在强调书籍的形成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构成，是外在和内在、内容与文字的珠联璧合，是作家、编辑、设计者、印制人员、纸张供给者、书店销售人员共同注入情感的生命体、一项系统工程。

宁：现代设计就是一个整体构筑，其中还包括工艺的肌理、印刷、装订、纸张材料的选择。它们都拥有各自的表现力，特别还包括字体的排列，大字和小字所传达的那种理性多于情绪的表现力。

继承与借鉴

吕：当今设计手段不断改进，电脑的应用使设计者的设计语言更为丰富，但我觉得设计成功的关键还在于设计者本身的文化积淀，知识面的扩展。好的书籍设计一定是有“厚度”，是靠一点点的文化积淀出来的。

宁：我看国外的设计，比较喜欢研究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与整个艺术思潮有什么关系，它的大环境、大的国际市场在讨论什么问题，把对这一时期的绘画、音乐、建筑的倾向的认知，结合到设计中去。

吕：中国古代的书籍非常强调整体形态、文字的排列、空白的运用、每一章节的节奏层次，甚至每一根线、每一个点都有它的实用和审美功能。然而，现在老祖宗的东西已丢了不少，反过来，国外的设计家吸取了中国的营养，不少设计中均可见到中国传统设计要素的痕迹。

朱：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籍装帧，有羽毛般轻柔的感觉，而西方的书籍倾向硬挺。柔和有亲切置人的优点，这个长处是可以发扬的。

吴：学习和借鉴是一回事。不如人家处就去学，不必怕会丧失民族性而畏缩不前，背着个传统包袱就易不伦不类。以为有传统后，在设计中就不会失去民族性，这样的思维太简单了。

纸张的语言

吕：当今的设计已不能单凭设计者来完成，还需要工艺、纸张素材来兑现设计意图。可以说，设计者发完稿仅完成全部工程的一半。我们一方面要弄懂工艺技术，了解装帧材料的性能，另一方面要大胆设想，敢于向工艺提出挑战。

朱：纸张的表现力很强，也可体现书的个性。当我设计《川端康成文集》时，我先想到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雪国》。映入眼帘的就是“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我总觉得那雪地里的夜空含着无尽的诱惑，总是要把我拉进去，拉到川端所描述的世界中去。我不由自主地在他的文集中浏览了一周，深深地被川端的那种朦胧美，那种空灵、清澈的意境所打动。那雪地里的沙沙声，那羽毛般轻柔的感觉，还有那线装书宣纸的柔软手感，促使我在装帧材料上打起了主意，在经过各种纸张的比较后，我选用了一种特种纸，它的肌理和水纹，有点像宣纸的感觉，来表达此书的意境和内涵。

吴：当然用特种纸的难度很多设计者都会遇到，同时我们也应有惜纸如金的意识，不为奢华而奢华。

宁：其实用纸的学问，给设计者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发挥才能的天地。

吕：对纸的认识也是一种动力，你去关心它，去研究它，才会体会到纸张的品位和性格。纸张是没有文字的语言，毋需图像的绘画。

漫说“漫说文化”

陈平原

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在哪里？精选了四百篇二十世纪中国名家散文精品的“漫说文化丛书”或许可以给你一点启示。

据说，分专题编散文集我们是始作俑者，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能为读者接受，这才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编这套丛书时，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我们不管。并非故示清高或推卸责任，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玩票”，不靠它赚名声，也不靠它发财。说来好玩，最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可以送朋友，也可以搁在书架上。如今书出的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好文章难得，不敢说“野无遗贤”，也不敢说入选者皆“字字珠玑”，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选家”之事，说难就难，说易就易，这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记得那是1988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编起来很容易，可就是没兴致。偶然说起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这样，1988年暑假，钱理群、黄子平和我三人，又重新合作，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当即“奇文共欣赏”；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名作”。开始以为遍地黄金，捡不胜捡；可沙里淘金一番，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开学以后又泡图书馆又翻旧期刊，到1989年春天才初步编好。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不想随意敷衍几句，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一开始是“玩票”，越做越认真，变成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对于我们三人来说，这迟到的礼物，最大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居然“大动干戈”，脸红耳赤了好几回，实在不够洒脱。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总有人问，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就编这几本小书，值得吗？我也说不清。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不能老是计算“成本”和“利润”。唯一有点遗憾的是，书出得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

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而其根基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从章太炎、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贾平凹，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目的是借此凸现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守旧出新，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杂拌儿跋》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这点很有见地。但如以散文为例，单讲输入的速写（Sketch）、随笔（Essay）和“阜利通”（Feuilleton）固然不够，再搭上

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

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五四时抬出“美文”的概念，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政治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短文，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却总归不是嫡系。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甜得发腻，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浓得化不开”。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谈的闲话，有点苦涩，有点清幽，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词藻，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这种雅致与潇洒，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学养，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文化味”。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更讲浑然天成，更难造假与敷衍，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悟性与意趣——因其“技术性”不强，很容易写但很难写好。这是一种“看似容易成却难”的文体。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自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

当然，这只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另外的读法。在很多场合，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或愤怒。无意故作惊人之语，只不过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再加上“漫说文化”这一特殊视角。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唯一取舍标准的散文选。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有锋芒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漫说文化”。

怎样看待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

高崧

中国最老的一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从1982年印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1989年底八年间出书五辑，共230种，受到中外读书界的广泛注意。胡乔木同志赞许这套书是“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大工程”。

现在国外有些对我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存在误解的人，国内也有一些对极左思潮余悸犹存的人，担心我们又会回到“文革”十年的老路上去，把世界古今学术名著斥之为“封、资、修”，不仅不再翻译出版，还要来个“大批判”。我们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正如前不久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京剧音乐家李慕良先生艺术生涯六十周年音乐会上所说：“我们要发扬民族的东西，但是不反对外来优秀的东西。我们主张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指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对于资产阶级优秀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我们是不排斥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这席话，我想尽可消除这些人的疑虑。

回到我们的正题世界名著翻译出版来说，既曰“名著”，可见都是世界自古迄今享有盛名的作品。被公认为“名著”的作品，一般说来，它应是反映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气质与传统，或是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貌，再或是一门学科所由以开创，一个思潮、学派所由以形成的著述。而这些著述的作者也往往正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先驱者或代表人物。这些著作所蕴含的思想、观点，以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可能都是精粹，没有一点糟粕。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植根于作者其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因而必须有其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学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一部学术名著，它总是从它以往的思想材料出发，而铸成它自己的成就的。所以，够得上称为“名著”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由先启发，继往开来，既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又为后人开拓了新疆，从而构成人类文化宝库的新篇章。对于这样的“名著”，不管成于什么时代，出自哪个地域，形于何种文字，我们应该无分轩輊地视为人类拥有的共同财富。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把这笔财富通过翻译移植过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加以批判地吸收，使之成为我们有用的东西。

或曰：你说的这样的一些“名著”，都是历史已经有定评的古典著作。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对于历史遗产绝不可采取虚无主义。因此，翻译外国古典学术名著，于我们马列的经典章法可循，是可以不必担心或疑虑的；但是，对于外国今人的学术著作又当如何呢？能不能依此一体对待呢？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的时候，才能从古典学术著作中吸取营养，一经创立以后，只能与其他学术思想一刀两断，隔绝开来。当代的外国学术思想，形形色色，其中确乎有种种谬误。依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谬误的根源，无非是两条，一是社会根源；一是认识论根源。从认识论

根源来说，我们不能把认识上的谬误简单地视为一派胡说，而要从中进行分析批判，弄清人类历史上何以至此出现歧路，引为经验教训，从反面获得启发；再从其谬误的社会根源来说，我们要了解当代资本主义，除了靠自己的调查研究外，正是要从他们研究的问题中探索症结之所在，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对问题研究的方法，以及他们由此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因为我们与他们的立场不同，从总体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持否定态度，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回避它，就不去了解它，研究它。恰恰相反，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它们进行批判，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基于上述，我们翻译介绍外国学术名著，不能仅止于古典著作，对于外国当代的学术著作也要移译过来。这同样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

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说，翻译介绍外国学术著作，当然不能无选择、不加分辨地见什么出版什么，甚至迎合某些猎奇的心理，什么热门就出版什么。正因为外国学术著作——古典书汗牛充栋，当代书形形色色，流派纷呈，我们在宏观上就应该有个规划，有选择、有区别、有套路地进行移评介绍，在开展译介的同时，要在译本中强调写好批判性的序跋工作，以及正确指引读者。还要组织国内学术界，写出对国外学术思想有分析、有批判的研究性论著，一并提供给读者参考。

我以为以这样严谨的态度来翻译出版外书，绝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确理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绝不会误解成外书也不作移译介绍了。

让华文文学走向世界——黄维樑先生访谈录

刘仰东

几年前，读黄维樑先生的论文集《香港文学初探》时，就对香港的诗歌、散文、小说创作等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且对黄先生的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刘仰东：《台港文学选刊》曾刊登您的《期待文学强人》一文，影响很大，请问您是因何关注这个问题的？您认为文学强人的标准是什么？

黄维樑：在港台，文学书籍很多都被金融股票投资的书籍挤在角落，瑟缩地听着“金股齐鸣”的音响；在香港，文学杂志越来越少，文学书籍在书店的排行榜上，徘徊落后。这是文学的寒流。我从仲尼得到启发，构思文学强人这美丽的新形象，为文学请命，使文学光芒万丈，成为大业与盛事，对社会人类产生巨大而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缺少文学经典、缺少文学权威与偶像的时代，我想，应该期待文学强人的降临。文学强人绝对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要“四体毕勤，五色笔纷”。他可以专门于一种体裁，但一定要诗、散文、小说、戏剧之四体都动笔，体体都能。紫色的笔高贵，他用来写诗。小说最卖钱，出于金色笔。文学批评大公无私，他用黑色笔来撰，表示像黑面包公那样公正。蓝色是忠诚与信实的象征，他用蓝色笔来翻译，且用来写戏剧，表示舞台忠实地反映人生。他还要用朱砂笔一挥，圈选取舍，做个成功的文学编辑。他还要天文地理绘画音乐医学宗教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样样都懂，样样都强。如此这般，文学以往的读者才心仪向往这样的文学强人。于是，文学可望从弱势读物升为强势读物。

文学强人还得同时是个文坛超人。为了保持文学的强势，他必须团结文友，扶掖后辈。他畅销书的版税和作品的酬金，要拨出来，成为文学基金。用基金的钱来举办文学讲座、写作训练班，来出版青年文学杂志，来设立青年文学奖。

刘仰东：请您谈谈“世界华文文学”的内涵。

黄维樑：华文即中文，更准确地说，是汉语。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以及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就是世界华文文学。这其中包括所谓“海外华文文学”。海外指两岸、港澳以外的一切地区。赖伯疆先生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花城出版社1991版），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名称和含义有清晰、中肯的说明，我这里不用赘述。海外的华裔人士，全球共有二三千万，以华文写作的作家为数众多。赖先生的书，对知名而重要的作家尽量介绍，不过，遗珠之憾，从古到今都难免，我相信赖著大概不是例外。

说到历史，各海外地区的华文文学也多有源远流长的特色。就以立国才二百多年的美国而论，早在1847年，已有描写华工惨况的《金山篇》长诗。“美华文学”的开头，一点也不华美。我知道有《金山篇》，乃在读了赖著之后。至于《海外华人血泪史》，以及《洗衣歌》（闻一多著）、《敲打乐》（余光中著）、《素月的除夕》（陈若曦著）等等，举不胜举，都在这个凄楚的传统之中。

刘仰东：您认为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有没有中心呢？

黄维樑：这正是我要谈到的问题。即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有没有龙头

大哥的问题。大陆的大作家多，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又使气象一新，如果要找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或龙头大哥，很难不先考虑中国大陆。这样论排下去，大概台湾就是龙头二哥，香港就是龙头三哥了。不过“中心论”的问题复杂，讨论起来又颇不利于相亲相重，也就是有损于交流，反正都是龙的传人，不是龙兄就是龙弟，且按下不表。

刘仰东：您认为，华文文学如何才能走向世界？

黄维樑：“华文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这个说法有语病：华文文学存在于世界之中，为什么说“走向”世界呢？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要说的是，华文文学要怎样才能引起世界文坛的重视？其国际地位要怎样才能提高？华文作家怎样才能驰名于世？华文作家怎样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不少人尝试解答上述问题，认为做法不外是：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且要耐得住寂寞去经营更好的作品；要有更好的外文翻译；要注意宣传等等。这些讲法不无道理，不过我们要知道，闭门埋首于写作，固然有利于写出佳篇，但这样做不一定就可以写出杰出的作品。李白和莎士比亚都不是闭门觅句的苦吟派作家。我们还要知道，当今之世，中国文化要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应注重宣传工作。如何宣传华文文学，学问非常之大了。

华文文学界有了杰出的作家还不够，更应该有杰出的批评家。博览通识的批评家，应该把他们认为的卓越华文作家向国际文坛介绍，评介时兼作中外的比较，以尽量突出作家的卓越之处。这样的推介，加上上乘的翻译，才有可能把作家推上国际文坛的龙门。

西方若干汉学家看待华文文学时，有“泛政治主义（即只对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感兴趣）”，“有发现且提携主义（如盛传的对某壮年诗人的眷顾，使他成为诺奖热门人选）”等偏差。我们的杰出批评家也应该能改变这种歪曲，如此这般，孕育于十多亿人口的世界华文文学，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

普及世界史新尝试：史学写生——张联方先生访谈录

郭洪新

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演义体作品占一定比例，《宋史通俗演义》、《民国史通俗演义》等皆属此类。这类作品多以活泼的语言，动人的情节来阐述历史事件，虽不免出现与某些史实不相吻合之处，但其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却不可低估。由于种种原因，前人的演义体作品多涉及中国历史，世界史方面近乎没有。倘若把世界历史用演义体写出来，其作用和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就推出一套《世界史通俗演义》。书友驿站走访了该书主编张联方先生。

问：《世界史通俗演义》问世后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请谈谈这套书的大致情况。

答：用演义体裁写世界史在我国是一次不曾有过的尝试。长期以来，我们把世界史著作写得过于严肃，结果丢掉了带有艺术色彩的叙述史学传统，弄得本来喜读史籍的年轻人望而却步；有些人甚至一见到带“史”字的书就厌烦。我们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演义笔法编撰这套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正在于改变这一状况。编这套书还出于多年来对“历史”的思考。我们认为，一门健全的历史学，其本身起码应具有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三重特质。所谓科学性，就是求真，从准确无误的史实中找出历史自身所固有的发展规律来。艺术性就在于它能通过形象思维，具体而生动地再现历史的主体——人类的外在实践及其内在心理活动，展示出历史的美学价值和史学家的审美观。启喻性则是提供历史经验，在伦理上教育后世。比如，蒙森的《罗马史》不仅是一本严肃的史著，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对史学的上述认识，是我们这套书的哲学思想基础，而演义体裁则是表现史学三性的合适形式。我们的书既具有演义形式，又是试图使“三性”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的“史学写生”。至于结合的好坏，当然还需读者评判。

问：一般来说，演义体是指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请问这套书是否也包含许多传说和虚构的成分呢？

答：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如何处理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既吸取历史小说之长，又能把史料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是明清以来历史演义作家们所遇到的难题。本书坚持科学性，以正史为经，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即使采用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或野史记实，亦须查有旁证，勿敢游谈无根。对于那些合情合理的刻画和描写，我们在使用时也是严格掌握的。只在人物容貌、表情、动作、景物等方面用些这类词句，偶尔在描述心理状态时也用一些。其余部分则严肃对待，全以事实为依据。

问：世界历史历经 6000 年沧桑，您将如此浩瀚的题材浓缩成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当代等六卷精品，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世界史概念的理解。完整的世界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很难说。现有的史书数以百计，可以说都是不完整的。我认为，世界史不是个大麻袋，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它的内容和范围是由作品的宗旨确定的，因而其完整性也是相对的。本套书的宗旨是让读者在艺术欣赏的欢愉中把握历史规律。这就是我们浓缩世界史这一浩瀚题材的指导思想。例如，

本书为法国大革命安排了较多章回，就是考虑到它为奠定近代公民社会的各种基本原则做出过巨大贡献。在这以后，我们又突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强调产业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有些典章制度、政策法规等，确实重要，但写出来都是条款，必定乏味；我们仅明确指出其重要性，但写法上则用概括的方式，就不一一列出了。至于上古和中古，我们给了西方较大的篇幅，则完全是出于当前人类史料占有的状况。

问：通常来讲，追求演义味，须以人物为中心。然而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多如过江之鲫，您们是如何选择和刻画这些人物的？

答：这是我们编撰中遇到的难题之一。以人物为中心，这是演义体裁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重要编写原则。但也不可滥用，而是要找出确有“中心”作用的人物来。如古代的第一改革家乌鲁卡吉纳，在历史上留下较深的印痕的图特摩斯三世、埃赫那吞、苏拉、恺撒等人；近代马克思、恩格斯、克伦威尔、拿破仑等，现代的列宁，等等。对这些人物，是要追求情节，但又不为情节而损害科学性。我们只是对重要人物做些刻画，对其他更多人物则着墨不多。

文学翻译琐谈——冯亦代先生访谈录

郭洪新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充盈着许多闪光的作品。在我们放眼全球，吸收与借鉴外国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过程中，繁荣外国文学翻译事业无疑是重要的。早在本世纪前叶，鲁迅先生就曾强调：“翻译与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抑压了一面”，并发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感喟。今天，仍有不少老学者为此鼓与乎，他们在文学翻译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冯亦代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虽年逾古稀，却坚持不懈地向国内读者翻译和介绍当今美国文学的精粹。

记者：冯老，您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评论家，几十年来，您翻译的作品及对翻译作品的评论，在广大读者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迹，许多读者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文学翻译这条创作道路的？

冯亦代：我对翻译一直有很大的兴趣。刚念英文时，对我影响较大的是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梁遇春编选的中英文对照读物。这类书占去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上大学后，我开始翻译些小文章，起初译得也不好。1936年，我大学毕业。第二年，上海抗战。当时，我刚好买到一本美国进步文人辛克莱的写西班牙政府军保卫马德里的《不许通过》的小册子。这本书的字数不多，我就利用两周的夜晚把它译出来，寄给刚创刊的《译报》编辑部。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搞翻译，译文的翻译腔很浓，因此没有被发表。那时可说是年少气盛，不知翻译工作的深浅，至今还懊悔当时的孟浪。

1938年，我到了香港。徐迟在《星报》做电讯翻译。恰逢他谋到了新工作，我便接替他。时间性极强的工作使我对翻译更增添了兴趣。第一次译的文学作品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那是三篇写西班牙内战时马德里生活的，还是通篇翻译腔，是楼适夷给指出来的。此时，我又陆续翻译了些短篇小说和文学论文。

现在，回头看看那些译作，总觉得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译文中的翻译腔。何谓翻译腔？说句难听的话，就是死译，有一个英文字，就有一个中文字与之相对，所以念起来不顺口，读起来意义模糊不清，不是汉化的语言，解放之后，翻译的经验多了，我才有意识地改正过来，但也是件苦事。

记者：有人认为文学翻译是一件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事，算不上是一种创作，您对此有何看法？

冯亦代：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翻译比较简单省事，因为你所翻译的东西毕竟不是你自己的思想，也用不着你来思想，只要文字对应好了就可以。其实不然，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得书也多了，我愈觉得要做一个好的翻译，并非是件易事。一个好的翻译不但外文要好，中文也得过硬，要晓得外文讲什么内容，也要晓得用中文写出来表达了什么含义。

现在有许多同志也搞文学翻译工作，他们认为翻译是件容易的事，只要翻字典就可以了。其实翻译相当难。字典要翻，而且要仔细揣摩研究。你翻译一本书，不但要懂得它的文字，还要晓得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就是除了文字的知识外，还要晓得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甚至人物的习惯、当时的风尚。你如果不能掌握这些东西，不是有意识地去培养这些修养，要想翻译好作品是很难的。无论如何，翻译者所面对的是两种文字，两个国家

不同的文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性，每个国家的文字也有自己的特性。翻译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两种东西融会贯通起来。我用一个“通”字，就是说要通外，外要通中。

有一个时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有那么一种误解认为，翻译也是一种创造。他们指的这种创造就是可以随意更改原作者的意思。翻译不出的或不理解的，就用自己的意思替代原作者的意思，并认为这就是翻译的创造。事实上，我们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是指用中文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的含义这一过程。我常常在翻译时，为了一个字或一句话，朝思暮想，废寝忘食，有时会在睡梦中突然醒来，脑子里还考虑那个字那一段文章。美国小说家辛格说写文章就是将文字颠过来，倒过去，这一颠一倒之间就有奥妙，一等到你找到准确的语句时，你会真正从翻译中得到无比的快乐，这就如同佛教中所说的“顿悟”。这时候的快活，比什么东西都好。这就是创造性的翻译。用真正适当准确的文字，替代原来的文字，创造在这里，否则就是“乱造”。

记者：对于翻译的理论，人们常以“信、达、雅”三个字来概括，您对文学翻译的理论是如何认识的？

冯亦代：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翻译的理论还是信、达、雅。首先要“信”，只要做到“信”，才能做到“达”。所谓“达”，就是你的的确确用了适当的文字，把外国作者的原话翻译成了适当的中国语言。然后在“达”的基础上，才可以追求“雅”。这个“雅”也不能误解。我以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和普通无知识的人，说话显然不同。工人讲的是工人的话，农民讲的是农民的话，不能把你知识分子的话为求雅而掺杂进去。

中国的翻译是早有理论的，可以追溯到开始翻译佛经的时期，那时就有了一些理论。这些人们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可以指导或给后人作参考，但是也不能成为一定之规。对于一个搞翻译的来讲，他一定要从他的实践中悟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这套理论也许是跟大翻译家的“信、达、雅”理论相符合，但也不一定都符合。严复先生所讲的“信、达、雅”也有不足。譬如“雅”就不能不考虑每个人的出身地位，都一视同仁地“雅”。所以，我认为傅雷先生翻译得好，杨绛先生翻译的《塞万提斯》也很好。他们翻译的东西本身可以作为一个文学作品。

我还认为翻译是个推敲的功夫。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不能用平常的话来表达，而要用很适当的字来表达，遣字用句，正如中国古人作诗时所下的“推敲”功夫。对于我所翻译的作品，我比较满意的是几篇海明威的小说，以及后来与我老伴郑安娜合作的一些美国短篇小说，如《当代美国获奖小说选》里的几篇东西，我觉得还过得去，但严格讲，我还是不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每当书印出来，再看看译文还是有毛病，但有时是无意识的错，有的是推敲的还未到家。对于我来说，还有个困难，即我是南方人，运用普通话，我就不能望萧乾的项背。

记者：您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评论怎样看？

冯亦代：我认为外国文学作品评论的翻译是重要的，因为我介绍的西方作品，有的别人不一定能看到，我自己看了，总有些看法。介绍文章，事实上也等于是另一种书评。以前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以及后来其他学者如施蛰存等都写过这样的文章，不过我们现在反而做得少了。我给《读书》写“西书拾锦”，及在其他报刊上写有关书的文坛掌故，开始只是想介绍人家新出版的书，但是后来发现仅此不够。因为我们现在买不到他们的书，所以

我尽量地把书的内容介绍一下，这似乎比几位前辈做的工作好像又进了一步。我有意识地介绍西书的内容，有意识地介绍些外国书评家对这本书的看法，为的是方便中国的读者。

另外，我对国内轻视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一直有意见。在英国，翻译中国的唐诗和中国的古典文学，可以凭此获得爵位，并把他的翻译作品引入本国的经典文学之列。中国则不然，仿佛认为翻译只是技术性工作，而并非创造性工作，连稿费也比创作低，你能随便叫一个人拿起笔就翻译吗？至少他须懂得外文，文学翻译的稿费不能和创作比，这样的环境，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不应把搞翻译文学作品的人视为翻译匠，而应当把他们的工作当作一种艺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记 者：请您给初入翻译之门的读者推荐几本好书。

冯亦代：我想关于翻译的作品，如傅雷、汝龙、朱生豪、戈宝权、杨绛、萧乾和其他几位的以及李文俊译的美福克纳的几部小说，都值得多读，如果能与原文对读更佳。至于工具书方面，我想介绍三本书：钱歌川的《漫谈翻译》、《翻译的技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版）和李全安的《文学翻译275问》（河南人民版）。钱歌川是老一辈的翻译家，教了几十年的翻译，李全安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他们的心得都是根据自己多年在教书和编审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编印的《中国翻译》和商务印书馆的《英语世界》也可常看看，有时有好的具体讨论翻译的文章。

罕见书刊资料价值几何——'96 历代罕见书刊资料拍卖会观感

郭洪新

拍卖书业诞生于公元 14 世纪。本世纪，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专业性拍卖书店，仅荷兰就有 5 家。英国伦敦每周都有书刊拍卖会，美国每个月有一次大型图书拍卖活动。在中国，直到 1991 年才出现拍卖书业，具有合法拍卖权的书店目前只有中国书店一家。

9 月 14 日，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不仅因为 '96 历代罕见书刊资料拍卖会在这一天举办，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首次结构完整、门类较齐全的书刊资料拍卖会。中国书店总经理沈望舒称：这标志着中国拍卖书业正式出现。

为举办此次拍卖会，中国书店共征集遴选拍卖品 171 件，不仅有以珍贵的唐人写经长卷和宋刻宋印善本古书为代表的“经、史、子、集”完整结构，还有大量门类丰富的近现代稀有书刊资料。年代最远的拍品是公元 8 世纪的唐人写经，年代最近的是 70 年代才出齐的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

拍卖会吸引了许多藏书人。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的行家也派来了代表。经过 3 个多小时紧张激烈的竞价，共有 86 件拍品成交，总成交额 90 余万元。据称这是国内同类档次拍卖中较高的。书品上乘、印刻精良的宋刻宋印本《古史》以 9.9 万元的最高价成交。

被誉为“江北第一藏书家”的田涛先生，多次到国外参加书刊拍卖会。这次他购得了明初刻本扬雄的《纂图互注扬子法言》等书，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拍品多，竞投积极，展示了我国丰富的文化积淀。的确，随着幻灯片的一次次闪动，随着竞投价格的一次次上扬，我们仿佛走进了中国典籍的宝库，为祖先们创造的璀璨文化所震撼，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书刊拍卖，使这些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宝，重新焕发了生机。历史给予了它们更准确的评价。

书刊拍卖是文化含量很高的交易行为，与字画、邮品相比，是在较低的价格位进行的。书刊拍卖不是为了追求经济上的高收益，而是古书刊交流的一种方式。来自上海的学者陈子善先生，喜爱收藏近现代文学著作，这次专程到京参加藏书研讨会，顺便参加了这次拍卖会，得到了施蛰存的《灯下集》、林庚的《春野与窗》。他兴奋地说：“参加这次活动，大有收获”。据悉，这次拍卖的许多中低价位书被国内的图书馆买去，有助于丰富馆藏。拍卖品中有的珍品只限于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竞买。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买后须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田涛先生买的《纂图互注扬子法言》就将捐给国家。拍卖为动员个人的力量抢救珍贵书刊提供了一个途径。

曾经由韩人爱国团 1932 年编《屠倭实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拍卖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部书披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内有东京、虹口、大连炸案真相。这部书起价仅几百元，经过几番竞价，被韩国人以 2 万元的高价买走。据说此书将捐赠给韩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店副总经理恩亚立告诉笔者：“书刊拍卖大有学问。韩国人一向重视本国的书籍，常常用很高的价格购买本国书籍。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本国图书在世界上的价值”。可见，书刊拍卖的背后还具有很深刻的文化意义。眼下，中国古书在国际上的价格较低，宋版书在国外的拍卖会上仅能卖到 10 几万元，而别国的

书却能以 10 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成交。中国文化价值的公正评判还需要我们
凭借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好书时时见——书评书话

书评的韵味

伍杰

在蓬勃发展的书评事业中，好的书评文章越来越多。我认为好的书评文章，要有思想性、学术性、科学性、知识性、群众性。但仅此还不够，还要特别注重可读性。可读性中最重要的是要使文章有韵味，使人爱读，读起来有味道，如含橄榄，如南方人嚼槟榔。

谁都知道，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出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别人读，如果人们不愿读，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这一极浅显的道理，却往往被人忽视。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书和文章就等于白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书评的韵味、书评的可读性是书评文章的第一要义。明初文学家高启写过一首很通俗的诗：“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这首诗很自然，不仅写出了春光明媚的景色，还表达了在游览这种景色中，不知不觉到了要去的朋友家中，到达了目的地的那种愉悦心情。书评文章可不可以写得使人读起来像在春光中渡水、看花一样，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你写作的目的，使之“不觉到君家”。书评文章如果能写到这种境界，该多么好。这是书评的艺术，一直为人们所追求。

书评属评论文章的一种，一般说来，评论文章容易板着脸孔，四平八稳，讲许多可讲可不讲的道理，这些道理都通，都对，但读起来却枯燥无味。这样的文章太多，就会失去书评的吸引力。书评要写出韵味很不容易，我自己就很惭愧，没有写出过被人称为有韵味的书评文章。但是，我却经常想，如何才能使书评文章具有韵味。想来想去，我将韵味概括成三有：有文、有情、有骨。

文是指文采。文章无文则行而不远。重文采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历史上许多名文、名句能至今传诵，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有文采。“洛阳纸贵”的典故，最能说明好文采的影响，一篇《三都赋》，顷刻誉满京城，辗转传抄，文人传诵，使得京城的纸价大涨，没有文采不可能如此。唐代文人徐敬业是武则天的对立面，他写了一篇讨伐她的檄文，骂得她如狗血喷头。但写得那么好，武则天看了不能不服，拍手叫绝，称赞徐敬业的文采。滕王阁序本是洪州刺史阎伯屿准备在大宴宾客时要他女婿写作大露脸面的，不想王勃提笔就写，阎伯屿很不高兴，但当他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不禁叫绝，惊叹不止。这也是文采的感染力和作用。什么叫文采，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能意会，很难言传，大概说来，文思开阔，文意新颖，语言优美，文字流畅，内容新，含意深，构思好，用典巧，有独到见解，如此等。

情是指有感染力，有激情，有人情味，动人。文章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强烈要求表达自己思想的产物，不是勉强逼出来的。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两句词：“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还在调整琴弦，未正式演奏时就已经充满感情，这种感情也深深地感动了别人。书评文章也应该这样，要充满感情去写，写出激情，写出人情味，写出你的喜怒哀乐，喜欢什么，憎恨什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应该是此情绵绵

无尽期。使读者感到你是带着感情写的，是有情之作，值得回味，值得咀嚼。文章有情才会有生命力。

骨是指文章的骨气，主要是讲内容。书评文章要内容充实，要言之有物，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主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好说坏，都有鲜明的态度，要敢于讲真话。有一则笑话，一位秀才死了，他的鬼魂到阎王那儿去报到，正好阎王放了个屁，这位秀才魂大拍马屁，做文章说阎王的屁满屋芳香，屁声优美。阎王一高兴，给了他三年阳寿，三年后这位秀才魂回转阴曹地府，阎王见了他说：“你不是那个作屁颂文章的秀才么！”屁颂文章还谈得到什么骨气呢？书评切不可写成屁颂文章。“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有这样的胆略才会写出有骨气的文章。

书评是艰难的事业，又是十分需要发展的事业。如果有韵味的文章越来越多，读者便会越来越广泛，书评的影响才会越来越深远。

似曾相识话书评

伍杰

书评乃文章之盛事，评得好，如嚼橄榄，有滋有味；反之，则如同嚼蜡。有人议论近来有些书评颇有千评一面之感，有些忧虑。唐代诗人司空图有两句诗：“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宋代词人晏殊有两句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千评一面，近乎“莺声似故山”、“似曾相识”。于是，有人进一步给这些书评赠送了一个新的雅号：三段式八股书评。所谓三段式：一段内容简介；一段讲许多成就；一段一笔带点不足。所谓八股，是套用毛主席老人家反对党八股文章的格式：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一味吹捧，天花乱坠；毫无文采，怪涩难懂；东抄西拼，自无主张；若评不足，轻描淡写。这样的书评文章，读起来自然没有什么味道。

书评的苍白、千评一面，带来了许多弊端，一曰淹没了图书的特色。图书多种多样，内容、风格、文采，本各有异，如果不是擷出特色评议，自然淹没了图书特色。二曰失去了书评的引导作用。好书评好，坏书评坏，帮助读者鉴别好坏，引导读者读好书，抵制读坏书，这是书评的职责。不如实评，何引导之有？三曰失去了书评的监督性。书评是通过社会舆论对作者、对出版者、对编辑一种无形的监督。评头品足，论好道坏，是极好的鼓励或压力。评得好坏不分，哪里谈得到监督和压力。四曰失去了书评的权威性。“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好书好评，则可登龙门提高身价，“一入鬼谷则必死无疑”。坏书评坏，则如坠“鬼谷”，人皆诛之。书评没有个性，态度不鲜明，哪有权威？

书评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弊端？大概有几大原因。比如：人情稿太多。请老熟人、老朋友、老首长、老部下为自己的著作写书评，评论者当然只会大加赞扬，送人情。哪本书没有一点好处？专拣那点好的说，以次说好，以好掩次，彼此风光。如果评出许多不是，岂不失去了请你写的初衷，写了也无法交代。比如：隔山书评多。有些评者根本没有见到原著，看了一些间接材料，便受人之托写书评，出于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写。新华书店把没有见到原书而订购叫隔山买牛。未读原著而写书评，可以叫作隔山评书。这当然无法评出书的原貌。比如：推销书评多。或叫广告书评多。本来，书作广告乃光明正大之事，想多销图书更是无可非议。出版社对此特别热衷。但因此而只是一味说好，不敢批评，不讲不足的方面，当然就不应该了。比如：对书评缺乏监督，缺乏争鸣气氛。书评文章，各自写来，见仁见智，自成一家。如何评论？评得如何？书评文章的优劣，无人加以评说，无人监督，无人寻根究底、考察是非。没有这种习惯，没有这种气氛，没有这种条件。也缺乏争鸣气氛。此外，还有其他目的的书评，那就一言难尽了。

只有克服上述种种，才能提高书评质量。书评是针对图书而评，是自己读了书觉得应该评才评，可评才评，愿评才评，能评才评。书评是读书之感想，读书之认识，读书之收获，读书之结晶，是有感而发，由衷之言。不是遵命而评，受命而评，为别人之需要才评。

书评应有风骨

伍杰

书评是一种好的文化现象。目下，书评日渐增多。对图书说长道短论是非，这是一件好事。这对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对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和培育好的文化环境，都将起积极的作用。广大读者是十分欢迎的，作者也是欢迎的。发展书评事业是时代的需要。所以，书评应该提倡，还需要更加兴旺发达。

目前的许多书评文章，质量较高，读这些书评时，使人深受教益。但也常常感到，有些书评读来无味，主要是它们缺乏自己的风骨。什么是书评的风骨，清代诗人赵翼在一首论诗的诗中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所谓风骨，就是赵诗中讲的要有“自主张”，敢讲真话。不是看人眼色行事，放弃自己的主张，信口雌黄，“随人说短长”，人云亦云，人不云己不敢云。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敢讲真话，这不会是好的书评。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一首讲下围棋的诗中说：“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自主张”，应是评在“众人未晓”处，评得如“虎穴得子”，使“人皆惊”。和原著比，有新意，评出特色，帮助读者对原著有深一层的了解。这才显出书评者的水平，读者也才会感到你评得好，评得不一般，评得有味道。读了书评，对自己有帮助。可见，“自主张”，讲真话的风骨，是书评的生命。

书评的风骨，是对所有书评文章的要求。评好书的文章，评坏书的文章，评不好不坏的书的文章，评亦好亦坏的书的文章，都要有风骨，能“自主张”，敢讲真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本书的好坏，是容易看出来的，看出来之后，问题在敢不敢讲。书评要真正评出书中的得失，不能知其得失而不讲。在诸多图书中，我主张多评好书，多评政治理论读物，多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读物，多评全面介绍和阐述国情的读物，多评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多评近代史、现代史的读物，多评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读物，多评反映祖国历史、科学、文化发展的优秀读物。这些主题很好，围绕这些主题，出了许多好书。书评文章一定要用马列主义观点，评出这些书好在哪里？有哪些特色？通过书评，吸引更多的读者读这些书。这些好主题，有的作者并没有将它写好。不是主题好，书也一定写得好。书评文章要从实际出发评论，评书的不足，不好在哪儿，讲出真正的不好。

当然，更要评坏书，对坏书决不能留情面。要通过评论，清除它的影响，不能任其危害泛滥。评论中，要坚持“两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用科学的态度，认真地进行批评。要评中坏书的要害。

我觉得，目前书评中的难点，是不敢评坏书，不敢评书中的问题。评书要坚持风骨，必须认真破除这个难点，培养好的书评风气。不破除这个难点，书评事业就很难有新的飞跃。

谁都知道，书评讲真话，特别是评坏书是容易得罪人的。鲁迅讲过一则笑话，有一家生了一个孩子，客人们都夸这孩子聪明可爱，主人听了十分高兴。可是，有一位客人说了一句异词，也是一句真话，他说，这孩子将来终究是要死的。这句话使主人大为光火，十分生气。书评何尝不是如此呢？像说孩子聪明可爱一样的颂扬文章，主人爱听，也十分高兴。可是，如果像说

孩子要死一样的道出许多不是的批评文章，便得罪了主人。如今，谁愿多得罪人呢？我真希望有一批勇士，有一批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观点立场的书评家，带头扫除不好的书评风气。这些人必须有五不怕的精神：不怕得罪人，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报复，不怕得不偿失。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积极地大胆地无所畏惧地开展图书评论。

论书评

吴道弘

书评的四种写法

(1) 选择的方法。不是评论全书，而是选择书中的局部或某一问题展开评论。书评作者往往是根据写作目的或读者需要或书评家自己的爱好和专长来决定如何进行选择的。(2) 诠释的方法。为了使读者更深一层地理解原书，或是为了读者更易于接受原书的内容，对原书只作诠释，多用于学术著作。

(3) 分析的方法。这是相对于诠释而言的，用解剖的方法进行评述，常用于评论文艺读物中的人物、情节等方面。(4) 评判的方法，也就是评论、判断的方法，包括推荐和批评在内。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几种方法，可以互相融合、彼此渗透，因而只有相对的独立意义，在写作书评时也是可以兼收并用的，只是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怎样理解“评”与“介”的关系

“评”是指书评中的评论书的内容，而“介”是指书评中的介绍原书(内容、情节和梗概)或复述原书部分。如何理解书评中的“评”与“介”的关系，是有不同认识的。我认为书评固然离不开“评论”，但也应充分重视“介绍”在书评写作中的重要性，需要把评论和介绍恰当地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联系。这完全不是降低书评的品位、标准和要求，恰恰是为了更加全面、完善地发挥书评的作用。

事实上，书评往往难于舍弃对原书的内容介绍而孤立地保留评论文字。“介绍”是展开“评论”的需要，是评论的基础和出发点。评论与介绍有时难于割裂开来，书评中的介绍文字，不光是读者了解原书所需要，也不是为介绍而介绍，而是为评论服务的。如果没有必要的介绍文字，有时评论就缺少根据和说服力，就会显得苍白。而介绍文字往往是读者接受评论意见的先决条件。何况，介绍工作本身也是有观点的。在大量的书评现象中，可以举出相当普遍的评介结合的生动例子，需要研究评与介的关系，使它们在书评写作中正确发挥作用。

如何理解“多余文字”

作品中常有所谓“闲笔”，其实运用适当，有积极作用，是可为作品主题服务的。书评中往往也有同样的情况。一些看来是“多余文字”，如介绍作者的经历、爱好和性格，甚至专长等，或者介绍同类书的出版，或者引述有关的人和事，有时竟或插进一段议论、“闲话”、轶闻……这些看来是“多余文字”，其实是有意义的。或者增加文采，或者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书，或者调剂读者精神、激发阅读兴趣，或者传播知识、扩大读者视野。因此书评作者需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使书评写作有可读性和知识性，更希望书评编辑能正确对待书评中的“多余文字”。

书评家的五种素质

(1) 书评家要有充实的学问。书评工作这门专业是需要专家的。书评家要具备某一学科的专业，有比较充实的学问。书评家也应该是专门家，但首先是书评家。(2) 书评家要有广博的知识。专与博是相对的，是相辅相成的。专深一定要有广博作基础，才能建立牢固、精深的专业。但就目前而论，提倡有广泛的知识面，似乎更加必要些。(3) 书评家要有正确的创作态度。书

评作者首先是一个读者，先“钻进去”认真读，以读者的立场去感受与体会，然后再“跳出来”认真评论，善于向读者揭示书中的真善美，有创见、不偏私，恰当地去引导读者、帮助作者。（4）书评家要有高尚的道德。书评家的写作道德是书评家世界观的表现。因此道德问题也是与思想政治修养和觉悟水平相联系的。书评家也在影响、铸造人们的精神世界。目前认真倡导书评的写作道德，会直接有利于书评事业的发展。（5）书评家允许有不同的爱好与偏嗜。这是一种在统一的政治标准下，容许有不同的艺术、学术见解的素质。承认书评家的个性和特点，是要求在书评界产生出不同艺术流派和不同写作风格书评作品的前提，使书评园地万紫千红、百花竞放。

我的《书评例话》

吴道弘

感谢中国书籍出版社最近出版我的《书评例话》一书。这是关于书评研究的小册子。取名《书评例话》是因为书中“例话”部分是一组系列文章，内容比较系统，叙述也较简明，有例有论，就以它代表本书了。

我从50年代开始写书评，多少积累一点经验，但真正对书评理论进行思考和研究，却是近年的事。这也是80年代以来在有关方面的倡导、书评事业的发展 and 书评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受到启发和影响。建立书评的理论体系已经提上日程，但又是很艰巨的任务，需要志士仁人共同努力，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本书的序言除了讲述我与书评的因缘，有这样一段话：“书评作为一种评论形式，它的理论和方法，需要借助于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原则和方法应用到书评写作中去，使其有理论上的依据和阐释。并且要研究书评的写作方法和写作经验，从大量的书评现象中、从书评的实践发展中归纳、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以上就是建立书评学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我是根据这些认识去工作的。《例话》的写作是这样，跟《例话》有联系的《续话》部分，也是这样。只是后者的议论更有针对性，从小题目上着眼，企图发掘普遍意义。收入本书的《续话》部分，并不完全。有不少题目来不及收入本书，有的题目还在陆续写作。这些零星的认知，如果符合实际，有一定的道理，那末对于初学书评写作和书评理论研究，相信会有所裨益。

这些年主观上是响应领导关于重视书评的号召。这方面的写作或讲课，都只是做了一些书评理论知识的普及性工作，或者说是一个图书编辑份内的工作。书出版了，我衷心愿意听到读者的批评和意见。

这本小册子初版只印三千册，虽是全国新华书店征订过的，难免会有个别读者见不到。如果有机会再版的话，我准备修订，充实议论部分，删除一些文字，以保持原来的篇幅。这也算是作者的“独白”吧。

抚今追昔话书评——萧乾先生访谈录

郭洪新

国门开放十几年来，中国出版界日渐繁荣。这，对书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呼唤。回顾文坛往事，有一个现象是颇引人注目的：在半个世纪前，曾兴起过一股书评的热潮，它使书评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为读书界普遍关注。这一热潮的最初倡导者和组织者就是萧乾先生。现在，萧乾先生已步入耄耋之年，而他依然笔耕不辍，时刻关心着书评事业的发展。为此，书友驿站记者走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文化老人。

记者：30年代，您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所作的毕业论文——“书评研究”，是您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书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请问您当时因何对书评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萧乾：我对书评发生兴趣，可以说是一时心血来潮。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我先修的是文学，后转到新闻系。身在新闻系，可我的心却在文学上，毕业前就选择了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起先倒也没有更深远的想法，可是钻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它决不是报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中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书评可以开门见山地对读者提供直接帮助，其力量决不在文学批评之下。当时，我曾预言，随着读者层的扩大，新闻纸的飞增，书评也终有一天将像塞克斯机一样会在中国国土上飞翔起来。

记者：1935—1937年间，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编辑时，曾开办书评专栏，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开展书评活动，请谈谈您当时的设想和做法？

萧乾：我认为，书评是对图书实用性的批评。它最适宜刊登在报纸副刊上，因为又及时，又快，既涉及文学，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我在办副刊时，就专辟书评专栏。当时，我首先在文艺界友人及投稿者中寻找肯于并擅于写书评的人，根据他们的所长，大致分一下工，比如洋书大多由杨钢或刘荣恩来评。有些书评是既及时又有分量的，譬如，李影心评老舍的《离婚》，以及杨钢评斯诺的《活在中国》。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书评网，使书评成为一个固定的栏目。在副刊的“答辞”中，我还写了“书评政策”、“创作与书评”等文章，继续为书评鼓吹。我重视评论新人新作，尤其是对于外国人写的涉及中国的书，一定要评论，表明态度。

另外，还围绕书评展开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讨论。原计划分别请读者、作者、图书馆员、出版社以及评论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谈书评，可惜突然到来的“八·一三”事变把这个计划打乱了。但最重要的几个专辑，如作家论书评，还是登出来了。

记者：从您的《书评研究》（商务版）问世至今，已时过近60年。请问您认为书评活动应注意哪些方面？

萧乾：我认为，书评首先要有独立性，要有别于出版社的广告宣传。书评应该能让读者对图书有比广告更客观的评价。书评必须面对读者，不能面对作者。另外，我觉得只有不欠人情，才可能做到书评的公正客观。我办书评专栏时有一个原则，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所以，我总是到四马路书店一本本地买书，抱回来。分别寄给评论者。而且我认为，书评事业应与出版界的繁荣同步进行，现在出版界是比较繁荣的，书评应该跟上，

帮助读者识别哪本书值得买，哪本书不值得买。我在香港时，那里的影评界对电影的好坏采取星级办法，五星的最好，一星的就不太值得看。书评未必这样做，但是应对出版物有明确的意见，在写法上也尽量不要一般化。

记者：您认为书评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书评发展的前景如何？

萧乾：书评最大的障碍是人事关系。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面世，假如谁也不吭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一点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有的人甚至会在另外的场合挑眼找茬，为几个字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候大做文章。台湾有个血气方刚的女性叫龙应台，值得学习。她看不惯那里一些不痛不痒的文艺批评和社会批评，想靠个人的一股勇气，冒犯一下，闯出个新局面。龙应台的社会批评《野火集》，文学批评《龙应台评小说》有代表性。

现在搞书评比我那时的条件好多了。那时才有几本书可评？！现今的出版物成百倍的增加，而且社科院、大专院校等单位，比中国文化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该有一批同志，愿当文化咨询者，帮助广大读者选一选书。书评对我而言，算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我希望书评在咱们这里，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文字行当，也希望《北京日报》的“读书”副刊的书评专栏能够保持下去，不断扩大书评的作者队伍。

借题发挥说书评

吴怀连

晚饭罢，一位学界的朋友来清谈。听说我常为《读书》杂志写书评，连忙摇头。我问何故？这位朋友教导道：“这是末技，学者不为，暂且不说吧。就算很文雅，那也是一份尽得罪人，吃力不讨好的臭活：你评高了，言过其实，读者会骂你；你若如实道来，好话不多，那作者又会饶不了你，是不是……”

是不是呢？又是又不是，就看你怎么看，怎么写。说“是”，的确，开展公正的评论不易，弄不好，会四面楚歌。所以，人有书评不屑为，不及为、不敢为之论。说“不是”，是因为我之所谓书评，全不在给人脸上贴金或给人脸上抹黑，不是照相式的价值展现，而是一种特写艺术，一种创造。古人云：用人如用器，取长弃短。读一本书，如同一个人对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移烛借光，取舍全在自己。书评也一样，无非是日有所思，夜有所读，思读后写，借题发挥而已。我以为，不论是名著，还是庸作，都是作者思考的产物，都会有社会和事物的影子闪现其中，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虽然这种启示会因书的质量不同而有大小天渊之别。所以，我主张持凡书皆可读，凡书不可恃的态度来读书，书应是一座什货仓库，我只取其所需。书评也一样，我只是借他的题目，用他的材料，来做自己的文章。书评中的书和原书不必一致，也不可能一致。这并非逃避现实，怕读者扔石头砸我的窗户，怕作者不给我饭吃，而是我觉得与其作一个蹩脚的广告，将“质优价廉，实行三包，代办托运”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还不如深入一步，艺术一点，写出为什么是这样和为什么不是这样来。于己有益，于人无害，给读者以启迪，给作者以商榷，给社会以交流，两全其美，不亦乐乎！

我记得有一位名人（大概是钱钟书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有一种昆虫，专靠吃别的昆虫或动物的躯体为活。批评家也类似这种昆虫，是靠吃古人和名人为生的。吃古人、名人，当然是挖掘他们的思想。中国历史悠久，名人众多，令批评家们享之不尽。不要说诸子百家，秦皇汉武，曹雪芹早已被学术界五马分尸，“孔学”、“诸子学”、“红学”等已成显学，就是活着的钱钟书，被人称为“文化昆仑”，也有众多的“食者”在攀登。读书和书评未曾不是一种“吃人”的初步，但我总觉得，书评的目的不在于“吃”得了多少，而在于“消化”得下多少；不在于对所评者怎样的了如指掌，而在于借题发挥。当今红学文章汗牛充栋，但我胆敢说，假若曹雪芹活转过来，他一定会大叫：“你们在胡说！我不是那样想的！”但有谁相信呢？又有谁去理他呢？当年马克思在世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看了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写的评论文章后，不无幽默地说：看来我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一旦被吃进他的肚子，再吐出来的就不是你的肉了，他在借题发挥嘛！

书评就是如此。

书香书色说书话——作为集藏珍品的中国书话集

文言

书话，是指关于书及与书有关的人和事的知识小品。它是在中国传统的藏书题跋基础上，吸收了诗话、词话的长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清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近人周越然的《书书书》可以说是中国书话的早期作品。著名学者、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则是“现代书话之父”。他提倡这种以书为话题的“题跋式的散文”，并尝试过从多角度来从事写作。他先后结集印行的《书话》和《晦庵书话》，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现代书话的基础。作为一种知识小品，书话的个性特征是建立在如唐弢先生所说的“四点”要素基础之上的，即需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并要求“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

唐弢的书话确是脍炙人口，受到文艺界和读书界的普遍喜爱，并对当代的书话作家如香港林真（李国柱）和克亮（黄俊东）、北京姜德明、西安高信和梁永、南京秋禾、苏州王稼句等发生了有益而深刻的影响。书话作为读书人之话、爱书者之语，它往往是作家学者在书海夜航之际，或书林晨步之余，耳闻目接，手掇心感，乃铺展尺幅而随意写出的。这种具有随笔式的生动掌故，题跋般的闲适情志，故事似的曲折风采的文字，积久成帙，也就是白描书的生动景观和书人书事的有趣方面的书话集了。郑振铎、阿英、叶灵凤、黄裳、陈原、冯亦代、舒芜、孙犁、杜渐、钟叔河等人的书话作品，大都自成一家，各有其致。仅以既具书话之名，又有书话之实的集子而言，就先后问世有香港作家黄俊东的《书话集》、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周作人的《知堂书话》、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冯亦代的《听风楼书话》、杜渐的《书痴书话》、李庆西的《书话与闲话》等。它们中的好多种，如今已迹近罕见，真正可遇而不可求了。至于具书话之实而不具书话之名的书，如黄裳《榆下说书》、孙犁《书林秋草》、陈原《书林漫步》、舒芜《书与现实》、林非《读书心态录》、董鼎山《西窗漫记》等，则林林总总，逐一道来势必指不胜屈。

诗话、词话乃至联话，以其地道的中国学术神韵和古典风情，久已成为海内外爱好者访求和收藏的珍品。贵具艺文情趣的中国书话作品不仅在内容上有独到的笔墨，而且在版式装帧上也往往多有可爱可玩之处。北京三联书店在80年代陆续推出的那套小32开本的，先后由范用先生组编和钱君匋、钱月华两位设计封面的“书话丛书”，即是书话集出版款式的上品，具有鉴赏价值。我所收藏的唐弢先生1984年春的题赠毛边本，即为雁斋主人奉为藏书中的珍品。

今年值得说说的是，将要陆续上市的三部书话集。已经入藏的有姜德明先生今年7月题赠的毛边本《余时书话》。这是一部大32开本，附有书影的新文学书话集，掌故丰富，寓目成趣。作者在该书《小引》中曾担心“此书的销路”，并“估计不能叫座”；然而，著名的上海顺昌路凤鸣书店的老板却在来信中告诉我，《余时书话》是他们“近期的热销书”，闻之心喜。即将出版的有西安已故学者梁永先生的《雍庐书话》。该书分“雍庐书话”和“雍斋记事”两辑，共收入有关中国现代文坛和书业活动的文章130篇。同《余时书话》的作者一样，以丰富的积累，生动地把新文学运动中产生出来

的作家作品的故事娓娓道出，并侧重在久已为人遗忘、但确对新文学作出了积极贡献的部分 30 年代作家身上，读来颇多教益。《雍庐书话》为小 32 开大字本，封扉题字者为胡絮青老人，封面题图用的是张中行先生旧赠作者的“瓶梅图”，清雅可人。另一种是唐弢先生生前题写书名、饰有陈从周先生题赠作者徐雁的“兰石图”的《秋禾书话》，该书分“书山零岩”和“书城札记”两辑，将由北京文津街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秋禾书话》的作者系《中国读书大辞典》的总策划，以活泼的思想，介绍了港台大陆出版的文学文化名著的編集风貌、批评了中国历史藏书事业的成败得失，探讨了中国文献史著作的文化学术地位，凡 65 篇。

《余时书话》、《雍庐书话》和《秋禾书话》是书色书香、原汁原味的中国书话新品。姜德明先生说：“收藏之乐无穷”，“经过文化大劫以后，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富有痴情的各式各样的收藏家，包括藏书家在内，而且越多越好。”笔者真诚期望海内外的书友们不要忽视了同诗话、词话乃至联话同样具有价值的“书话”的集藏，因为书话作为你的书斋良友，回馈你的将是一份份浓酽的书香雅意。

迷人的书话

杨乔新

北京出版社推出的《现代书话丛书》是一部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好作品。这套书计有《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郑振铎书话》、《阿英书话》、《巴金书话》、《唐弢书话》、《孙犁书话》、《黄裳书话》八册，刚一问世就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一个金风送爽的下午，笔者拜访了著名书话家、该丛书主编姜德明（姜）先生。访谈在姜先生册籍山积的书房中进行——

杨：前些年，我喜欢读诗话，读《诗品》（钟嵘）、《六一诗话》（欧阳修）、《履园谈诗》（钱泳）等，每有会意，便欣然。正如诗话是品评诗的一样，书话是品评书的吧？

姜：可以这么说。诗话是以文论诗，书话是以文谈书。不同的是，诗话，还有词话、曲话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古已有之”的；唯有书话一语，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为公众所认可。我们可以说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但这中间是有了生发与衍变的。

杨：您刚才说的“以文谈书”，这可以概括书话的涵义吗？

姜：也不尽然。图书评论，文艺批评，有很多是“谈书”的，但它们未必是书话。我以为，书话一般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这样说，并不是我要把书话界定得很窄。不少人把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还有读书杂记一类的东西，以至某些图书广告，等等，都视为书话。我赞成这比较宽泛的认定。实际上，在书话的理论和实践上，不忙于下定义，写法上也可各行其是，这么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倒可以促进书话的发展。画地为牢，强求统一，绝不是好办法。

杨：当您说着上面那一番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唐弢书话》封底上印的这段文字：“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我感觉，您对书话的认识，是和唐弢先生很相近的。

姜：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是受了唐先生很大影响的。当年，我们常常一起去淘旧书。他还教我怎样挑选版本。

杨：那情景真是太迷人啦！

姜：60年代初，我在《人民日报》编副刊，请他为我们写书话。关于书话，唐先生还有这样一类说法：书话应是独立成篇的散文，有时带着点絮语式的抒情，人们在休息的时候拿来随便翻翻，能调剂精神，消除疲劳，增长一点知识。这些和你刚才念的那一段，都是对书话带有总结性意义的阐述。

杨：说起唐弢，您就很动感情，滔滔不绝。我记得您在哪一篇文章中说过唐弢先生于现代书话一体功莫大焉的话，是吗？

姜：我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只是唐弢，说起我们这套丛书里的其他几位作家，都会有很多话题要谈。若论中国现代文学，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西谛（郑振铎）先生抗战时期的《劫中得书记》，50年代为《人民日报》写的《书林漫步》，以至《西谛题跋》，都是脍炙人口。阿英先生是最早使用“书话”一语的几个人之一，他写书话年久量多，

这次搜集了许多过去不曾结集的作品，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杨：有人称这套书为“现代书话八大家”，您在策划这一选题时，有过这类的想法吗？

姜：八位作家，于书话都有建树；但有建树的又绝不只限于他们八位。之所以选了这八家，有些操作上的技术性因素（比如选编者一时比较凑手）也是起了作用的。还有人问过我这套书的排序，且让我把这八家的生年开列下来吧——鲁迅：1881；周作人：1885；郑振铎：1898；阿英：1900；巴金：1904；唐弢：1913；孙犁：1913；黄裳：1919。怎么样？不用我再作什么解释了吧？

杨：您刚才提到选编者，我也很想了解选编者的情况。

姜：选编者，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作家自选。黄裳先生几十年来爱写书话，这一次，他亲自圈定了篇目。第二类，是作家的家人选。选“巴金”的纪申，是巴老小弟李济生，他是资深的“老编”，已年近八十了。选“郑振铎”的郑尔康，是郑公的儿子。选“阿英”的钱瓊、钱小惠，是阿英的女儿和儿子。第三类，是作家的研究者选。选周氏兄弟的孙郁、黄乔生都是鲁迅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选“唐弢”的杨义，曾是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他也是“博导”了；选“孙犁”的金梅，与孙犁很熟，曾专门研究孙犁。

杨：这套书到手，我曾翻看过每位选编者撰写的《选编后记》，感到篇篇皆有卓见，他们确实是“上选”之手。在最近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北京出版社的展台摆放了这套书。该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想买这套书的读者可不少！

姜：这很令人高兴。出这么一套书，引领大家爱慕知识，唤起他们爱书、读书、藏书的兴趣爱好，使我们的社会多几缕书香，这是件好事。

附：书评四则

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我看英特尔》读后感言

厉以宁

虞有澄博士所写的《我看英特尔》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了，除了对此表示祝贺以外，我还想就管理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在学术界，曾经对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展开过讨论。问题是这样提出的：有些人认为管理无疑是一门科学，而且管理也只能是科学，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管理工作中有必要提出科学管理或管理科学化的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管理主要是指领导管理，而不是仅指基层人员的管理，基层人员的管理完全按规章制度去做，但领导的管理却是决策性的，这应当被看成是一种艺术，并且把它说成是艺术更为恰当。所以，领导管理通常被称为领导艺术。

在讨论中还出现了另一种看法，即认为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刘源张教授就是持有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之一。他在《科技日报》上写道：“如果多从管理科学的一面看，这就更多要求它的科学性。因为只有这样，管理科学才能传授、交流和发展。如果多从管理实践一面看，这就更多要求它的艺术性。而这艺术性又多是依赖经营者和管理者自身的经验……两者相辅相成，管理科学才能对管理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管理实践才能对企业的效率和效益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同意刘源张教授的观点。当我读完《我看英特尔》之后，觉得对此观点又多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英特尔公司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壮大，固然与高技术人才的汇集与精心钻研分不开，与技术创新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分不开。但如果再深入探究一番：怎样才能把高技术人才凝聚到一起，怎样才能调动每一个公司成员的积极性、积极性，怎样才能抓住机遇，大胆创新，怎样才能及时把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断扩大，这些都是管理的任务，而英特尔公司的成就是与管理的卓越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高层的管理还是基层的管理，只要是日常的管理，那么都是一种程序化的管理，一种按照规章制度的管理。日常的管理不按规章制度来办，公司就没有秩序可言，就会没有效率。程序化的管理是必要的，否则公司无法正常运转。

而非程序化的管理要比程序化的管理复杂得多。非程序化的管理同非程序化的决策有关。非程序化的决策既可以看成是非程序化管理的前提，也可以看成是非程序化管理的组成部分。这是指：在主观或客观情况发生突然变化，而又没有固定程序可循的情况下，或者原有的固定程序已经不能再起作用的情况下，必须不按照常规进行决策和管理，或者必须另行制定新的程序并按照它来进行管理。比如说，如果市场剧烈动荡，公司就需要有非程序化的决策与管理。

在非程序化的管理中，公司的高层领导既不能遵照固定的、标准的操作程序，也不能按习惯、常规办事，而主要依靠经验、洞察力、甚至直觉，并由此作出判断。人的创造能力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高层领导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在采取对策时要审时度势，运筹得法，掌握火候，恰到好处。

这正是管理的艺术性的表现。

管理是一门艺术同管理是一门科学，是不矛盾的，也不相互排斥。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情况下管理的艺术性表现得比较充分或比较明显，在什么情况下管理的艺术性较少获得表现的机会。但我们不能说，在什么情况下管理是一门科学，在什么情况下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

管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科学，都有自己的规律。非程序化的管理和高层的管理，尽管有较多的机会表现其艺术性的一面，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管理是一门科学或管理的科学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我看英特尔》一书第五章“管理第一部曲”中有“中西文化整合记”一节，这一节有关华裔人才外流问题的讨论是很有意思的。人才外流，对于公司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公司应当及早解决这个问题。英特尔公司是如何寻找对策的呢？所采取的主要是非程序化的方式，例如，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成立“多重文化整合委员会”等等。成效当然很好，“大规模人才外流现象，从此在英特尔没有再发生”。这不正可以作为管理艺术性反映的一个例证么？

类似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我只想说这样一句话：英特尔公司的成长史值得国内企业界人士仔细学习，从这里不但可以了解到高科技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应当采取的策略，而且能体会到为什么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我读《色彩缤纷的印度》

邵玉奎

这两年，很想读一点有关印度的书。其目的，既在于了解印度，也在于认识中国。

《色彩缤纷的印度》是一本不厚的小册子，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望世界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很容易让人读下去，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内容确实是“色彩缤纷”。

有人说，理性思维较强的人，需要有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去填补；感性知识较丰富的人，需要用理性来梳理。因此，他们在认识某种事物的过程中，注意力总是会出现某种倾斜。这种概括我不敢说一定很有道理，但起码可算是某些学人的有识之谈。

我们中国很大、很古老，在近几十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与自己的过去竖着比。横着比呢？比美国、比日本、比南朝鲜，都可以，但最有可比性的，大概莫过于比印度了。过去，我们也曾比过，说印度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中国比印度强。近几年，有些人不满足于别人给的这个结论，想自己了解一下印度怎么回事，想从大量的感性材料中得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愿望当然是很好的。我想《色彩缤纷的印度》的作者、编者大概正是应了人们的这种愿望而写作出版了这本书。那么，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我以为是达到了。

作为对印度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第一感兴趣的是：印度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呢？《色彩缤纷的印度》这本书就一件件地把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有代表性的人和事娓娓地告诉你。所以，它的导游性就十分明显。

这本书的开篇“第一印象”就很是有趣。

初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第一印象是什么？作者没有直接回答你，而是问你是怎么去的。如果你是乘飞机去的，那你会看到……；如果你是坐火车去的，你则会看到……；如果你是乘汽车去的，你看到的是……；而且，看到的会是大不相同。那末，这第一印象到底是什么样呢？作者没有回答，他只是这样地把新德里的几个侧影描绘给你，使你“亲临其境”，让你在这“缤纷”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就自然使读者感到实在和亲近，把它认作为一位笑容可掬的导游小姐而不是一位一见面就板起面孔的政治教官了。

眼见是真实的，但眼见又是有限的。该书作者不但亲领你看到印度的那种种可看见的事实和景物，同时又详尽地介绍了印度的现实和历史的各个方面，把一个立体的印度端给你看。于是，关于拉·甘地的遇刺、印度大选、电脑软件开发、人口压力、今日“神牛”、种姓与婚姻、宗教万花筒……便都分门别类、有事实有数字的介绍给你，其材料之丰富、涵盖面之广也是完全可以当得起“缤纷”二字的。

那么，究竟怎样缤纷，当然还需读者自己去读。只要你读了，我想你大体会同意的看法的。

老牛堂的血脉

李乔

“三家村”，在古语中指的不过是荒僻的小乡村，但自从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名字与“三家村”联在一起，“三家村”便具有了全新的、特殊的文化意蕴。

“三家村”的三位俊杰虽早已作古，但其血脉犹存；“三家村”的精神、风骨和文章神韵，都已被后人继承和光大。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就可说是“三家村”后又一家，他的《阿Q的祖先——老牛堂随笔》，即一部深具“三家村”血脉乃至中华文化血脉的文史随笔集。

“三家村”的血脉，实溯自鲁迅，老牛堂里也充盈着鲁迅精神的遗响。王春瑜先生（因其书，我喜称他为老牛堂主人）极服膺鲁迅，对鲁迅之书颇精熟，著文也爱道及鲁迅是何种见解，他自己的见解也常有鲁迅遗风。这些，都是能从《老牛堂随笔》中明显看出的。鲁迅有段名言，将中国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一》）。老牛堂主人秉此说之神髓，在一篇谈“国粥”的文章中，将中国史划分为“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和“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这真是新颖、独到而又精湛的见解。“三家村”的文章之所以每每有深刻见解，直接原因就是继承了鲁迅精神，而老牛堂在这方面也是毫不逊色的。

“三家村”的三位俊杰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战士，他们的文章总是直面人生与社会，洞察世道与人心，使人读后精神升华，倍增济世之心。老牛堂主人也是个时时将天下兴亡系于心中的匹夫，他的文章充满了爱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老牛堂随笔》中的《今古何妨一线牵》、《读明代的儒学教官》二文，就是他的忧患意识的自白。他写道：“我向来主张，史学家应当有忧患意识，史学著作应当有现实感。”又写道：“一个有良知的史学家，他的脉搏，应当与时代、人民的脉搏跳动一致，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触动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收在《老牛堂随笔》中的《“父母官”考》、《乌纱帽考》、《起哄考》，以及收入他的另一本文史随笔集《“土地庙”随笔》中的《“万岁”考》、《“株连九族”考》等文，就是他的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老牛堂主人的忧患意识，不仅与“三家村”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良心相通，而且更是上承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通古今之变”的优秀史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浙东史学，特别是章实斋关于学术须经世致用的主张，对老牛堂的影响尤为深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大抵皆其人意有郁结而发愤之作；老牛堂主人文革中三陷囹圄，爱妻因受株连死于非命，当也为其忧患意识所生之一大因由。

学养深厚，书卷气浓郁，是“三家村”文章的一大特色，老牛堂的文章也同样具有此种特色。老牛堂主人国学根底厚实，对文史古籍非常稳熟，著文常旁征博引，每立一说，总以众例随之，使人读之如饮浓茶醇醪，好生惬意。一篇两千余字的《麻将风行中国的历史》，就引了《坚瓠集》、《桐墩副墨》、《菽园杂记》、《樵斋漫录》、《梅村家藏稿》等二十种古籍，真使人觉得进了老牛堂，如入天一阁。老牛堂主人运用材料最不喜旧钱新铸，而是极崇尚顾亭林氏的采铜于山自加冶铸，他鄙称那些买旧钱充新铸、倒卖

他人牙慧的作法为“二道贩子”。“三家村”中有两位史学家，老牛堂主人也是史学家，这可谓“英雄所学略同”，而这也正是他们的文章皆具有浓厚书卷气的共因吧。

“三家村”的三家都是才子，老牛堂主人也是极具才情的才人。读《老牛堂随笔》，只感到灵动的才气扑面而来，而决无呆头木脑的章咒气、偈颂气。《老牛堂随笔》的才气特别表现在文章构思的新巧和行文语言的幽默上。鸡年伊始，谈鸡之文如潮，老牛堂的《雪泥鸡爪》一文，以其别出心裁的构思和幽默的标题弄潮涛头，鹤立鸡群。文章从婴儿之男根被昵称为“小鸡鸡”，谈到古代词作名篇《满庭芳·失鸡》，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经》名句，谈到明清胥吏下乡弄得鸡飞狗跳，最后又以评说一副借鸡谈改革的漫画做了意味深长的煞尾。全文庄谐并出，文史结合，韵调轻松而又寓意深刻；标题“雪泥鸡爪”由成语“雪泥鸿爪”化来，更是奇巧、幽默之至。老牛堂之文，戏言、戏题颇多，然其中实包含许多重大问题，《马桶与文化》、《闲话猪脬》、《九斤老头论》就是这种庄谐出的妙文。幽默出自睿智，诙谐系于才情，老牛堂里总是回响着智慧的笑声。鲁迅杂文的幽默是冠绝一世的，“三家村”也颇有幽默气质（廖沫沙的诗尤著），老牛堂的幽默与鲁迅、“三家村”是一脉相承的。

我与老牛堂主人相识有年，自认对他的学问、才思有所了解，所以才说了些赞美《老牛堂随笔》的话。但说的是否对，还要靠广大读者亲自过目、品评，诚如禅语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领会意旨，一切自看。”

山村花果——读曲令敏散文集《有情如画时》

张中行

说起读书，我感到惭愧，因为昔年是临渊羡鱼式，近些年变为守株待兔式，即不钻图书馆，不跑书店，有人送到眼前，就翻开看看。说翻，意思是未必逐字逐句。有时甚至是一瞥而逃，比如一瞥恰巧就瞥见由《红楼梦》“护官符”中看到新兴资产阶级的高论，我自知悟力过低，理解不了，就只好扔开，干别的。自然，这样的高论稀有，我也就常常能够耐心读下去，语云，开卷有益，因而就有所得或大有所得。“鹤鹑巢于深林，不过一枝”，这里想只说一种，是不久前曲令敏女士过访，放在案头，只有二百页的小本本。书名有点怪，是《有情如画时》，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不算少，6000册。作者曲女士却是河南人，生于南阳附近的农村，在平顶山做编辑工作。书所收都是篇幅不长的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柔韧的光阴》，收怀旧文62篇；第二部分《相遇大自然》，收记游文13篇；第三部分《有情如画时》，收人生感悟文18篇；第四部分《超度》收文学评论文9篇。总数超过百篇，我都看了，印象呢？说句近于自我检讨的话，是看之前，也许心灵深处有点看不起山村，以为未必值得看；看之后变了，是认为很值得看看。并联想到苏东坡词“天涯何处无芳草”；芳草，兰、芷之类，恐迷《楚辞》的人会想入非非，所以换为“花果”，是想说，虽然是山村，也会开美丽的花，结香甜的果。誉为美丽香甜，要有理由，以下说理由。

理由之一最重要，是感情真挚。尤其在第一部分怀旧的许多篇中表现得更为真切。她爱故乡的天，故乡的地，故乡的人，直到故乡的一草一木。她写儿时的经历，记得并怀念的一切，直到期望和梦，都是笔端充满情，眼中充满泪。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这就因为，如“别时容易见时难”，“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类句子，都是“以眼泪洗面”时写的。曲女士的怀旧散文就是这样写的，如：

外婆的山村朝着一道土岗，土岗下是一条小溪流……过了横在小溪上的石板桥，一条大路，一漫坡上去，有二三里长，大路的那一头，是一个叫皂荚王的村庄。太阳落山的时候，金色的余辉照着那些巨伞似的树冠，绿油油，光飒飒，像一堆浓浓的云，偎着蓝得清甜的天空。……我曾经求赶马车的舅舅带我过去，去看看远处的皂荚王，舅舅不肯，后来外婆去世了，我也长大了，再也没有机会去造访那些充满幻想的皂荚王了。（《枸桃树和皂荚王》）像这样的童年的梦，我也有，所以读了觉得好，并愿意也吟味这怅惘之情。有的人也许不以为然，因为囿于个人哀乐，缺少社会内容。这是近些年来流行的评论文学作品的理论，照方配药，即所谓写有社会内容的，用的却是古法，九品中正，常见的是，对于高品位，歌颂，间或一见的是，对于低品位，说也不无小疵。我直说心里话，不喜欢看这样的作品，原因很简单，是认为所写乃他人之心，而非自己之心。写自己之心，就一定要含泪吗？当然，也可以笑，或说逗笑，向相声靠拢，甚至侃。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有人愿意听相声或准相声，愿意听侃，那就让他们去听；至于我，还是愿意看看会引人落泪的。为什么？讲理，一言难尽，只说个最浅近的，是听侃，常常是一笑而罢；含泪，心上留痕，所得不只会多一些，而且是珍贵的。

再说理由之二，是有不少地方写得很美。尤其写乡土的那些，真就如书名所说，“如画”。有时感情过浓，遐想飞入，还会成为散文诗。如《葡萄架下》就是，只抄开头和结尾两段：

葡萄架下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深深的天海，游动着耕云彩、种仙草的神龙，鲜为人知的荒宅老树里，出没着专等与人婚配的美丽仙家，奶奶的世界竟然三倍于凡常人的世界。

有时，我会蹲在青砖铺成的甬路上，让目光长久地沉浸在苔类世界，竟然也有高山大河，也有马牛良田，浩瀚极了……（原有）这与人的印象是用诗笔写，显然是因为作者富于诗情。我的领会，这样的情是由热爱人生来；没有这种热爱人生的感情，勉强成篇，是难于有感人的力量的。

至于表现，就还要有感情以外的什么。这是语文的造诣，作者也是相当高的，能够做到有文采而流利。说到文采，如不少写散文的人一样，作者也是走“刺绣文”一路，精雕细琢，有些地方突出想象，使人想到徐志摩；语句使人想到晚明的竟陵派，但这都会给人以脱俗之感，而并没有妨碍通达自然。总之，专由行文方面看，这本散文集也是值得看看的。

还要附带说一下，书末尾那篇“代后记”，作者同学曹秀君女士写的《我心目中的令敏》，尤其值得细看看。这篇评介作者，真是做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不稀奇，因为既同学，又深相知。稀奇的是，据说这位曹女士并不是从事写作的，而文笔轻灵流利，无论写人叙事，都恰到好处，与人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之感。我通读这本书，有些篇很喜爱，最后看这篇，未终篇，就有吴季札观周乐叹“观止矣”的感觉。看完，更想到山村，想到花果，并很想再说几句赞扬的话，可是一时想不好说什么，也就只好算了。

得失寸心知——编者独白

于平凡处看孙中山先生

俞宗元

初接触《孙中山全传》书稿，亦未觉文字有何出奇，大抵平铺直叙而已，然读未竟章，渐被书中丰富的内容所吸引，及至读毕，心中涌起无可名状的感叹：中山先生真是太伟大了，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以往中山先生的传著大多出自外国人之手，有的只是段传，且多数对中山先生的晚年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也有的是政治思想传。该书属人物传记，力求写“全”和写“实”。不仅反映从出生到逝世的整个过程，而且多层次多角度地立体展现孙中山丰富多彩的一生；不但写他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丰功伟绩，而且写他的气质、学识、谈吐、待人接物及廉洁清俭的作风和伟大人格。并且用充实、真实的材料，让事实去说话，不做空洞的说教与虚浮的夸饰、描写。

孙中山身为大总统，却甘愿过着俭朴的生活：总统府的一般人每天菜金在三元以上，而他的菜金不过四角；一件四个明兜的制服（即后来流行的中山服）从讨伐陈炯明的战场，穿到改组国民党的会场，又穿到北上和谈的途中。有人建议他穿西服，他连声说“不”，“穿西服得用外国的衣料，那就要花我们本国的钱，使我们的黄金外流。”他不吸烟，不喝酒，更没有专用汽车，去黄埔军校讲课，为节约车费，宁愿带卫士步行……

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长兄孙眉、儿子孙科被人推选担任要职，都被他否决；外甥来军政府谋职也遭拒绝。他平等待人，从不摆官架子。任大总统期间每天接见大批来访者，上至官员政要下至平民百姓，他拒绝人们为他个人搞庆典、祝寿，甚至连生日的准确日期也不对外透露。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后，又回到人民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

凡此种种，在书中都有细致的描写。“……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鲁迅对孙中山的高度赞美在《全传》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形象的印证。

没有苍白空洞的说教，不务夸张虚饰的描绘，构成“全传”平实的文风。由于书中“没有一言是夸张，没有一事是杜撰”，“所叙及的每个感人的情节，完全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实在的事迹和言行，”读来才使人倍觉亲切，感到真实可信。惟其如此，才是简尽黄沙始见金，于平凡之处见新奇——因为纯美的事物不需要任何夸饰，我以为。作者在文风方面的尝试，虽远未达到尽善尽美，却值得提倡。广大读者对《孙中山全传》的首肯，恐怕也包含着文风方面的因素吧。

我写《毛泽东走出红墙》

吴晓梅

1992年，我担任了内部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8年卷的责任编辑，接触了许多毛泽东1958年的文稿。发现，1958年对中国是不寻常的，对毛泽东也是不寻常的。这一年，是毛泽东建国后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他在北京中南海办公的时间只有2个月左右，而中共中央在外地召开的各种会议也达9次之多。毛泽东把北京红墙内的决策机构叫做“加工厂”。他还有一个习惯，每逢决策大事，总要出北京到外地。那末，在1958年这个不寻常的一年，毛泽东10个月对大江南北的巡视中，他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看到后听到后他是怎样的反应？这又是怎样影响了“加工厂”的生产？这些都是《文稿》无法容纳却极有意味的，于是我就写成了《毛泽东走出红墙》一书，王君同志担任责编，1993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在党的领袖人物中，如今展示得最充分、研究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他的话题就延续不断，渐成热门，直到1993年形成了一个高潮。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来说，1993年前后，就有30余本。如《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毛泽东领导思想论纲》、《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机要秘书的思念》、《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的三本《走出韶山冲》、《雾都较量》、《功盖大禹》，等等。

我觉得，写历史，细节的饱满比结论来得更重要。1958年8月4日，毛泽东来到了河北省徐水县，听县干部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要收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后，曾经和县干部们有一段对话：毛泽东先感叹要收那么多粮食啊，接着他问怎么能吃得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有县干部说，换机器。毛泽东否定了，他说，哪一个县的粮食都是那么多，你换机器换不来。又有县干部说，酿酒。毛泽东也否定了，他说，每个县都造酒，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大家于是尴尬，说不出来。毛泽东呵呵地笑了，说了他的设想：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

透过这个细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毛泽东在当时并不存在的“粮食多了”的问题面前的心情：半信半疑，惊喜交错，鼓励、憧憬多于疑问。历史，对于考古学工作者来说，就是轻轻拂去泥土后的一块残碑，或者干脆就是锈蚀了的一个铜板。对于社会学工作者来说，就是修补连缀一个又一个失落的细节，重要的或琐碎的。细节和历史走向的关系，不是骨骼和血肉的关系，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是延伸、连缀着的细节来决定的。

好在毛泽东的时代离我们今天还不远，大量的细节的提供，都会使这一段历史的轮廓愈加饱满、多汁而有质感。

探宝之旅

孙业礼 熊亮华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
加减乘除，反复对比。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赵朴初居士为一张陈云打算盘的照片配写的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擘划的生动写照。

追寻陈云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几十年风风雨雨历程中的足迹，我们就像开始了一个“探宝之旅”，深切地感到，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陈云，其革命精神、丰富经验和崇高品德，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于是有了这本《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的小书。过去宣传、介绍陈云生平及思想的东西不算很多，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在这方面有所补益。在共和国经济史上，陈云写下的神来之笔不少。我们选取的角度，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前几年通货膨胀来势较猛的时候，西方经济界人士对找他们取经的中国人士说，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我们还应该向你们取经，你们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建国初陈云领导的平抑物价的斗争。那时候，国民党留下一堆经济上的烂摊子，持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曾经创下极不光彩的“吉尼斯纪录”。陈云领导中财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投机资本较量，组织恢复工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只用了几个月功夫就解决了问题。尤其是对付投机资本的时候，以什么为突破口、采取什么手段、选择什么时机，部署的周密性丝毫不亚于组织一次战役。对这个成就，毛泽东赞扬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大概都对饥饿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当时为渡过难关采取的很多措施，比如进口粮食、卖高价糖果点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乃至供应尼龙袜、补充供应大豆等，都与陈云有直接的关系。在浮肿病蔓延、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惨象的严重时刻，这些措施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陈云提出，要把关心民生作为重要的国策。

宝钢上马的时候遇上经济调整。当时这是一个超大型建设项目，社会上纷传宝钢打地基就像往海滩上撒大面值的人民币。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彻底下马，有的主张牺牲别的项目也要把宝钢搞上去。陈云抓经济调整工作，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抓住宝钢这个影响全局的要害。他不顾病体，亲赴上海调查，经过三次反复，最后拍板：干到底，分期建，设备技术全面进口。这样，黄浦江边兴起了一座现代化钢城，经济调整也顺利进行。

其他如粮油统购统销决策、主持制订“一五”计划等，我们在写作过程中都力图准确反映出陈云的贡献。陈云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年了，这本小书也表达了对他老人家最深切的怀念。

从一个侧面看吴晗——写在《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出版之际

苏双碧

十年动乱之后，学术界、知识界的同仁出于对吴晗这位在“文革”中首遭其害的正直学者的崇敬，编辑出版了《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吴晗文集》、《吴晗选集》、《吴晗史论集》等书，把吴晗的绝大部分著作都囊括其中了。近几年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了《吴晗自传》和吴晗的一些信件，这些遗稿内容都很重要。尤其是吴晗致胡适的十一封信件，“文革”中曾经被当作反面材料公布过，上述有关吴晗论著选集也都没有把这些信件收入其中。其实，这些信件对探索吴晗的思想发展脉络是很有用的，借我和方攸行、方竟成同志编辑《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的机会，把它收入其中，可以帮助读者更真实地了解吴晗。

《吴晗自传》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吴晗遗稿。十年前，我和王宏志在着手写《吴晗传》时，吴晗的秘书郭星华同志交给我这份《吴晗自传》。这份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好像是为了向组织上汇报个人历史的简况而写的。自传全文只有一万多字，但它简单扼要地概括了吴晗所走的道路，以及他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的历程，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崇高信念。文字简朴，逻辑严谨，是一篇难得的传记著作。由于我在写《吴晗传》时曾经引用了“自传”中的几段话。国内外研究吴晗的学者纷纷来信，希望这份《吴晗自传》能够公诸于众，便于研究者参考。郭星华同志交给我的稿件是手抄本，个别地方字迹不清或含义不详，对此，我进行一些必要的校订。

吴晗给梁志冰的信和吴晗致胡适的信都是吴晗在青年时代留下的珍贵墨迹，这些信件大多是探讨学术和谈学习生活的，其中致胡适的信，曾经被当作“吴晗的治学方法和反动政治思想是同胡适一脉相承的”，“接受了胡适的衣钵”的铁证来讨伐吴晗的。我们在写作《吴晗传》时，有些吴晗的学生和朋友出于对吴晗爱护和尊敬，曾向我们建议，30年代吴晗和胡适的关系最好回避或从略，大约是担心这段历史有损于吴晗的形象。然而，即使这些好心的朋友，对吴晗和胡适关系的真相也并不太了解。我们把吴晗的这些信件收入本书，目的就是让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全貌有个了解。

吴晗和胡适的关系，主要是师生关系，他在治学道路和某些学术观点上接受胡适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吴晗也从来不隐讳。至于政治上，吴晗是爱国的，他并不赞成胡适提倡的“读书救国”。这一点，我们从吴晗致胡适的一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一八”事变后4个多月，即1932年1月30日，吴晗给他的“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唯一一封谈政治的信件。这封信一开头就对胡适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什么问题呢？吴晗尖锐而激烈地指出：“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这封信接着又写道：“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对国民党的卖国退让政策，愤慨之声跃然纸上。这绝不是对国难漠不关心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吴晗和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出路何在？他感到彷徨，他希望胡适能给他“指示一条出路”。众所周知，胡适是主张“读书救国”的，但是，吴晗对“读书救国”这个口号并不以为然。他赞成“读书”，但“读书”能否“救

国”，他是怀疑的。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如果这些举动都不行，“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二无可凭借的势位；三无可号召群众，空口说‘救国’是否有用？”这段话显然是对胡适的“读书救国”将了一军。信中说的“争人格”，实际上是说人要有民族气节，不能甘心当亡国奴。而“为国家争光荣”，显然是希望政府抗日，把日本赶出中国，否则国家还有什么光荣可言呢？吴晗悲愤地指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这样一种思想活动都没有，就等于是“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煮的时候，这痛苦如何能忍受？”这些话可以看出吴晗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心。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吴晗“无时无刻不被这种痛苦所蹂躏”，他经常处在“无可奈何的深思中”，经常“失眠”不能入睡。

从这封吴晗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吴晗是把胡适看成“恩师”，碰到什么不解的问题都求教于胡适，至于胡适的政治主张，他并不清楚，他对胡适是信任的，但这种信任又是盲目的。所以在这封信的最后特别嘱咐胡适：“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生在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教导，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这里说的“有党籍的人”是指加入国民党的人，胡适是没有党籍的。吴晗对国民党不是信任的，对胡适的政治倾向也是不清楚的。胡适当然不会赞同吴晗这封信的内容。胡适如何答复吴晗，现在已不得而知。看来，当时的胡适看了吴晗这封信之后，也只能置之不理。吴晗也不可能从胡适那里得到什么“启示”。所以，过后一个多月，即1932年3月5日，吴晗以西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过去种种》的文章，对学生运动无声无息表示不满，称赞清华爱国学生运动是“民族复兴的征兆”，是“最富生命力的奋斗者”。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是“中国的专杀同胞不作别用的革命军阀。”这和一个多月前致胡适的信思想内容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的言论，还在许多文章中表露出来。如在稍后的一首《感事诗》中就以“叱咤世惊犹梦醒，汤阴人作国魂夸”来赞扬主张抗日的将士。吴晗确实把胡适看成“恩师”。然而师承关系，主要是学生接受老师的治学方法和道路的影响。政治上的影响尽管是存在的，但却不是必然的，胡适留在大陆上的学生中，许多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便是例证。

吴晗主要是个学者，明史专家，同时也是个民主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社会活动家。他所走的道路是笔直的，也是坎坷的。笔直是指他从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一经认定了目标，就勇往直前，不论在学生时代，还是参加民主运动时代，或者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权建设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忠诚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义无反顾，从不犹豫退却；坎坷是指他在生活道路和政治生涯上，从北平到昆明，家境的贫困，夫人的重病以及物价飞涨，都使他经受着生活拮据的困扰。而在政治生涯中，他作为一个民主战士，经受了国民党政府迫害，战友的被暗杀，学生的被逮捕、枪杀，以及自己上了国民党“剿总”的黑名单，他的晚年又经受着“四人帮”的迫害。吴晗以他对党的忠心不渝，以他生活道路上的坎坷，坚贞不屈，谱写了“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辉乐曲。本书收入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吴晗光辉一生的思想和行动。

弘扬传统书香精神——策划《中国读书大辞典》的心路历程

秋 禾

要是没有 80 年代那此起彼伏的几度“读书热”，我也许就无缘结识已故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并熟读他的《晦庵书话》，那么自然这部后来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审定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的 180 万字的《中国读书大辞典》，也就不会在今天以她那书香博雅的形象，走向千家万户的案头书架上。

如今，当文化学术界的前辈和海内外传媒热情地给予这部由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读书大辞典》以褒扬和好评时，饮水思源，我倍感《晦庵书话》及其著者对于我的莫大的教育意义。实际上，总策划并同我的学长王余光先生联手主编这部百科型的读书大辞典的契机，正萌生于我在北京大学求学之时。当时，我爱读《晦庵书话》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我不仅反复借读，而且不断进城访求这部当日已脱销了的好书，直至先后获得书友转让的初版本和著者题赠的重印毛边本为止。我曾不止一次地对北京大学学海社的书友们说，要是我现在必须作一次远行，而且条件只允许我携带一部书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取这部《晦庵书话》。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嗜读《晦庵书话》而获得的经验，以及访求此书的一份经历，我不仅从此登堂入室，热爱起书话作品，而且还有所师法，开始尝试着书话书评的写作，并在《书林》杂志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书话作品《“龙虫并雕斋”书话》。这篇习作，品评的是语言文字学家王力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龙虫并雕斋文集》和《龙虫并雕斋诗集》，后来得到了王先生的赞许。以此为起点，我逐渐在自己的藏书中建立起了“读书之书系列”的特藏，将港台和大陆有关名人读书生活和情趣的著述、书话书评、读书随笔、书序书跋等搜罗殆尽，并试图用自己的笔把它们一一介绍出来，以飨有同样嗜好的读书爱书之士。在多年努力之后，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正是在个人写作上的失贩，才启发了我必须走群体合作的路，把众多读书爱书之士集结在一起，集体编纂一部旨在揭示中外图书及其阅读的广博知识，总结文化名人的读书经历、心得和方法，弘扬书籍文化和读书精神，以推进社会各界的读书好学风气的工具书。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图书形式，才可能展现出古今中外那博大恢宏的读书殿堂和丰富斑斓的书香世界。

这一构想，经过细致的策划和组织，以及由《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书摘》、《文汇读书周报》、《新民晚报·读书乐》等读书报刊的资深编辑组成的编委会的认真研讨，终于经过三年的繁重而务实的撰编审校过程，顺利问世。所有有关“读”和“书”的知识内容，被撰写成 4000 余个词条，安排在“名人读书录”、“读书知识录”、“读书环境录”、“读书博闻录”、“读书门径录”、“读书品评录”、“读书解疑录”、“中国古典名著导读”、“中国近现代名著导读”和“汉译世界名著导读”10 个大类之中。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读书史迹和读书典故、名人读书生活、读书理论知识和方法、读书名著和读书报刊、导读书目和书评书适、工具书和使用方法、与读书有关的纪念节日庆典以及近 600 部精选的名著导读。其中大量词目系首次被收入辞典。如中国历代文化名人遗存的读书台和读书处。中外有关勤读苦学的成语典故，近代以来创办过的读书杂志和报纸（含读书类专

栏专版)，古今名人的书斋纪实和关于读书的精辟论述，近现代刊行过的导读书目和读书之书，以及西方、港台、大陆的最有影响的书和历届畅销书书目等，均是中国读书史和文献史那宝贵的资料，该书都予以穷搜并撰写成释文。且其视野不仅以大陆为限，对港台和海外有关的内容尤加重视。为此，台北在海内外影响广泛的《中国时报》和香港《文汇报》等 30 余家报刊电台均在该书编纂定稿的过程中，作了热情报道并给予好评。今年秋天，由台湾授学出版社印行的台湾版，也将分册发行。

《中国读书大辞典》以新颖可读、书香博雅为风格，装帧精美，具有收藏价值。全书为大 32 开一册，封面饰以古色古香、有江南老街情调的书肆街剪影。卷首的插页则展示了别开生面的书香世界，既有“长留千岁鹤，声远读书台”的江苏常熟虞山昭明太子读书台和信奉“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安徽黟县西递村的胡氏书香人家的实景照片，又有晚明画家沈士充的“秋林读书”图轴和以“松声清与书声和，人影瘦同石影符”立意的读书图卷，以及各种书影。尤其罕见的取自文化古城苏州民居门楼上的“四时读书乐”的砖刻摄影，弥足珍视。

需要说明的是，由我撰写的该书长序《读书之乐》，总结了中外名人成功的读书成才经验和中国读书史，实是关于《中国读书大辞典》的导读文章。去年第 12 期的《新华文摘》和《博览群书》先期披载后，备受注意。但我力图在序文中凝炼概括出中国传统读书精神的尝试，却是功亏一篑了。尚有待学界的继续探讨。“槛边花外尽重湖，到处杯觞兴不孤。安得家家寻画手，溪堂遍写读书图！”（清朱彝尊诗）前人对于将世俗社会建成一个书香世界、一个人人以读书为乐的美好精神家园，是充满着无限憧憬和希冀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弘扬传统书香精神，开启时代读书风尚”，我们盼望着我们文明古国的传人都能遍沐书香，来建设好自己努力为之奋斗的这个跨世纪的时代，为中国读书史谱写新篇章！

我写《文化古城旧事》

邓云乡

《文化古城旧事》按出版页所印日期，出版整整一年了。我收到样书，略晚一些，也已八九个月。早就该写篇文章，谈谈出书的感想，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写的书，出版后，自己的感觉是最确实的，因为书中有我，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感情……一切都是自己的。那么别人的呢？就是把自己这些通过书奉献给读者看。我的感觉是确实的、有限的，而读者反过来的感觉却是多样的、无限的，有各种各样感受，有各种各样意见，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比方说书名罢：我虽然在第一篇中对这一书名的特定涵义，作了明确的说明。而有的师友们还感到不够确切。比如九十多岁高龄的施蛰存老先生就说：可以叫作‘文化古城’的地方太多，只看书名，岂不让人家闹不清。但我还坚持原名，为此特向施老夫子作了解释，夫子也莞尔而笑了。

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当时被叫作“北平”的北京，文化气氛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是叫人永远留恋的。施老当时长期生活在上海，对此没有深切的感受，而我却是30年代前期到北京，住在一个文化气氛极浓的大院子里，邻居中有好几家外国太太，有好几位教授，自己的表哥又在清华上学。我一个山乡里的孩子，突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感受之强烈，印象之深刻，真是难以形容，远远超过一直生长在北京，一直生长在这一环境中的人们。可是好景不长，在我到北京两年不到，“七·七事变”便发生了，日寇侵略，北京成了沦陷区，就是漫长的苟且偷生的岁月……那种文化气氛，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思念中，一去而不复返了。1980年初，有机会写回忆燕京旧事的短文，这样我多年藏于心中的旧景旧情、旧人旧事，就奔泻而出了。现在我回想，如果我不是很早地离开北京，客居在上海，“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没有这样真挚的思旧之情。正因为长期离开了北京，所以想到的也就更多更细。但是短文写得再多，也都如断线散珠，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连续起来，这样我便想把它较系统地写成书了。《文化古城旧事》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我感到：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依靠的是教育；而教育的表现，首先表现在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上，这个水平包括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以及各种能工巧匠、行家里手。简单说：人嘛，总得多少会点什么。中国在20世纪，背着一个沉重的几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包袱，又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强烈冲击，必须很快接受过来，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及师徒传授，诸般技艺……这些在三十年代的文化古城，是中西新旧结合的比较好的时期。我这本书中，就是想把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的具体情况，气氛感受，留下一个历史的梦痕，文字的记录，使读者从书中感觉到一点当时文化古城的气息。也只是一点野人献曝的痴心吧，我想这对未来文化发展，不是没有意义的。

世界上很难有尽善尽美的东西，何况我这样浅陋的书，浅薄的人。每写完一篇文字，写成一本书，刊登出来，出版后，总是感到非常遗憾，就是许多该写的没有写到。就说这本书吧，在“后记”中我已说过，周志辅先生的“几里居戏曲丛书”没有写进去，就十分可惜。近年又读台北远流出版社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有很多当时的珍贵资料，可惜我写此书时，都没

有看到，要能够引进来多好……值得感谢的是，书出版后，国内外师友来信很多，都为此书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及补充资料，如有再版机会，希望能够作新的补充。想说的话很多，限于报刊篇幅，只能说这样一点点，作为本人向广大读者衷心的感谢吧。

略谈拙作《屈原辞研究》

金开诚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其中收有拙作《屈原辞研究》。新书到手校阅一遍，忽然想到我涉猎楚辞不觉已 30 多年了，可是这方面的研究却始终未有宏图大志，只是想把它读得比较通一点而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原来，我虽从小就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感兴趣，却不喜欢楚辞，只觉它的内容杂乱重复，说来说去都是那些话，因此专家们把它说得越高，我便越是疑心这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感受。

然而好像是命运故意作弄人，在 1959 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却不得不去研究自己所不喜欢的楚辞，当时无可选择，就只能硬着头皮去干。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必须去读所有的楚辞注本，开始读了几本并未改变我的观念。这些注本虽然对楚辞的每一句都作了解释，然而却未能较为清晰地揭示各篇的脉络与肌理，不能使人得到整体的理解。因此读完每一个注本仍感到楚辞（特别是代表作《离骚》）是句段重复、结构杂乱的。然而却又有古人强调“《离骚》之所以妙者，在乱辞无绪”，这样解决问题虽然干脆，但却并不能使我感到乱了究竟有什么好。

直到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读了许多的注本，我才对楚辞中的一些篇章有了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读通”之感，从而认定《离骚》、《九歌》、《天问》等篇原来都是严密有序的，一点也不杂乱重复；由此便感觉到《九歌》至美，《离骚》至深，而《天问》则是真正的奇文。这就使我更加深信“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确是至理名言。

由此，我对楚辞的研究便主要是追求“读通”。这其实是研究名著的初级阶段，然而却断断续续经历了三十多年，才得到一个自以为“读通”的结果，这结果就集中表现在《屈原辞研究》这部书里。

应该指出，在我自以为“读通”的过程中，曾深受系统论的教益。因此在屈原辞各篇及屈原生平的考释中，都或明或暗地用了系统方法。不过，我对系统论只是取其能为我所用，或者说被我消化吸收了的一些成份。要是全盘照搬与套用，我不但无力做到，而且甚至认为做到了反而是削足适履。但就为我所用的这些系统论成份而言，则的确在我“读通”的过程中起了大作用。由此我感到，不论是做学问与干事情，有一点系统思想是有好处的。

希望这本书能给楚辞的读者与研究者一点实惠。或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有了这本书就好比借到一套简易的住房，不妨暂且住下；然后通过 对楚辞的深入研究，再对现有的这套住房进行修理、改装，乃至拆了重建。

我编《鲁迅名作鉴赏辞典》

王景山

我主编的《鲁迅名作鉴赏辞典》（中国和平版）虽名“辞典”，其实只是一个选本，选了鲁迅各体文及旧体诗一百九十几篇（首），并约请了八十多位执笔者撰写各篇（首）的鉴赏文章，如此而已。为什么非称“辞典”不可呢？据出版社说，是约定俗成，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也已众所周知。那么，我也就不再解释。

编选这本书，我给自己定下的总的宗旨是：弘扬鲁迅“立人”为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宣传鲁迅“直面现实”、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向广大的一般读者普及鲁迅著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还须等待读者诸公的批评指正。但落实到选入哪些篇时，我却深感不安了，而约请哪些执笔人，也使我颇感不易。

从二、三十年代到现在，各式各样的鲁迅作品选，也许不下数百种了吧！据此似乎还可断定，做选家并不难。可是，鲁迅自己对选家、选本，却一向多有微词，甚至认为选者大抵眼光如豆，选本往往因此缩小了读者的眼界，以至竟然抹杀了作者的真相。

我当然自知不是目光如炬者。但我又觉得，新编一种选本，总应有些自己的特点。否则，何必新编。我这次编选的，大致是以鲁迅关于思想革命和社会批评的文学为主，兼及其他。我以为，今天的一般读者，当然应能从鲁迅作品中得知清政府的腐败，了解北洋政府的凶狠，看到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如还能弄清林琴南、章士钊为谁，“叭儿狗”、“乏走狗”、“洋场恶少”、“四条汉子”何指，当然也有意思，但对照一下鲁迅笔下揭出的病苦，特别是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以至所谓“国民性”中的某些弱点、缺陷，看看是否已经受到注意了，是否已经得到疗救了，我是以为也许更有益于我们一贯强调的建设精神文明、提高人民素质的。但愿我的这些看法，以及据此选编的鲁迅作品，不致抹杀了鲁迅的真相，或缩小了读者的眼界。

至于鉴赏文的执笔者，我老实承认都是我熟悉的前辈和友人。但我又敢说一句，阵容可观。我约请的八十余位中，现为鲁迅研究学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者，大概就有一半左右。而我请臧克家同志分析《自题小像》，请王士菁同志分析《摩罗诗力说》，请严家炎同志分析《狂人日记》，请杨义同志分析《药》，请王富仁同志分析《风波》，请邵伯周同志分析《阿Q正传》，请彭定安同志分析《长明灯》，请乐黛云同志分析《孤独者》，请孙玉石同志分析《影的告别》，请王蒙同志分析《雪》，请陈漱渝同志分析《纪念刘和珍君》，请丁景唐同志分析《白莽作孩儿塔序》，恐怕谁都会承认可算最佳人选。

由于我对鉴赏文的要求，只提出希望兼具辅导阅读和引导鉴赏的作用，以便读者能据以明重点，解难点，知特点，因此一百九十余篇多由名家执笔的鉴赏文，在内容探讨上，在艺术分析上，在鉴赏文的写法、风格上，就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不少文章新意迭出，或独具慧眼，或别具匠心，虽不一定形成共识，但足为一家之言。

鲁迅其人、其文，值得学习的地方多矣，我只依据我的了解，提供了几个侧面。选择是否恰当，完全由我个人负责。但去年一月受命，三月定稿，

九月出书，却是要感谢众位师友的大力支持，感谢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伏琥同志的全力以赴的，而有几位同志如林非、袁良骏未能为我执笔，有几篇重要篇什，如《“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未得收入，则又是我深感遗憾的。

近百年史的缩影——写在《溥杰自传》出版之后

叶祖孚

《溥杰自传》（中国文史版）出版已经两个月了，有的读者写信问我：怎样简单概括这本书的内容？我回答：可以说这本书是近百年史的缩影。一叶知秋。从溥杰先生身上看出近百年史的沧桑变幻，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不是么？你翻着书，仿佛听见清王朝大厦倾塌轰隆的巨响，又像听见北洋军阀混战的枪炮声，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长驱直入，中国人民呻吟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党的改造战犯政策以及统一战线政策像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溥杰的心灵，他心悦诚服地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度过了他的晚年。最终，通过近百年史的总结，人们会感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从一个人身上看出中国从屈辱走向胜利的过程，这就是历史。

尽管溥杰老人去世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仿佛仍和他在护国寺家小院里亲切地商谈着《自传》写作的内容。我和他有时在南屋会客室里促膝谈心，有时在北屋书房里看他挥毫写字，有时我俩就在小院的甬道上缓缓散步。他告诉我：“写短一点，我家已经有一本《我的前半生》，凡是里边写过的就不要再写了。”他极端尊重溥仪大哥，这两个同是清皇室遗留下的难兄难弟，又同时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尔后又几乎同时获得新生，成为新中国里有特殊贡献的公民。正因为他俩都是从旧中国人生道路上艰难地走过来的，他深知其中甘苦，因此他对有些书嘲笑讽刺溥仪先生的写法是非常不满的。他推崇《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决不愿意让《自传》在篇幅上超过它。他再三告诫我，凡是在《我的前半生》中写过的就不再着重写了。

“不能有水分呀！”他摇着头郑重地对我说。他非常不满有些写他的书里充满了“水分”。尽管他和来访者合影留念，也为写他的书题签书名，但当他事后读这些书时，不禁跌足失声说：“上当了！”因为他根本不同意书里那些虚构的内容。他认为当前回忆录中一大弊病就是“水分”太多，走了样。他本人就是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专门从事“存真求实”的工作，他决不同意往回忆录里掺假。他认真核实了我写的《自传》的初稿，然后用人们熟悉的笔体亲自一字字地作了修改。记得他在协和医院里养病时，已经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滑来滑去好几个回合又渐趋稳定时，他想起最后一段稿件未经亲自过目，尽管写法和内容都是他同意的。他向秘书提出要审阅这一部分稿件。秘书通知了我，我和医生商量，患这样重病的人怎么能审阅稿件呢？我对溥老说：“您放心，这里没有水分，都是按照您的意见写的。”他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并向我说：“真感谢您。”

在溥老的书房里看他写字并聊天真是一种享受。他说话向来简短扼要，但有时忽然冒出几句警句，就启发了我的写作思路。有时他让你看他的相册，有时他让你看他的剪贴本，这些剪贴本 he 都用毛笔写上了《雪泥鸿爪》、《雨过蜗痕》、《槎影留痕》等富有诗意的名字，你读着世界各地记者为他写的专访，你就得到了启发。尤其是他接受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外国记者访问时，记者提问题稀奇古怪，他回答得也巧妙得体，这些我都集纳到了《自传》中。看得出写《自传》是他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嵯峨浩夫人已经病故六年了。他的卧室里放着浩夫人和女儿慧生的骨灰罐。夜晚，客人们都已散去，

夜阑人静，他寂寞地躺在卧室里想些什么呢？他想着 30 年代和浩夫人在稻毛海滨散步，迎着惊涛拍岸的海浪，交谈着一天的生活；他想着在伪满皇宫分散后，他成了阶下囚，浩夫人则携幼领孺，流浪着回到了日本；他更想着恩人周恩来费尽心机地帮助他夫妻团圆，周总理还把浩比作苦守寒窑 18 年的王宝钏……

“您快些写吧！”他拉着我的手说，眼光里充满着仁慈和渴望。我知道他急于要把这些告诉人们。但是当我写成初稿并付印出书后，溥杰先生已经缠绵病榻一年多处在弥留之际了。我拿着第一本书跑到他的病榻旁告诉他：

“溥老，您的书出版了，您放心吧！”

他已经不能告诉我什么，他合上眼，显得很安详。我却流了泪。三天以后，1994 年 2 月 28 日，还是严冬的气象，溥杰像一片久经风霜的枯叶飘落到地下，离开了人间。但是他把他的《自传》留给了人们，让人们从这近百年史的缩影中吸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是怎样写《历代宫词纪事》的

丘良任

当我们踏进故宫乾清门的时候，看到金碧辉煌，宫殿馆所，总以为这里是世界的乐园，人间的仙境，却不知这是一座最大的监狱，罪恶的渊藪。千百万女子就是在这里幽闭一生，过着耻辱、悲惨的生活的。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专制政体。帝王号令天下，深居宫中。后宫佳丽，何止三千，都是供一人享乐的。宫廷号称禁垣，内中的事，正史是很少记载的；野史笔记，偶有记述，也只是零星琐细。宫词是一种特殊诗体，专记宫闱之事，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历代帝王的宫廷生活，千百万宫嫔的悲惨命运。宫词是这禁锢得十分严密的牢狱打开的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视其中的污垢，了解其中的黑暗、残酷、淫秽、悲惨，种种意想不到的、骇人听闻的丑事、奇闻、阴谋、毒计，为千千万万女子吐一口气，喊一声冤。这就使我们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更加痛恨，鉴往知来，才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怎样黑暗的深渊走出来的。

唐·王建《宫词》，联章百首，号称宫词之祖。后人效之，所作甚多。清·史梦兰《全史宫词》达二千首。十余年来，我从事汇集、研究，所获已在万首以上。经过选录，参稽史乘，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编撰成书。由轩辕嫫祖直到溥仪后妃，反映了历代宫廷里的各种矛盾，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题名为《历代宫词纪事》。

宫词虽以纪事为主，却有其特殊的修辞方式。一般是清新婉丽，含蓄蕴藉。王建《宫词》云：“官人早起笑相呼，不识阶前扫地夫。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还似此间无？”宫女们幽闭宫中，是连一个真正男人都见不着的。早起看到一个扫地夫，大惊小怪，呼唤同伴来看。“官人早起笑相呼”，这笑声里蕴含着多少泪水啊！花蕊夫人《宫词》云：“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阁夜宴时。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这圣人是指蜀主。当与宫女们调情逗乐的时候，早把皇帝的尊严的外衣脱得一干二净了。吴士鉴《清宫词》云：“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扶床一见雏孙拜，定省仪鸾仅及晨。”这是记慈禧立溥仪为帝事。“临朝三度抱冲人”，七个字概括了慈禧的一生。一个“抱”字，其挟持幼主，弄权误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了。

历代宫词，已有佚失，但各种刊本、纂集本，以及散见于丛书、别集中的仍有不少。这是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从速加以整理，编成完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智慧之海中的一勺精华——《中华智慧集粹丛书》编辑缘起

郑一奇

近年来关于智谋、谋略的书出得不少，但多为中国古代兵家所言，主要是军事对敌斗争的经验总结，有些内容如“诡道”，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适用。和智谋、谋略层次不同的是智慧，智慧是人类认识事物和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切从先天获得、后天培养的悟性、技能、才思都可归结为智慧。人，正因具有智慧和对智慧的不懈追求，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1992年我们在编辑《中华文化集粹丛书》时，和一些作者讨论过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源远流长、独树一帜，有丰厚的积淀，而古今中外的智慧又有不少相通之处。比如叶嘉莹教授就和我谈过：中华文化中许多古老智慧的结晶，现在看并不过时，有些或暗合、或相通于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一些新论，受到西方智者的珍视。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在做人的准则上，中国的不少古训，受到了西方智者的重视。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写进了法国宪法，还成为联合国一些机构的训旨。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在总结成功之道时，写了一本《论语与算盘》的书，认为《论语》不仅可以治天下，也可以指导企业管理。里根在纪念孔子的演说中指出：孔子的学说揭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为人处世原则。其他如文艺理论、军事学说，西方人立论时也往往从中国古代智慧中找到根据，比如国外的核战略理论家就从《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战也”中得到了启示。这种文化相通的情况并不奇怪，因为正如罗素所说：“智慧在于掌握万物所共有的基本准则。”智慧本来就是规律的洞察和把握，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反映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它受到今日世界上一些智者的珍视就是很自然的了。在讨论中有的学者建议我们在出版《中华文化集粹丛书》之后，再出一套有关中华智慧的书，以对这份遗产更好地总结和继承。

1994年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一起策划，约请著名学者、研究人员吴慧、吴如嵩、蔡景峰、阚道隆、钱世明、黄新亚、赵秀玲等，分别撰写了一套8册的《中华智慧集粹丛书》。这套书按专题对中国古代某一方面的智慧作出比较系统的总结，并尽可能作中外比较研究；立足现代生活，对古代智慧中对今天仍有价值的作出阐扬；写得明白流畅，深入浅出。现在看各位作者写得各有特色：《思辨智慧》通过剖析八卦、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太极以及诸子、释、道、儒诸家，阐释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融合的中国传统思辨特色。作者从个案研究入手，上升到一般性概括，并要求自己对古人学说先弄明白，再或取或弃，力图不曲解古人，多有独到见解。《人生智慧》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剖析，上中下三篇，先论背景，继论源泉，后论具体的人生智慧，是从一般到个别的写法。《处世智慧》从修己、待人、处世三方面总结，系统、全面、完整。《资政智慧》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其警世作用不言自明。《富国智慧》、《经商智慧》学识丰厚，较多地作了古今中外比较，通古说今。《制胜智慧》论题高度概括又抓住要害，论述贯通古今中外。《养生智慧》为医家真言，确有参考价值。

当然，这8本书不可能包容整个中国古代智慧。但却可以从智慧之海中捧出一勺精华，让你领略中华智慧之精妙！刘志琴所写长序《历史出智慧》是一篇才华横溢的美文，值得细读。中国人的智慧是举世公认的，让我们多

学一点通达的大智慧，少玩弄一点近似诡道的小聪明，这样是否就会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少些失误、多点成功呢？

我是怎样研究行帮史的

曹保明

大约 20 年前，我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调往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职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我进山和下乡去找那些上年纪的老人搜集民俗和故事时我惊奇地发现，讲述人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往往对自己当年从事的行业滔滔不绝地进行叙述，听者又不能打断对方的讲话。而他们描述自己干什么行业那一段段经历，往往又十分的精彩，特别是对北方地域那些行业的描述，往往产生出许多我们所采访的故事本身所要获得而又获得不到的价值，如人类的经济活动规律；语言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表达方式；特殊生活的秘密角落；特别是一些“行业”故事又是民间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于是我想，能否把这些“文化”归结在一起，写一部中国东北行帮文化方面的书呢。

具体工作并不费劲，因为对这种资料的记载太丰富了，但一动笔又感到有许多困难，主要是行业文化不单具有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而且还包含着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知识，而要了解一些行业，如淘金、放排、狩猎、伐木、挖参、马贼、乞丐、妓女等特殊行业，就必须接触这些具体从事此行业活动的人，而这些行业又由于属于特殊的或神秘的地域性行业，许多当事人都已不存在，便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艰难，但同时又增加了我要把这项工作搞完的决心和兴趣。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几乎把精力都集中到这项选题上来了。无论是星期天或节假日，我都不在家过，就是中国民间的传统“团圆”节日——八月十五，我都不在家过，而是告别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一个人背上月饼，到乡下的敬老院或大车店，去和那些孤寡老人一道生活，听他（她）们讲述从前特殊行业的稀奇古怪的故事。

为了采访淘金的故事，我在辉南县香炉碗子金矿差点让矿烟熏死，经过矿工们抢救得以生还；为了采访木帮的故事，我从长白山里的鸭绿江放排，在“门坎子哨”一下子掉进江中，被木帮们打捞才生还。许多事我都不对妻子和儿子讲，怕家里惦记。更有多少个昼夜，我同“土匪”、“马贼”一起生活，于是积累了大量的“东北行帮”的丰富资料，先后出版了《东北土匪习俗》、《土匪》、《响马驼龙》等专著。许多书籍中把我誉为“研究马贼”的专家。我不是什么专家，但我手头已掌握了近三千股中国土匪和马贼的名录，亲自采访了许多活着的马贼和他们的亲友，并掌握了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位活着的“马贼”小白龙的情况。接着我于 1992 年推出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 35 万字的《中国东北行帮》。

此书出版以来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重视，美国旧金山华埠图书馆和韩国中央图书馆都已经收藏；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已将此书列为“科目教材”；台湾祺龄出版社已将其中“马贼帮”部分变成《东北马贼史》，于 1994 年 8 月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吉林省政府最高奖第四届长白山文艺奖评委会于 1994 年已将此书评为“优秀”作品奖。

“全球意识”断想——《我们的未来与人类的世界化》创作思路

石中元

(一)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一个个封闭的国度里生活，民族的区域、国家的疆界将人类生存生活空间分割开来。如今，我们生活在宇航、遥感时代，生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在探索宇宙天体的同时，终于把地球看成了一个整体！把人类看成了一个整体！是的，人类的发展史就是百家同源、殊途同归。万众皆一民，天人皆一体，地球乃一村。

(二)

现代的信息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卫星通信使我们在数小时、几秒钟就能知道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一场足球比赛、一艘油轮触礁、一次劫机事件，都会引起地球公民的关注。电子网络通信把个人、地区、国家乃至七大洲、四大洋联结成一个整体。

今天，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不只是相互发生影响，而且是相依为命，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个地球已不再被看成是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合体，相反，它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形成的一个系统——一个世界系统。系统的实质是整体。

地球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国家和地区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

农业社会人们习惯于过去，工业社会注重现在，而信息社会则面向未来。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即全球意识正在形成。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胸怀全球，放眼宇宙；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整体系统，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立场来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

(三)

“人与天地相应，人与草木同归”，这是中国先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层领悟。可是在现代文明到来之际，人们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态破坏、环境恶化使得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有限好处不足以弥补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牺牲优美环境，换来经济增长——此路不通！为此，人们开始注重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全面发展，寻找一条使经济、社会能够协调持续发展之路。

在这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的年代，人类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足”。天文、地质、生命运动是综合效应运动，将它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人类必将受到惩罚！将太空天体系统、地球生物系统、地表人类社会系统进行综合考察，方能为人类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好办法。

(四)

环保监测人员早就告知：城市空气污染源主要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而汽车一天比一天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冰箱、空调等电器所产生的氟里昂破坏臭氧层，危害人类，人们不但照样生产，还嫌开门太小，多用功能、品类齐全的则日见其多……难道说，上述行为是“愚昧无知”吗？自私自利永远是一种缺德行为，它危害社会、祸及子孙。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要注重道德建设。在环境问题上，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小平同志的这一告诫。

（五）

每当我关起门来面对一摞摞书报杂志时，真有坐拥书城、富甲天下之自豪。一杯清茶，数张稿纸，半墙书架，在寂寞中我享受到了读书的安详和写作的幸福。上述的“全球意识”之断想，很自然地 from 脑海中涌现出来，最后汇聚成了《我们的未来与人类的世界化——话说全球意识》一书。我愿把此书化为一瓣心香，献给关注生态环境、热爱我们家园的读者。

漫谈拙著《燕水古今谈》

段天顺

《燕水古今谈》这本小册子，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说起来话长。1971年冬，我从农村下放回京，不久即分配到疏挖温榆河的指挥部工作，从此便和水利结了缘，先后在水利战线干了十几个春秋。这期间，我跑遍了北京的山山水水，其中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我发现，在水利建设上，某个水利工程收益小浪费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本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缺乏全面、历史的考察。只讲现实的需要，不了解历史的演变，故而采取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工程技术措施。基于这种认识，我结合主持《北京水利志》的编修工作，开始了对水利史的学习和研究。我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治水历史的国家中，先人们留下了很高明的治水理论，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漫步其中，就像是走进一座绚丽多彩的大花园。而开采这座丰富的宝藏，对指导现实的水利建设实在太重要了。

当然，由于工作繁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不过，结合实际需要来学，也满有兴味。比如，经研究发现，流经北京的永定河，历史上有“小黄河”之称，是条多泥沙的害水，多次侵扰北京。为了防治永定河的水患，我翻阅了大量史料和现代治水资料，对上下游作了实地考察，与有治水经验的水利专家一起，对永定河流域的地形地貌，水流特点，历史洪水与北京城址转移的关系，几次大洪水的分析，以及历代治理和近期规划等做了系统整理，写出论文《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和防治》，在1983年北京史研究会年会上做了专题发言，对加强北京市的防洪工作起到了借鉴作用。又如，前几年，为贯彻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工作的四项指示精神，我阅读了金、元、明、清各代有关北京城市水利的史料，围绕进一步搞好水利为城市生活和美化环境服务，写出了一批有关城市水利的文章，借以宣传水利对城市建设的作用，开扩广大水利职工的视野。根据北京水资源短缺这一事实，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我运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写出了《从历史上看北京地区水稻生产与水资源的制约关系》。我还以散文、诗歌、随笔等形式，讴歌了北京市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对近年来在水利史方面讨论的一些问题，还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对北京地区在治水事业上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作了简要的介绍。

我没有就历史写历史，而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以历史为借鉴，使历史为现实服务。就这样，日积月累，竟然写出二十几万字的文章小品，并结集成册。谨以此献给曾一起战斗过的水利战线的同志和朋友们。

我写《清朝的状元》前后

宋元强

漫长的中国古代，出现过几种选拔人才的典制。自隋至清，科举取士之法绵延实行了一千余年，时间之长，影响之巨，亘古未有。近人在审视这项制度时，较多的是指责它对贫家子弟的排斥，讥刺登进之人不识兵刑钱谷为何事。说到从这套制度中脱颖而出的状元，往往有人持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靠科场侥幸才博得功名，有虚荣而无实学。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记得在 60 年代，我还读研究生的时候，从史料中见到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时就萌发了一个愿望：要对中国的传统教育遗产及历代考选制度，作些新的钻研和阐扬，力求取得更为公正的认识和评估。由于十年浩劫，计划遂搁置下来。近些年来，我在工作中愈发感到：总结历史遗产，弘扬祖国文化，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壮丽事业。中国有几千年的教育传统，历代掌权者都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这当中，既有时代的局限与种种弊端，也有普遍性价值和宝贵经验，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眼光去审断。

“状元”一词，作为一个吉祥的字眼，透露着一种公平竞争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一直流传和使用到今天。我便以这个题目为契机，并决定从研究清朝的状元入手。

《清朝的状元》一书，搜集了清代 114 名廷试首冠之士的历史资料，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自幼刻苦努力，在科场中一步步竞奔，最后才脱颖而出的；也可以看出，在他们成才与登进仕版以后，在德行、政事、学术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实际表现与作用。由此，能对传统儒家教育与科举取士制度的重要方面，获得些较有说服力的认识。

科举时代，元魁鼎甲极难获中，仕宦人家子弟拥有种种有利条件，在角逐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但普通士人与其他家庭出身的人，由于才智卓绝和勤勉超人，在清代状元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笔者查考了 57 名状元的家世出身，他们中出身于“官等级”的占 51%，出身于“民等级”的占 49%。如王杰、姚文田、洪钧、张謇、刘春霖等都是出身寒门而卓然举首的典型。可见，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是科举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古代儒士阶层内部有不同的流品，但总的来说，由于儒家长期“尊德性、道问学”的教育，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其中相当一批人能体察民情、重视名节、博学多识、干练通达，将这些人源源补充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自然有裨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历代掌权者都把“得士者昌”作为重要信条。清代状元中官至内阁大学士，即所谓“状元宰相”，共有 14 人；简充军机大臣者，有 7 人；任总督、巡抚者，有 9 人。这当中，如徐元文、毕沅、王杰、潘世恩、翁同龢、孙家鼐等人，都是清代名臣。还有如彭定求、钱维城、金榜、吴其濬、陈沆、刘春霖等人，则在经史著述、诗词书画等方面，很有造诣和成就。

不过，状元虽为当时人所艳羨，并非每人都有一番作为。笔者统计了 15 种重要史籍，只有半数状元的传记可以查到，说明另外半数人的业绩不显。另外，清代状元的平均寿命是 63 岁，而平均夺魁年龄是 35 岁，是比较高的。原因之一是为掌握科场文字要长期地呕心沥血。他们往往从十二三岁起就开始学习时文，为弋取功名耗用了许多宝贵年华，着实令人扼腕太息。所以清

朝许多有识之士虽不反对科举取士之法，但是抨击这种考试的内容。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清朝的状元》一书凡五易寒暑而成，仅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遗产及考选制度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估，并为今天的人才选拔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写《李煜传》

田居俭

传记写作的起码要求，就是在作品中尽量将传主写得血肉丰满、情感充沛、性格鲜明。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要求呢？我在写作《李煜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深切体会之一是：首先要让传主李煜在著者心目中复活。这就要求著者必须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性追求精神，用全面的辩证眼光，对李煜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要想方设法倒越时空去接近李煜，熟悉他的气质、性格、思想、品德、抱负和作为，同他“心有灵犀”：小到他对琴棋书画的情趣爱好，大至他受苦乐生死的严峻考验。

知人固然重要，论世亦不可小视。为了真正熟悉李煜，还要从时代氛围、民族意识、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去探索李煜的人性和人情，其中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和才情，尤其要注意发现李煜一生中易于为人忽视而又确实存在的闪光点，如此，才能使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但是，这种阐释要少而精，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宜，还要坚持“寓论断于序事”，使二者相辅相成，相融相谐。只有这样，才能鞭辟入里地剖析李煜祸福伏倚的人生：恰恰是国破家亡的陵谷之变，以及“薄命君王”的悲惨遭遇，玉成了他彪炳史册的“绝代才人”勋业，使他得以创作出一批融血凝泪、直面人生、视野开阔、警悟深邃的绝妙好词。

精确、透辟释读李煜的词，又是恰如其分地把握李煜的情感脉搏和生命轨迹的关键。因为李煜的每一首词，都是特定环境中的真情实感的流露，所以，为李煜作传就必须特别重视他的词，把它视为至关重要的史料。我认为，以李煜的词入李煜的传，更容易恢复李煜的本来面目，也更有助于对李煜词的定位。拙著对李煜词的理解和引用，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诚然，自古以来人们就认同：“诗无达诂。”对于同一首诗或词，特别是其中蕴含的美学情趣，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诠释。我对李煜词的定位和诠释，还只是一种尝试，但我相信这是言之成理，聊备一说的。我敢于有这一点儿自信，原因就在于我对李煜其人其词进行过多年研究。

我的深切体会之二是，要将李煜写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固然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确凿、翔实的史料。但是，只凭既有史籍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对历史的想象和感知，激活有关李煜的史料，为这些史料注入灵魂。因为历史是慷慨的，又是吝啬的。它一方面创造了帝王词人李煜，为他在历史舞台上进行充分表演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因地老天荒，岁月流逝，有关李煜生活的遗址遗迹大都杳不可寻，当年许多精彩生动的情景，如今只剩下若干模糊湮漫的断简残编，甚至形成某些断裂和空白。而要弥补这些缺憾，就必须对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人物心理和语言对话等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

史学家兼词学家缪 在《杜牧传》后记中指出：“传记是属于历史性质的书，却又要要有文学的情趣。因为是历史，所以要求无征不信，而完全据事直书，容易失于质补，需要相当的驰骋想象，但是又不允许虚构，传记毕竟不同于历史小说。这个分寸也颇不易掌握。”

我认为，传记写作就应该科学地、辩证地掌握好“这个分寸”。作为史

书的传记，无疑要真实可信，不准任意虚构，应当事有出处，语有来历，如有一个重要细节失真，都要影响全书的价值。但是，真实的内容尚需辅之以迷人的文采，如此才能吸引读者渐入佳境；否则，传记就会陷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窘境。简言之，以史笔为史，以文心写史，传记才能以其文献性、艺术性和跨学科性而独具魅力。假如不具备文献性，传记便会失真；假如不具备艺术性，传记又会失神；而跨学科性则是使传记达到真神兼备、全面完整境界的根本保证。

良史工文，文华而不失真，这是以司马迁撰《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记写作的优秀传统。在拙著写作过程中，我时刻都在绞尽脑汁继承这个传统，奈何才疏学浅，事倍功半，未能如愿。聊以自慰的是，我毕竟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假如拙著能收到“法乎其上，仅得其中”的效果，那对我便是莫大的激励。我将会满怀信心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商贾文学与管理艺术

邱少雄

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中国商贾文学，心里有一种踏实感。因为我认定这种研究在中国有特殊的文化价值。

我们回头看一看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它的经济、文化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长处，也有弱点。“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一条根本性的经济政策，“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条具有原则意义的价值取向。经济政策与文化精神在“抑商”、“轻利”上发生谐振共鸣，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人们常说：“儒道互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各有特色，互相补充。但是在义利观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释、道三家却是惊人的一致；儒家从“重义”出发，宣扬“轻利”；道家主张体道寡欲；佛家倡导无欲、去欲，以欲念为万恶之源，不可能互相补充。这种义利理欲观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很明显的，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大弊端，即要求人们不要追求物质财富，因而也就不要创造、不要进取。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商贾文化显示出自己特殊的价值。它大胆地与儒、释、道三家唱对台戏，宣扬在“好义”之外，“好财”也是一个人正当合理的要求。儒商互补，才能义和理欲并重。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补充，可以修正中国人偏执义理一端的人格缺陷，可以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化。

这种研究与当今社会联系得很紧。从当今世界形势的发展来看，我们中华民族既面临着发展机遇，也面对着生存挑战。一方面我们必须发展经济，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不断地提高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它要求中国人既讲利欲，又讲义理，偏执任何一端，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平衡、失去活力；偏执任何一端，中国人也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要做到理欲并重，需要儒商互补。由此可见，我国的文化重心正在或将要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目前加强对有中国特色的商贾文化的研究既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又有日趋明显的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商贾文学，我主要是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的。中国商贾小说多见于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之作不同于正统文人的“道德文章”，它们以平等、欣赏的态度对商贾生活作了大量客观的描写。在这些描写中，不乏对中国商贾生意经验的形象总结。从中国商贾小说这个角度来挖掘和整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商管理艺术，既是前人没有系统做过的工作，也是一项“报酬”很丰厚的劳动，因为在正统文人习惯于“耻言商耻言利”的传统中国，这些民间的白话小说是保存有中国特色的经商管理艺术的“富矿区”。中国经济出版社的毛增余先生和我素昧平生，但我们所见略同。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商贾小说与经商管理艺术系列丛书》得以顺利问世。丛书共四十多万字，分为《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三言”、“二拍”与经商管理艺术》、《明清商贾小说与经商管理艺术》、《近代商贾小说与经商管理艺术》四种。表现在商贾小说中的经商管理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经济生活，在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不无借鉴意义。

我的集邮著述

刘肇宁

我是从 1955 年 6 月起开始在邮刊上发表集邮著作的，至今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停笔，包括十年动乱期间，虽然没有地方发表集邮文章，然而我还是以集邮写作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写完了自己读，看完后收起来，并不指望发表，仅仅把集邮写作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集邮活动的春天。1981 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首先出版了我写的《中国邮票史话》一书，限于当时思想尚未完全放开和客观环境，该书对不少邮票都加以回避，如“大元帅”、“统一”、“就职”等一系列邮票都不敢提，当然日伪政权和伪满洲国邮票就更不沾边了。今天看起来是本缺胳膊少腿的书，大概这就叫“历史的局限性”吧！

最近这 20 年，我更是不停地在写。虽然写作水平不算高，可是不愿意停笔，再加上各地邮刊风起云涌般地出现，纷纷向我约稿，就更加无法停笔了。至今粗略地统计一下，我已发表 200 万字左右的集邮文章，发表的地方，除了有中央及各省级邮刊报纸外，还有香港、台湾、新加坡及日本等地的报刊。

我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党员。1989 年，民革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集邮文章辑录《邮苑散记》，该书收录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60 篇。1992 年 10 月，科普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集邮文章辑录《邮坛纪事》，收录了 80 余篇文章。该书在 '96 北京第九届亚洲邮展上获镀银奖。1996 年 3 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第三本集邮文章辑录《邮海漫谈》，收录了 100 余篇文章。我的第四本集邮文章辑录《邮林逸话》，收录了 100 余篇文章，正在接洽出版。上述四本书只能称是我的集邮文章“辑录”，而不是“集邮文选”。因为它仅是把我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上的集邮著作集合起来而已，不成系统，甚至在两本书中间还包括同一篇文章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奇怪现象。

今后如有可能，我准备把自己 40 余年来发表的集邮文章和几本集邮著作仔细编选一下。第一卷为“清代卷”，将已发表的有关清代海关邮政时期和清代国家邮政时期邮票研究著作整理出来，将是一种具有研究性、史料性及知识性的著作；第二卷将《中国邮票史话》与《中国解放区邮票史》两书合并，配齐图，将是一部普及型的邮票读物；第三卷将是一本集邮知识书籍，将收录已出版 10 余年的《集邮知识》和《简明集邮知识手册》两书主要部分，再加上近年发表的新的集邮知识、邮苑人物、邮票辨伪、集邮书刊等，是一部集邮入门的读物。

集邮写作的领域非常广阔，只有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个一个地去攻破，才能收到一些成果。

雪夜品书香——夜读漫笔

扉页记语

张中行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现代文学的两位研究生，一年前从我这里借去我的老同学南星的几种著作，其中有诗集，有散文集，不久前送还。向我借，不向作者借，是因为作者是诗人，脱略世事，书随着世事散了；我是常人，有常情，虽然大革命的风暴中，为保命，存书割爱多半，这几本故人的心血却舍不得丢掉。且说书放回原处之前，随手翻看一本，是《松堂集》，扉页上竟有我的一大段话，是：

三十五年（案为1946）十一月四日，上课五节，也生一些闲气。下课后，与南星往天安门大狮子处照野鸡像，是为应付公事，顺路吃花生，逛书摊，看老江湖演就地十八滚，买得此书。日暮返家，接天津信，云老爷的狗将砸报馆，因报上有些杂文不规矩。莫非狗亦知文？总之，网是更密了，这才更需要读一些相忘于江湖的散文，如此书中者。我感谢南星的友情和文章。当日晚中行记。

看了有些感慨，不是为当年，是为现在，具体说是，年华如逝水，来自天命，无可奈何，但总当尽人力，求以挽救于万一，可是，既当做又能做的，如买书或得赠书，记几句话，轻而易举，我却很少做，以致有时翻看存书，本当如见故人，联想到昔日，却成为毫不相干了。

昔日生活有什么值得重温的？究极意义，我不知道。所以不问所以然，只看当然。司马迁遵老太史公司马谈之嘱，当作绝顶重要的事，写《史记》。这是记别人的；后人看，觉得有意思，也是看别人的。何况变远在天边为近在眼前，看自己的。所以应该记，越清晰越好。记在哪里？可以写在日记本上；现代化，还可以留在不动的相片甚至动的相片上。至于书呆子，就还多一个处所，是书的扉页上，因为，只要没有天灾人祸，总会有新的书陆续进来，连同旧有的陪伴，直至盖棺论定。试想，如果手勤，每一本的扉页上都有记语，偶尔翻看，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曾经做什么，曾经有什么喜怒哀乐，损之又损，能够记下买的时间也好。如手头有一本线装木版毛边纸本《百喻经》，民国三年（1914）鲁迅“施洋银六十圆”，金陵刻经处刻，扉页记有买得的因缘是：“二十七年（1938）一月三日下午买于北平丁字街佛经流通处。”现在翻看，想到它之入室来陪伴，还在半个世纪以前，虽然逝者如斯，总像是还能够抓住一点点。

此情此理推而广之，我也喜欢在存书上看到别人的记语。当然最好是与自己有关的。这一般是赠与请教或只是赠与的一句客气话，但如果能够记明时间，也就可以因时以见事，牵引来一旧事的回忆。如几年前介绍给岳麓书社印的温源宁著的《一知半解》，原英文本是故友韩文佑兄送我的，扉页上记明时间是三十一年（1945）十二月，偶一翻看，就想到六十年前他从上海回来，我去看他，在宝塔寺旁他家吃花生米喝白干的情况。与自己无关的记语，看看，有如闲逛大街看热闹，也会有些意思。以旧存清康熙八年（1669）刻《淳化阁帖释文》为例，扉页有记语两则，是：

康熙己亥（案为五十八年，1719）季秋晦前二日，鹤侪得于友益斋中。

（原无标点。下同）

乾隆丁亥（三十二年，1767）二月望日，鹤侪李文以此书见赠。且自述其购求此释文者几十年而后得，其难如此，因嘱余善藏之。其风雅可想见也。伊斋识。

看看时间，两位都是曹雪芹同时人，就不只是看热闹，而且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了。

如果这古是见经传的，如常说的男则成容若，女则太清眷，片言只字，当然就更有意思。但这总是难遇而更不可求的，只好退而求己力。我惭愧，是知之而未能行；希望其他同道和后进，鉴此情，手勤些，以求先行的书呆子为后来的书呆子在书的扉页上多留一些珍贵的财富。

陈年日记一则

金克木

忽然记起幼年有一则日记，原是文言，现凭记忆改用白话写出来。自己看看，别人看看，也许可以笑笑大约七十年前的读书人和读书。

年、月、日、晴。在外地教家馆的本家二哥回来过年了。前往问候。他问起读书，随手翻开唐诗要我念。恰好是李白的《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刚念两句，他即打断，问有什么问题和讲法。我说，本来“孟夫子”是称呼孟子（轲），这里指孟浩然。古时“夫子”是通称。“爱”不是怜爱，是“君子爱人以德”。他问：《孟子》属《四书》，何时何人编定《四书》？我答是南宋朝朱夫子（熹）。唐朝李白生得早，还怕冒犯亚圣孟子。他又问：《论语》里的“夫子”不是孔夫子吗？我答：有的不是。“相夫子”是指辅佐季孙氏。到前清就多半指先圣孔夫子了。马二先生说，“就是夫子在而今”，只是指孔圣人。他立刻变色，说，什么马二先生？是《儒林外史》里的吧？你还看小说？这部书还可以看。别的要挑选。《东坡志林》可以长文才。《梦溪笔谈》可以长学问。这两部可以看。我再接下去说：“风流”不是“风流才子”。他问：知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吗？答：好像是《诗品》的。又问：有两部《诗品》，是哪一部？答：是司空图的。他要我再举一句。我答：杜少陵的“风流儒雅亦吾师”。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接着念下两句：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说，“红颜”泛指青年，不是“红颜薄命”。他又变色说：什么“才子”、“薄命”，你看的小说还不少啊！怎么不引吴梅村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我念完讲完这首诗的八句以后，他说：读书要一字一句都不放过。《论语》一开头有“不亦悦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孟子》开头有“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亦有仁义而已矣。”这里“亦”字都当“也”字讲吗？为什么孔孟都那么喜欢用“亦”？要这样读书，作诗作文才能得益。像《儒林外史》这样的书，虽是小说，有些部分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含有用意的，经过推敲的。这类小说看了才有用，别的不要看，莫浪费光阴。

回来对三哥一讲。他笑了，说，这是我们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作八股文时的读书法。你看过家里那些成堆的“时文”书没有？他随手拿出一本《四书备旨》。书分三栏。下栏是本文和朱（熹）注。中栏是“本章章旨”、“本节节旨”。上栏是讲述要点难点。他说：现在不学八股，要学策论，写报纸社论、通电、宣言全用得上。家里有《东莱博议》，找出来看看。要连带看《左传》，互相对照，大有好处。还有一部《史记菁华录》。再加上《秋水轩尺牍》、《古文笔法百篇》和《水浒》上金圣叹的夹批以及《圣叹外书》，就知道怎么做文章了。过了年我教你念英文小段文章，好像洋《古文观止》，可以懂得一点外国人怎么做文章。古文，英文，道理是一样的，文章是“作”出来的。不过你学这些，将来只好当秘书或者教书，不会有多大出息了。好在你学了打算盘，会记账，当账房也还可以吃饭。我看几千年来念书人的命快要大变了，但不知会变到哪里去。

末世官僚地主魂

钟叔河

明末遗民叶绍袁（天寥）的《甲行日注》是有名的，而我却更喜欢读他写的《窃闻》、《续窃闻》和《亡室沈安人传》，这是为悼念他自己爱女和爱妻而写的一组文章。

《甲行日注》表现的是国恨，这几篇文章所表现的则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们的神经纤维本来脆弱，易于感伤，亦因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每易和现实脱节，所以穷愁潦倒、别恨离愁就容易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而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铸而出。则不幸也者，实亦可谓为他们的（也许更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观。《亡室沈安人传》写道：“自赋归来，仅徵籍数亩之入，君或典钗钿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几何？日且益罄，则挑灯夜坐，共诵鲍明远《愁苦行》，以为笑乐。诸子大者论文；小者读杜少陵诗，琅琅可听；两女时以韵语作问遗……君语我曰：‘慎勿忧贫，世间福已享尽，暂将贫字与造化藉手作缺陷耳。’”这样的夫妻，恐怕只有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文中所写的，才可以相比，在古代社会里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却不让他们这样过下去。叶绍袁接下去就写道：“昊天不佣，琼章首殒。浸寻三载，家祸频仍，君亦随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与我语贫也，岂不悲哉！”

叶绍袁在国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来削发为僧，写《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础”。

我一直看重晚明人的文章，因为在专制倒台、传统崩坏的时代，才容得一点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表露，这也就是“亡国之音”往往比较动人的原因。黑格尔不云乎：“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如晚明者，岂非古代汉族士大夫文明已经暗淡的“暮色”时代乎？但留得几首好文章，此时代亦即值得后人怀念。我们本不是凤阳朱的家奴，大可不必为他们改朝换代而伤心于三百余年之后也。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验之于亡国之后毅然舍幼子田庐作“甲行”的叶绍袁，也是对的。

为怀念亡女、亡妻而写的《窃闻》、《续窃闻》，所记“走阴差”和“扶乩”，当然都是迷信。写得出如此清词丽句的人，未必竟像普通的愚妇愚夫。叶氏不云乎：“余赋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为真有；虽群口交美，无救我女之亡。”但做母亲的却似乎相信女儿确已仙去：“初见儿之死也，惊悼不知所出，肝肠尽裂，血泪成枯。后徐思之，儿岂凡骨？若非瑶岛玉女，必灵鹫之侍者，应是再来人，岂能久居尘世耶？……呜呼！爱女一死，痛肠难尽，泪眼追思，实实写出，岂效才人作小说欺世邪？”（沈氏《季女琼章传》）

迷信是精神的鸦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脱而

亦不得不暂求麻醉就更可悲了。这一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享受，只要有一点能使他们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便会觉得“世间福已享尽”的文人夫妇，逃仙逃佛，终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们，读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对他们产生某种同情之感。聂绀弩诗云：“从来红粉青衫泪，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实，真正当官带兵有田有银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还有他的小老婆，换了朝代也还可以着他的“两朝领袖”，他们是不会来写什么《亡室沈安人传》，更不会做和尚写《甲行日注》的。

藏书泪

王春瑜

俄国文豪高尔基曾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古往今来，茫茫人海中，插架满林，甚至坐拥书城者，固然是少数。等而下之者，虽室有藏书，却不研读，纯粹当摆设，充斯文，阶梯意义尽失。

明中叶关西文人胡侍指出：“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置度阁以饱蠹鱼，既不触目，又不假人，至有畀之灶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鱼也！”（《墅谈》）痛心疾首，令人扼腕。而有的学者之藏书诗，读来更使人感慨不已。“读书藏书，守之弗失。三千部居，不许借出。”这是嘉庆丙辰元年（一七九六）钤于崇祯版《音学五书》封里之朱色印文，不失为小诗。虽说“不许借出”，未免自私太甚。但藏书者对书之宝爱，不难想见。不过，曾几何时，这位“入学室”主人的三千部藏书，早已风流云散。晚明绍兴祁承澹生堂藏书之富，声名远播。祁氏特镌藏书铭一印，其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其心可悯。但也是枉然。后人有得祁氏藏书者，有感于此，乃作诗谓：“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任觔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清·徐乃秋：《风月谈余录》卷一）真是伤心悟道之言。

嘉靖时苏州文士杨循吉所作“题书橱上”诗，回顾购书之艰难，藏书之辛劳，视书为命，奈何家人不知爱惜，真是一把藏书泪，满纸辛酸言。诗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但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丙六）令人不忍卒读。不过，杨老先生愿意将全部书籍白送给愿读书的朋友，从而发挥书的应用作用，难能可贵，堪称是大彻大悟。试想，书无读者，进步阶梯云云，又何从体现？前辈史学大师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等，临终前漫搵藏书泪，将书献国家，俾读者，翻检在明窗下。从而走出古代藏书家的悲剧氛围。这是应当受到今世、后世缅怀并效法的。

“生日之祝”

赵园

或许因为经济生活的稍许改善，节庆似乎也多了起来，新添了一些至少我不知其所自的“节日”。人生从来是要有这类点缀的，否则就太枯寂；汉民族尤其如此——在歌舞的能力不知从何时起蜕化了之后。但如若“节庆”只意味着吃，也令人不免沮丧。但除了吃又有什么可做呢？自然只有如我这样的老人或准老人才会发这种愁，年轻者是决不缺乏玩的能力与机会的。他们可以为了宣泄精力的需要而制造出无数个节日来。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中越开越大的生日派对，即是最寻常的形式之一。

近读明人文集，方知作寿并非古已有之（预先声明一下，说这题目并非意在教训年轻人；他们也未必需要知道古人有过什么样的意思）。顾炎武说婚礼不必贺，丧礼不必贺，那理由却非常有趣。“夫人情之所贺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贺也。故曰：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以其为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贺也，丧之有终，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贺之有？”（《与友人论服制书》，《亭林文集》卷之三）尤其丧礼，说的何等明达！但儒家之徒的精微之论，终与小民的趣味无关。民间最热闹的，不就是红白喜事吗？

至于“生日之礼”，则更强调“古人所无”（《与友人辞祝书》），因而是“非礼之礼”。《日知录》中关于此，有详细的考证。其实那理由也应与婚丧之礼相通的：以其为人事之所必然。进一步说，即在生他的父母，虽不必然（故“得子”可贺），在他本人，则已是“必然”——这意思有点曲折，但也还可以说通。

古代士人的认真，有时的确是近于迂的。顾炎武就不止于论证。还一本正经地辞人之祝，实在有点煞风景。为顾氏所不齿的贰臣钱谦益也曾辞“生日之祝”，为此写过一篇说“愧”而以嬉笑怒骂出之的奇文（《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有学集》卷三十九），还引出了归庄的一篇又体贴又挖苦亦有几分嬉皮笑脸的文字（《某先生八十寿序》，《归庄集》）。钱氏的辞祝寿诗文，除了不欲明言（而又不得不言）的极个人的理由外，也无非因了“非古”。他曾一再说“以生辰为寿之词为非古”（如《有学集》卷二十四《嘉定金氏寿序》；另如同书卷二十二《冯亮工六十序》），却又屡屡为人作寿序，也要说出不得不然的理由，可见当年人们祝寿的劲头之大，习俗之难以抗拒。但毕竟还有士人推究过意义；此义到今天，却早已不为人所知了。在大众文化面前，知识者的理论从来是软弱的。

“生日之祝”其实有十分的合理性，因为它与个体人生有关。在人作为个体被无视的时代，它不失为一种提示“个人”的方式。王朝固有盛大的节庆，卤簿仪仗，草民也自有他们的节日，尽管不过吃上一碗炸酱面。当然，如顾钱所处的时代，衣冠鼎族达官贵人的作寿另有作用，也是不待说的。“意义”从来由人赋予。区别或许只在，古人的赋予意义的活动，有时更认真。这自然与“礼”之为学的发达有关，也因为他们的人事上积累的丰富智慧——其间也还有一点可供现代人效仿之处。

在显得越来越忙碌的现代人，古代士大夫那种将人生精致化的努力像是无事忙。在我看来，这里就有文化流失，且相信在更合理的生存条件下，那

种意义探究与创造的能力，那种对人生意境的追求，都还会被人们找回来。

记者与书

邵玉奎

这种事，对记者来说，多少会有些怪味。

前几天，笔者到邮局取款。服务小姐看到递来的记者证，两眼瞟了我一下，既无热情也无责怪地说：“上级通知，记者证与驾驶证不能再作为取款凭证。下次带身份证来。”我愕然，旋即“哦哦”答应着。

于是，我知道，记者证已经与驾驶证般的不值钱。我有些那个，虽说不上悲哀。那个之后，我也想通了，物以稀为贵，现在记者到街上一划拉一大堆，谁会买记者证的帐？

记者多了，是新闻事业发展使然。这一多，量与质的古老矛盾便又在此显现出来。提高记者队伍的质量便成为不少人思考的问题。

由此，我想到了记者与书。

记者要有两大本事：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果实。

认识生活，也需要两种功夫：首先要肯于深入生活，到群众的生动活泼的实践创造中去；其次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善于发现和把握纷繁复杂生活中的本质，即“理”。而“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记者队伍中，在认识生活方面有不少做得好的，但不可讳言的是，数量不少的人，存在程度不等的浮躁情绪。这也难怪，因为以捕捉新事物、新信息为己任的记者，是浮躁情绪的最易感人群之一。

同一位资深老记者闲谈，他认为当前不少记者在业务能力上有两大欠缺：不会写新闻评论，不会写新闻综述。其重要原因在于学识根底浅，不读书。

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我想，这里说的“不读书”并非指什么书都不读，而是指不读高学识水平的书和打基础的书。一些记者也手不释卷，但大都是时髦的书和消闲的书。社会上弗洛伊德热，他便赶紧找来浏览一番；《易经》热，他也不甘落后地插一腿；汪国真、三毛热，他也成了追星族……读时髦的书，一部分为了猎奇，满足新鲜感；但更多地是为了“侃”。这些年，记者中不乏有一批“侃爷”，以“侃”来显示自己学识之丰富，以“侃”来代替扎实的深入生活。

一种偏见在部分记者中长期存在：搞新闻关键在于学会“路子”。消息、通讯特写、新闻综述、新闻评论作为各具特点的新闻样式，固然有其各自的写作形式，即“路子”，不可把消息写成新闻评论。但是，这个“路子”在新闻实践中是不难掌握的，难的是“路子”里面内涵着的思想内容，即记者对生活的本质认识。由于他们对此在认识上陷入误区，使我在他们想让我告诉新闻“路子”的时候显出不知所措的尴尬。

我生来愚钝，不以为找到“路子”便可以一步成为名记者，只相信苦读书的笨功夫。《尚书》《武成》篇，叙武王伐纣事，有“血流漂杵”之句。孟子认为武王乃仁德之人，怎会讨伐纣王时便血流得木槌都漂起来？据此，他发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感叹。我赞同孟夫子的灼见，不主张做书的奴隶，但也不希望就此导之对书的虚无。我以为，记者起码要读一读打基础的书，这主要可包括三大类：一是基本理论的书，如哲学、经济

学、社会学、心理学原理方面的书籍；二是历史书，首先是通史，也可根据自己工作的需要选学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等；三是汉语类书，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位获邹韬奋提名奖的老编辑还特别提示要看看《说文解字》，因为记者写错别字、文字表述缺少句子成分等都与有关知识的缺乏有关。读这些书似乎很枯燥，一时又难见效应，读起来是很苦的。虽苦但有用，有长用、大用，花一些工夫很值得。

这算做一点感想，也是自勉。

关于“卡通”

马欣

近几年，卡通读物在我国骤然升温，有的城市几乎风靡了青少年读者群，不少成年人也很喜欢阅读。这种突发现象应引起人们的冷静思考。

卡通这个词对我们并不陌生。卡通，是英语 cartoon 的中文译音，意指动画片和漫画。卡通漫画自我国清末就已形成独立的民间绘画作品种类。我所见到的生活书店 1935 年版的杂文集《小品文和漫画》一书中，我国老一代出版家面对当时美国、法国、德国、苏联等国卡通出版事业的发展，撰文总结了我国卡通事业进步缓慢的原因，并疾呼“要努力建设中国的新卡通”。此后特别是建国后，我国的卡通出版事业在不断前进，我们的优秀出版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笔下的孙悟空、阿凡提、三毛、济公，以及《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卡通故事和卡通形象也曾引起千百万读者的极大兴趣。但进入 90 年代，我国传统的卡通读物和平缓迈步的卡通创作事业突然被汹涌如潮的国外卡通读物所代替。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在于读者市场需要。

以最具冲击力的日本、台湾卡通读物为代表的新型卡通图书运用了现代创作表现手法，吸收了当今影视艺术中的大特写、强刺激等多种方式，以不受限制、自由分割的多格绘图画面替代传统连环画的单格画面，以连续发展、大起大落、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适应了现代少年儿童好奇求新求异的阅读需要。同时，由于现在不少青少年学习负担较重，课余渴望轻松，而市场大量涌进和流行的这些卡通连环画文字极少，描绘简明、夸张，富于幽默，对于整天陷于紧张学习生活的学生来说，犹如快餐式的消遣，阅读起来痛快、随意，容易从中得到情感的宣泄、共鸣，以至不少青少年从读琼瑶小说、武侠小说，又成为迷恋于这类卡通连环画的痴迷读者。

还应看到，西方卡通读物和卡通形象大量涌入我国是与国际商战紧密相联的。从米老鼠、唐老鸭、阿童木、变形金刚、忍者神龟、圣斗士、机器猫到奥特曼、狮子王等等，无一不具有很强的商业化色彩。随着近年来卡通读物越来越成为日本和欧美市场上稳步赢利的商品，竭力追求利润的海外出版经销商便瞄准了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先借助强有力的电视媒介，将一套又一套系列动画片无偿给国内电视台播放，等于做免费广告，紧接着各种各样在国外开始滞销的成套卡通漫画读物随之涌了进来。卡通明星与高额利润的结合，使外来卡通读物的商业价值大大高于其文化价值，致使低劣作品大量充斥其间。据有关人士去年对国内图书市场上销售的 100 余种卡通读物分析，发现其中内容不够健康、不符合我国国情，甚至对青少年起着明显毒化作用的读物占了较大比例。如果任凭这些质量低劣的海外卡通读物在青少年读者中泛滥，我们为外国老板和大批盗版者付出的就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下一代人洁白无瑕的精神世界。

可喜的是，这种状况自去年党中央要求积极创作和制作优秀少儿作品以来已迅速得到改观。“中国动画图书出版工程”已经启动，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少年奇才》和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绘画本中国经典启蒙故事》等一批卡通精品书已经问世，《中国卡通》、《北京卡通》月刊也以较高的格调同读者见面。还有不少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

的卡通出版物也在陆续出版。我们的出版工作者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借鉴国外卡通创作生产的成功经验，在内容和形式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在积极探索一条在生产、发行和宣传上与市场接轨的良性循环的出版新路子，努力让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卡通故事和卡通明星出世。

当然，很多出版物都有一个从“过热”到“恒温”到“冷却”的过程，况且卡通读物的直观性较强，作为一种“文化快餐”，主要读者应是低幼少年儿童，不应作为年龄较大青少年的课余主要读物。为了避免青少年读者营养失衡，我们的卡通出版应该注重质量，防止一哄而上，要考虑少儿读物出版的整体格局，努力用健康向上的卡通动画图书和多种优秀少儿读物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

关于杨乃武案的结局

黄华昌

发生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案，前后经过多名大小官员的审理，造成冤狱。此案在最高统治者的过问下，最后由当时的最高执法机构刑部审理，被平反了。原承审此案的官员，自总督杨昌浚以下革职者数十人，一时震动朝野。

这个大案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它为何能够平反？笔者认为，绝非慈禧太后的仁慈，也非清统治者要认真地整肃吏治，而是另有他故，需要联系封建社会的特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研究。

封建社会实行专制统治。封建法律以及种种酷刑，从来就是对老百姓专制的工具。封建社会制造了数不尽的冤狱，使许许多多善良人蒙冤而含恨终身乃至惨死。清朝已到封建末世，吏治更加腐败，就是在“康乾盛世”，官吏贪赃枉法，官官相维，草菅人命，已是司空见惯。《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护官符”，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薛蟠打死了人，可以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在他的眼里，人命乃“些须小事”。而贪赃的官吏，却徇情枉法，胡乱断了此案，使杀人者逍遥法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席方平》一文中，对当时的黑暗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指出官吏贪赃枉法，“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官吏们朋比为奸，致使冤狱遍于全国中。据《光绪东华录》所载，光绪二年某大臣上奏：“惟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事情，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那末，杨乃武案何以能够平反呢？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致。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清末人民群众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已有所发展。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其反封建的影响在江浙一带已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当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已有所觉醒。例如《申报》将杨乃武的冤情公开披露，引起“浙人大哗”，纷纷为其鸣不平。又如，朝廷所派钦差大臣，徇情枉法，维持原判复奏。对此，翰林院侍读钟骏声、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等 28 人，不顾个人安危，“合词赴刑部讼杨生冤”，对杨乃武案平反，起了一定作用。

其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加深。在清廷内部有少数大臣已产生了变法维新思想，主张革新吏治。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首先对杨乃武案提出驳议，力主平反。据清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载：杨乃武案“主此驳议者，全出翁侍郎同龢力，与尚书桑春荣争而得之也”。

其三，是慈禧为巩固其最高统治地位的需要。光绪初年，朝政大权虽然为慈禧所独揽，但地方势力有所增强。曾国藩所率湘军因镇压太平天国得势，原湘军将领在江浙一带纷纷占据要职，形成一股势力。这些人自恃有功，不仅排挤本地官吏，欺压百姓，而且对朝廷构成威胁。清末的史家认为，杨乃武案之所以成为轩然大波，原因“其中有科名门地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强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据《光绪东华

录》记载，御史王昕在给慈禧的奏折中尖锐地指出：“大臣如此欺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这些话触动了最高统治者的神经，于是赫然震怒，降旨将胡瑞澜、杨昌浚等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

偶检唐宋诗文想到的

王武子

人生为何要读书？大哉问。近来偶检唐宋诗文，读到杜甫和苏轼，隐隐然若有感悟。杜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苏诗云：“人生到处知所似，譬如鸿爪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人生短暂，犹白驹过隙；人事无常，若白云苍狗。人生在天地宇宙间，本是一过客，实在不足道。倘是能在“偶然”之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也就算是人生的难能可贵之处了。

人生要读书，大抵正是为了寻求前进的目标。东坡另有诗句：“人生识字忧患始”。盖人生有郁结不得解处，包括对宇宙天地社会人世之种种，于是就要通其义，求正解。而其中最好最捷的办法是读书。

读书可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有字书是人类知识的载体，人类智慧的结晶。今人读前人所著之书，即是思想前人之思想。藉助历史的知识，来丰富自我；借鉴前人的智慧，来判断事物。读无字书，即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很重要，革命导师都很强调这一点。因为理论源于实践，实践丰富理论。若是一味空言理论，自然是无根之谈，无本之源。不知变，不知道，势必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有人说，人生是课堂；也有人说，人生是舞台；还有人说，人生是战场。这些都是就人生的某方面概言，大致皆有理。我意还可补充说：人生是探索。人生读书，也是在一种“探索”，探究宇宙天地人世的真谛。探索有效无效之分，读书有得间不得间之别。由于人人的文化背景、读书方式和致用目的各异，所以人人读书，人人言殊。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可见视角多维，感受自然不会一律。

美籍华人政论作家梁厚甫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趣的短文，内容大致是说中国人读书与美国人读书在行为方式上大异其趣。中国人读书讲究环境，追求书房氛围，而且是净手静脑，正襟危坐，对书也倍加爱护，视读书为一种高雅神圣之事。而美国人读书则大不然，一卷在握，无论何时何地，或公园、或游乐场、或街心市区，皆可展卷开读，决不受环境影响。读倦了，还可随手以书作枕，视读书为一种十分自然平常之事。我以为，此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正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使然。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哲学内涵，是型塑一种“艺术人生”。而西方的文化底蕴，是造就一种“科学人生”。中国的文化精神注重内向升华，西方的文化精神强调外倾超越。前者或可说是为了提高人生境界，后者或可说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当然，我这是抽象而言，不必太拘泥。宋儒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谓也。

我曾经与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讨论过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读书理趣。他说：中国的名著如《西厢记》、《红楼梦》这类书，西方人写不出；“红袖添香”、“旗亭画壁”，是一种很艺术化了的情趣渲染。西方人甚至体味不深。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太醇厚，中国人毕生浸淫其中还难得正解，遑论老美！西方人搞中国文化，比我们玩西方文化还费劲，往往是隔靴搔不着痒处，所以产生不了文化“感应”。设若有人在王府井闹市区痴读“西厢”、“红楼”，

一定是大煞风景。若更有人倚在前门的大栅栏捧读《庄子·逍遥游》，那一定是既不逍遥也不潇洒。当然，如梁厚甫先生所说，美国少女依偎着网球场的护网，能“金鸡独立”长时间的不变换阅读姿势，那也是一幅充满意趣的阅读景观，同样令人艳羡不及。

我以为：读书虽不等于人生，但是可以影响人生，它的最大功用，莫过于帮助“把握”人生。人生太艺术化，容易脱离实际；而人生太功利化，又容易流于世俗。两极都不好，皆有伤于实际人生。

略谈鲁迅先生的乡情

李乔

爱祖国必然爱故乡。鲁迅先生就是一位热爱故乡的伟大爱国者。

读鲁迅文集，可以看到很多反映鲁迅爱乡之情的篇章、文句。人们熟知的，如《故乡》、《社戏》等写绍兴的小说，渗透了鲁迅的乡情；又如鲁迅在《朝花夕拾》序言里谈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称其为“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

文集中还有一些不常被人提及的同类材料，也很能反映鲁迅的乡情。鲁迅的笔名中有“越丁”（《名人和名言》）、“越侨”（《迎神和咬人》）、“越客”（《我谈“堕民”》、《（如此广州）读后感》），其意是说明自己是越人（绍兴春秋时属越国），以寄托乡情。鲁迅18岁时写过《戛剑生杂记》四则，第一则抒写了浓郁的离情别绪：“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溟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此文写于1898年，月份不详。是年5月鲁迅离家至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此则杂记当写于离家之后，亦即“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据有关材料记述，鲁迅18岁那年开始搜集、整理故乡的古代文献，访问绍兴府属的名胜古迹，并抄录、拓印名胜古迹的碑碣文字，以至成为嗜好。这表明此时鲁迅热爱故乡的感情已相当浓烈和成熟。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即小农经济还是汪洋大海的时代，人们的乡土观念普遍是比较重的，对故乡的热爱之情也普遍比较浓厚。但在这种乡情中，也多夹杂着封建性的、狭隘的地方观念，其表现有夸饰乡里、奚落外乡、同乡结帮拉派等等。鲁迅先生具有包容天地万物的胸怀，他的乡情不同于流俗，不是狭隘的，而是根植于爱国爱乡的伟大感情沃土里的。鲁迅写乡土文学，提倡乡土文学，但他想的是祖国、是世界。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笔落乡土，打向世界，有利中国，这种主张不正是先生伟大的爱国爱乡之情的生动体现吗？鲁迅对于夸饰乡里、奚落外乡的陋习，一向持厌恶和批评的态度。他曾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看来先生是把这种陋习作为国民劣根性之一来加以抨击的。

鲁迅曾编纂《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彰故乡“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这与一些腐儒编地方志时为夸饰乡里而拼凑八景、十景决然不同，鲁迅是为唤起人们的爱国爱乡之情，实事求是地记述、研究乡土文献和地方风物的，而决不是为了吹嘘故乡。相反，此书编纂前，对于是否编纂此书，鲁迅还曾一度因“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而踟蹰不前，后因见士女嬉恬，对故乡古物无所眷念，才下决心编纂的。于此可见鲁迅对夸饰乡里的陋习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旧时一般绍兴人同乡观念很重，绍兴师爷更是结帮排外，而鲁迅在人际交往中则不重同乡关系，而讲五湖四海。有人曾在这方面挑剔过鲁迅，那是因其不识鲁迅胸怀之博大。

鲁迅对越中先贤一向敬重，对搜寻和介绍他们的事迹及著作非常重视。

他编《会稽郡故书杂集》的目的之一是彰“贤俊之名”，也就是使越中先贤的事迹流布世间，不使湮没。在《杂集》中，有四篇是专记越中先贤的，这些篇章都是鲁迅从众多古籍中辛勤钩辑出来的。鲁迅还曾手书过一份《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从中可看出他在搜集先贤著作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鲁迅对越中先贤的优良传统非常重视，并深受其影响。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因革命态度坚决而被同学赞为：“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他在文章中又常引用明末具有民族气节的绍兴文人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来明志，这些都表明越中先贤的优良传统对鲁迅有重要的影响，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是与越中先贤的优良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京城大爷

李乔

北京人中，以身处京城而自尊自傲的所谓“北京大爷”（爷字声调为阳平）颇为不少。北京人艺演的话剧《北京大爷》我没看过，但想来一定刻画得不错。

民国时，北平虽然已不是首都，但因为曾是前朝故都，北平人便有着浓厚的“大爷心态”，他们喜欢自称为“天子脚下之臣”。对他们，可以称之为“北平大爷”。在老舍先生笔下，常能见到这类“北平大爷”，其描摹之真切、之精彩，真是呼之欲出，令人叫绝。《四世同堂》里的瑞宣，就具有“北平大爷”的心态：“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离婚》里的张大哥，更是一个标准的、正宗的“北平大爷”：“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

因为自己是大都市特别是京城的居民而自尊自傲，这种现象古来有之。南宋首都杭州的居民，因为自尊自傲而被称为“骄民”或“龙袖骄民”。宋人周密所撰的《武林旧事》卷六“骄民”条记云：“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卷三“祭扫”条又云：“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可以看出，南宋杭州的居民不仅“素骄”，而且“素骄”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在“辇下”，即天子脚下。“龙袖骄民”，也作“笼袖骄民”，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义序》云：“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钱塘，即杭州。我觉得，“龙袖”比“笼袖”更为传神，那意思大抵是在说，骄民都是住在真龙天子的龙袍袖中的。这些南宋杭州的骄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叫作“杭州大爷”。如此类推，历史上有“大爷心态”的古都居民便还有“西安大爷”、“洛阳大爷”、“开封大爷”、“南京大爷”等，他们可以统名之曰“京城大爷”。

“京城大爷”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历史现象，“京城大爷”的心态，是一种内涵颇深而又非常有趣的文化心态。这种现象和心态很值得社会史、文化史学者注意和研究。

化玄奥为平常——冯友兰著述风格一瞥

李乔

“哲学史”，是个让一般人敬而远之的字眼。单单“哲学”二字，就已经是抽象概念的萃聚之地了，若再加一“史”字，加进那些充满奥义的古词汇，就更令人感到玄奥难懂。我浏览过不少哲学史著作，大都是古奥艰涩，学究气十足。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著述则另有一番景致。写哲学史要做释古工作，释古向有二途，一曰以奥释奥，从古雅到古雅，一曰以今释古，以俗释雅，化玄奥为平常。冯先生走的是第二途。读冯著，如感阵阵清风扑面而来，宛如在听冯先生循循善诱地讲课。

哲学阐释离不开举例和设喻。一个好例，一个妙喻，常能解透一条原理。但并非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擅长此技。冯先生所以能化玄奥为平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擅长此技。

清代洋务派的思想，概括说来，叫作“主于中学而以西学辅其不足”，对此，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是这样解说的：

在民国初年，在报纸的广告上常有一些征婚启事，那些启事有一个现成的套子，总是说：“某某女士，新知识，旧道德。”有一个女学校的校长告诫学生们说：“叫你们来上学，是要你们于旧规矩之外再学习一点新知识，并不是用新知识替代旧规矩，旧规矩还是要的。”这些话恰好就是“主于中学而以西学辅其不足”那一句的注解。

这真是绝妙的比喻，高超的解说，既通俗明白，又深刻诙谐。在冯先生的笔下，日常生活的俗例成了哲学阐释的工具。

类似的妙喻和解说还有很多。冯先生在评价孔子和朱熹在元明清时代的地位时说：“孔子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却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在当代西方君主立宪国家，内阁总理是有实权的，但却不是名义上的首要人物。朱熹的名声虽在孔子之下，但所具有的对人们思想的实际控制权却俨如孔子的内阁总理。这个比喻，既生动又贴切，还带着几分俏皮，形象地概括出了孔子和朱熹各自的地位。灯泡是人人熟悉的日用品，冯先生曾拿它来解说宋明道学中的“体”、“用”这一对范畴。他说，“体”指本质，“用”指这个本质所发生的作用，灯泡的构造是“体”，发光是“用”。这一比喻，把本来抽象的概念，隐约的寓意，说得非常具体、清晰、明白。

冯先生用今事今语、俗事俗语阐释哲学史上的概念、道理和事实，很像朱熹所说的阐释儒家经典的方法——“只就眼前说出”。朱熹说：“大凡说书，只就眼前说出底便好，崎岖寻出底便不好。”（《朱子语类》卷七十）说书，指解说儒家经典。“只就眼前说出”，大抵指用眼前之事、易明之事来解说，“崎岖寻出”，大抵指以奥释奥之类。前面所举的冯先生的几个设喻和解说，都是“只就眼前说出”的。

比喻，是一种文学笔法，能使文章生动具体，富有形象性。学术著述使用比喻，不仅能使文字生动，还能把说明文字不易说透的细微寓意表达出来；但如果设喻不当，也会伤害学术著述的严谨性。冯先生的设喻则达到了生动与严谨的和谐统一。可以说，冯先生的哲学史是带着文学意味的。

冯先生化玄奥为平常的著述风格，源于他一贯具有的不尚玄虚、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他一向认为，哲学的价值在于使人“安身立命”，获得较高的精神境界，而不在于卖弄玄奥。他不喜欢把哲学著作搞得莫测高深，玄虚难懂。抗战期间，冯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由吴稚晖审查，吴认为冯著“把事情说得太穿了”，意思是哲学总要带一点神秘性，叫人莫测高深，否则哲学的尊严会受到损失。冯先生没有接受吴稚晖的意见，他不认为哲学的尊严在于神秘莫测。吴稚晖所说的“说得太穿了”，其实正是冯先生的著述风格，即化玄奥为平常。

化玄奥为平常，谈何容易！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何以化之？冯先生是个头脑极清晰的大哲学家、大明白人，他参透了自己所研究的那些玄奥的故纸，所以才能解而化之，平浅出之，娓娓道来。

不少哲学家都曾发过“让哲学走向民众”的宏愿，更有许多人津津乐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的话头。但让哲学真正走向民众却诚非易事。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著作虽然寓意深邃，但书中那些化玄为常、平浅生动的解说，却犹如一座桥梁，使他的这些著作走向了万千读者。

在西裱褙胡同附近

李乔

在我供职的北京日报社附近，有两条胡同曾经与鲁迅先生有过一点关系，一条是船板胡同，一条是镇江胡同。这两条胡同离北京日报社所在的西裱褙胡同都很近，这使我仿佛觉得，鲁迅先生与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据周作人的忆旧文章《复辟避难的回忆》一文说，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时，辫子兵聚集到了北京南城的天坛一带，人们怕辫子兵抢劫，纷纷避难他处，鲁迅和周作人也从南城的会馆搬到了东城船板胡同的新华饭店避难。这新华饭店，其实就是旅馆，并非如今那种星级饭店。船板胡同与镇江胡同毗邻，周氏兄弟曾因新华饭店的服务太糟，到镇江胡同的义兴局吃过饭。

这段经历，鲁迅和周作人在日记中都有记载。

周作人的日记显明些，记云：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一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而了矣。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

所云“大哥”，就是鲁迅。周氏兄弟不在自己的住所新华饭店吃饭，是因为这家饭店趁复辟之乱，居奇宰客。

鲁迅的日记云：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

“二弟”，即周作人，“觅食甚难”，原因即新华饭店居奇宰客。

对于义兴局，周作人在《复辟避难的回忆》中有个注解，说：“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在东裱褙胡同。”齐寿山，是位有名的学者，周氏兄弟的好朋友。在《鲁迅全集》中，常能见到齐寿山的名字。义兴局是齐寿山家于庚子年间开的一个店铺，生意很好，晚清时曾经是革命党人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革命党人行刺清朝大臣良弼，就是在义兴局策划的。

但义兴局的店址，似不像周作人所说，在东裱褙胡同，而是在镇江胡同。这可证之齐寿山的家兄齐如山所著的《齐如山回忆录》第四章《助革命》一节：“义兴局自光绪三十年搬到崇文门内镇江胡同一所房，约五六十间，共六七个大院，一切居住都极方便。”光绪三十年是1904年。如果后来义兴局没有搬迁过，那么周氏兄弟到义兴局时，义兴局的店址当是在镇江胡同。据《齐如山回忆录》第十三章《谈家常》一节云，齐家的家宅是在裱褙胡同，齐如山、齐寿山和他们的大哥齐竺山同住在这所宅子里。周作的回忆文章，作于1957年，距他去义兴局已相隔四十年，可能是他记忆有误，把齐家家宅与齐家店铺弄混了，而齐如山则是记述家事，当不会错。

在鲁迅先生避难的新华饭店附近，有义兴局这样一家鲁迅的朋友开的店铺，可说是一件凑巧的幸事，否则“觅食甚难”的鲁迅先生真要如孔子厄于陈蔡了。

从船板胡同、镇江胡同，到我们北京日报社所在的西裱褙胡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实在是最近了。鲁迅先生在这一带曾留下过行迹——每念及此，

我的心头总是一热，好像先生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一样。

启功先生的“强词夺理”

李春林

我不懂书法，对于诗词也是门外汉，买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是因为喜欢绝句下面的注解。这些注解三百来字，见解精辟，文采靡靡，可以当绝妙的小品文来读。

《论书绝句》的注解谈的是书法，又不尽是书法，跨在书里书外之间，懂书法的人能从中有所得，不懂书法的人也能从中有所悟，如第二十五论曹真残碑：“军阀相称你是贼，谁为曹刘辨白黑。八分至此渐浇漓，披阅经年无所得。”启功先生在注解中写道：“此碑文中有‘蜀贼诸葛亮’之语，初出土时，为人凿去‘贼’字，故有贼字者，号蜀贼本，无贼字者，号诸葛亮本。继而诸葛亮三字又为人凿去。世虽以蜀贼字全者相矜尚，然实未尝一见也。有其字者，多出移补，或翻刻者。”这一段文字纯属叙述，平淡无奇，奇的是接下来的一段。“桀犬吠尧，尧之犬亦吠桀也。犬之性，非独吠人，且亦吠犬，惟生而为桀之犬，则犬之不幸耳。人能无愧其为人，又何惭于犬之一吠哉！明乎此，知凿者近于迂而全者近于愚矣。”这已不仅是论书法，而是在发人生世事之慨了。历史上，官骂也罢，私骂也罢，人与人之间相互辱骂的文字很多，达观的人对此付之一笑可也。第八十三是论明僧海明、德清的书法：“憨山清后破山明，五百年来自几曾。笔法晋唐原莫二，当机文董不如僧”。启功先生在注解中写道：“先师励耘老人每诲功曰，学书宜多看和尚书。以其无须科举，故不受馆阁字体拘束，有疏散气息。且其袍袖宽博，不容腕臂贴案，每悬笔直下，奋提按之力。功后获阅法书既多，于唐人笔趣，识解稍深，师训之语，因之益有所悟。”这段话说的是明代书法，但用之于整个明代文坛也很合适。有明一代，朝廷以八股文取士，因此，举目皆是帖括之士，况且文坛上复古主义盛行，气氛极其沉闷。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派竟陵派异军突起，晚明小品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大行其道。在我看来，明代文学真正可读的，除了冯梦龙倡导的白话小说外，就是晚明小品了。晚明小品之所以可读，就因为它们无帖括之拘束，像励耘老人说的，“有疏散气息”。

三百字，篇幅极小也，但启功先生却能在这只能容膝的地方腾挪变化，舒卷自如，真是非大手笔不能为。更妙的是注解中有许多地方，看似闲笔其实不闲，虽属蔓枝却饶有谐趣。如第八十四论八大山人的署名：“山人署名，每自书‘驴’、‘屋驴’等，从来未见自书‘耷’字者，久之乃悟耷盖晚明时驴字之俗体。与古文之耷字无涉。正如西游记夯汉之为笨奴，与夯土之夯无涉也。传画史者不忍直书马旁之驴。而转从俗作耳”。又如第八十八论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二百数十年来，人无论男女，年无论老幼，地无论南北，今更推而广之，国无论东西，而不知郑板桥先生之名者，未之有也……当其休官卖画，以游戏笔墨博鹾贾之黄金时，于是杂以篆隶，甚至谐称六分半书，正其嬉笑玩世之所为，世人或欲考其馀三分半书落于何处，此甘为古人侮弄而不自知者，宁不深堪悯笑乎？”举重若轻，寓庄于谐，见别人所未见，发别人所未发，真是启功韵语，独此一家。

要问我在《论书绝句》中最喜爱哪一篇文章，回答是“引言”，特别是引言中“强词夺理”的那一段：“其中所论，有重复，有矛盾，亦有忍俊不

禁而杂以嘲嘻者，或以此病相告，乃自解嘲曰：重复者，为表叮咛，所以显其重要性也；矛盾者，以示周全，所以避免片面性也；嘲嘻者，为破岑寂，所以增其趣味性也。强词夺理，其为有痴嗜之读者所见谅乎？”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话不能倡同，因为那样容易引起夫妻不和，进而带来社会不安定。至于文章是自己的好，则十二分地可以理解。文人对于自己的文章，犹如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世上没有不说自己孩子好的母亲，也没有不认为自己文章好的文人。母亲夸自己的孩子，理智也罢，不理智也罢，都不让人过厌。因此，认为自己的文章好，应该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本质特性之一。当然，也有文人说自己的文章不好的，这种人，说好听点，是谦虚；说不好听点，是故作姿态。启功先生对自己文章中的“毛病”强词夺理加以辩护，那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对这位文化老人的天真，我除了表示钦佩外，只能报以会心的微笑。

黄山客讲：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启功先生学问精湛，胸中有万卷书，因此，他的书法面目可喜，他的诗文语言有味。

吃力的阅读

米博华

聪明人往往能同时干几件事，什么都能玩两手，而且都挺像样。比如，能下围棋，能写文章，能唱卡拉“OK”，还能比划着刷一手“欧体”字。我挺佩服这路朋友的。

我不行。我只能集中精力干一件事、弹一根弦。多了，就乱套。“专注可以成精”，这是对不太聪明的人的鼓励。其实成不了精。不过这确是不太聪明人做事的终南捷径。

我只能只爱干一件事：写些小文章。我听说过某作家倚马可待、一挥而就的洒脱；心向往之，可学不来。我要写文章就顾不上旁的事，就像所有的星星围着太阳转，一个中心。

读书至少有两种用途：娱乐或者学习。我读书很少娱乐的成分，也显然不是那种以学问为目的的寂寞学人，属于“致用”派。当然这“致用”不是背书，应付考试；也不是办差事，想证明什么是对的，就能证明什么是对的。而是说，我读书是为了写文章，让书围着这支秃笔转。这目的使读书的功能由一般意义上的娱乐而变成思想的劳动。

比如，我很爱看高阳先生的清代历史小说，尤其是《乾隆韵事》这类书。吃了韭菜饺子，躺在床上看小说，很惬意；但我却看得很用心，很吃力。有些章节，如雍正锢杀隆科多，贬放年羹尧等事件，都是反复看的。甚至在许多条陈和奏折中加上我的批点。我觉得这些典型的官样文章颇有琢磨头，虚虚实实、曲曲折折，显示出非常老到的政治经验。这些虽不能直接植入自己的文章，但至少还可以增加一只观察事物的眼睛。当然，这样读书，很累。

要读就读好书。但好与不好，人言言殊。我以为，知和识密度大的书是好书，就像浓缩的铀或者提纯的酒。故而也要优化读书组合，排个队。倘坐上不太挤的电车，又顺手摸出一本琼瑶女士的《六个梦》，仍要细读。我不会跟着故事跑，也很难进戏，但我会很注意故事的结构，琢磨这么多的线索是怎样出出进进、编织成一个网的。也许还有语言，看看小知识分子浪漫的语态。总之即使是供消遣的书也不可沉湎于单纯的娱乐。同样的一本书，用消遣的心态读和用研究、求索的心态读，是不一样的。总有些值得学习的东西。读得放松，就溜掉了；而读得专注，就记住了。往后会有用的——如果你打算用的话。

有些书相当枯燥，至少，像我这个水平的人读起来很吃力，如《五灯会元》。我们既不知晓世尊拈花的意义，也不明白迦叶微笑缘由。世祖们说法总是那样朦胧得高深莫测。我想如果不打算遁入空门，恐怕这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很难读得津津有味。问题是，需要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饥饿感。人要是饿了吃什么都是香的。也许正是因为写文章需要的缘故，我亦偶尔随着普贤菩萨走上一程。哪怕是只言片语，半生不熟，听听也好。我在想，如果不写文章或者不指望提高文章的水准，何不绕道而行，又何必啃这酸果？然而我的想法略高，所以就总觉着饿；啃一啃，聊胜于无。我向往系统读书，但不排拒只言片语。系统是相对而言的，不过是扩大了只言片语。东一片、西一片，拾辍起来，虽然太不正规，但总归有用。

读书何用？小学生回答很干脆：学文化、长知识、考大学。目的相当明

确。可怜我们这些成年人就犯了糊涂。如果讲娱乐，那还不如看电视；如果讲开心，那还不如“搓麻”。我们娱乐和开心的方式太多，不唯读书一途。所以人要是求知而且热烈持久地求知，必有一重压力。工程师如此，教授如此，像我这样写小文章的人也是如此。就是说读书必附丽一件小事业或大事业上，才能持久、才能深入。否则就很难有耐心抱着一本大辞典，像看小说似的一页又一页地看。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当然还有另一种逻辑，那就是好看、好玩、赏心悦目的文化消费。这也是言之成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吃力的阅读和一目十行的阅读，都好。

想起了郑振铎炒股票

禾戈

1945年6月，日寇还没有投降。“洋蜡烛价至一千七百元一支，切面二千四百元一斤”，郑振铎在“数日不问价，不意已飞涨如此”的惊愕之中，从心底里发出了“可怕也，不知如何活下去”的慨叹，于是痛下决心“购股票若干，亦姑试为之耳”。此后数十天内，为这点股票，他只好成天奔波于银行、股市之间，在他的日记中，就频繁地出现以下文字：“至市场，心里的变化，也如天气似的，忐忑不安，生平未曾有过如此之得失索念过，且止于此吧”，“得失频频，多未能免于介介，是可怕也”，“奔波甚苦，无非为利而已，瞬息万变，人声鼎沸，一上一落，心亦随之，可怕也”。

是可怕。名满天下的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居然也在生计窘迫之中动了炒股票的念头，而且还真下了“海”，这真让人震惊，可见文人雅士在饥肠辘辘的挤压下那点理想主义是很脆弱的，看到海边潮起潮落，有人一夜暴富，心里也实在痒。照理说，文人平生应当潇洒淡泊，该读书写字，该立身讲堂，该沉潜学问，该埋首案头，本不必“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归园田居》说：“一世异朝市，此言真不虚”，他庆幸的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以挂冠而去，弃薪俸如弃敝履。但是文人也罢、学者也罢，总是要果腹糊口、养家教子的，在家徒四壁的时候总不免“不能免俗，聊复尔耳”，也会想到挽袖卷裤把脚往水中探它一探。其实，这并不丢人，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就记载一个老儒闻人茂德，对经义极有发明，又精于小学，但又当过生意人，“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郑振铎炒了股票，也写了《中国俗文学史》，但从没听到有人说他“俗”。

问题是文人读书太多，呆气太重，实在搞不清股票市行情为什么如此反复无常，时而牛气烘烘，时而熊模熊样，时而多头，时而空头，竟不像四书五经二十五史里那些静默的文学那样庄严与永恒，每天去交易所闹个发昏章第二十一，反不如回到家来读尧曰章第二十来得心平气和。郑振铎在市场上碰得灰头鼠脸，便只好回到家里读《金鱼图谱》，读《山水扇面集》，读《蜀山剑侠传》，读《济公传》，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没有粟千钟，可毕竟全无炒股时的焦灼不安，全是读书时的惬意安泰，炒股只有赔，赔了钱财，赔了精力，“至市场，股票大跌，售去‘新光’，亏至十六万余，可谓‘船破更遇顶头风’矣”，读书只有赚，赚了心境，赚了学养，“取善本书若干，以资欣赏，以涤尘心，当可有助于修养”，这是文人的事情。

还是各干各的好。郑振铎说道：“借债还债，不胜其烦，此事诚不可为也，可少休矣”，“还是做自己的本行为是”。商人炒股做生意，让街市上霓虹灯闪耀，这很好。文人读书做学问，使世界上还有一种精神血脉在，这也很好。不必擒龙上山赶虎下海，把一切都驱到市场上用秤较量。社会分工少说也有几千年了，据说分工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为什么一定要泯灭这界限，使全民皆商呢？“儒商”这个名称很别致很雅，也拍出电视剧了，但儒生能不能成为好商人？让郑振铎们戴了圆圆的眼镜穿着长长的衫袍当垆卖酒或摆摊卖煎饼果子，他们能做学问么？商人能不能成为好学者？让中信公司光大公司的经理董事身着西装足登革履手捧线装书念“金叵罗”或“曰若稽古”，他们能赚钱么？

3 个月后，郑振铎在家写《蛰居散记》，第一篇是“暮影笼罩了一切”，那时抗战已经胜利，他也曾欢呼雀跃：“今后可以安生乐业，不愁饥寒了”，可为什么眼前的“暮影”依然挥不去呢？

清理书架

禾戈

案头又摆满了书，这是为了写论文。当年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说的就是这种钻故纸堆的专业。干了这一行，只好从书架上一本又一本地取下书来，在书加书再加书的堆积中，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文章也一点一点地打出来。终于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桌上的书也堆到了快坍塌的地步，于是就怀着愉快的心情把它们一本一本地送回书架，书桌又重新变得简洁干净。

喘一口气，喝一杯茶，环顾四周，接着就是一个说不清是好是坏的习惯，我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清理一次书架。所谓清理，是按照下一轮读书写作的需要，把各种参考文献依次安放在周围的书架上，离得近就显出要紧，离得远当然就不那么重要。远近亲疏的常常变化，以至于与我共用书架资源的家人颇不以为然，抗议道：书都快被你调整得找不着了！有时讽刺：真够实用主义的！

没有办法，就像一个主妇对于厨房的锅碗瓢盆的清理，这是一种清点手下兵马的必要次序。书架仿佛我的一个账本，有什么没什么，凭脑子记不住，只好隔三差五地摆上一回。说白了，我是在用清理书架来清理思绪。干上这一行，不得不总靠文献说话，可是文献那么多，又不可能全记在脑子里，只好靠一次又一次的整理图书来回忆参考文献的线索，比如，下一个题目是关于佛教，就只好把佛经和前人关于佛教的著作一一搬上前面的书架，于是大藏经和吕澂、汤用彤、胡适等等前辈的名著就一一罗列在上；下一题目是关于语言，于是王力、赵元任、李方桂、周祖谟的著作就恭请上前，这时，自己也仿佛底气十足。想起“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故事，总觉得自己也如古代大将军一样，于是，在书架上圆一个豪气干云的英雄梦。

想起来有趣得紧，说起来可笑得很，一介书生，守着这一堆书，在书架中逡巡摩挲，在清理中整理思绪，换得自豪，找到愉快，其实与守财奴成天数家里的财宝并没有什么差别，偏偏就觉得自己好高雅，而且还很上瘾，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掩耳盗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粟千钟”，据那些已经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说，这是古人在心里寻找平衡的咒语。现在的人再说这种话，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干脆点说是自我解嘲，或自我安慰。

曾经读到清末一个河南山区的小知识分子的日记，说的是百年前的往事，却也颇合如今读书人的心境。他守着几十亩地的庄稼和一个私塾的教席，60年来一直心里满足得不行，可是六十来岁时偶然到了一趟京城，看着满世界的花花绿绿，却无缘享用，心中沮丧万分，只好长叹一声。回到老家，便在墙上挂出了一个条幅，严令子孙谨记在心：“世上万般皆下品，细数惟有读书高。”可是在他死后的日记里，人们却读到他的心底苦衷：“吾幼习诗书，手无缚鸡之力，亦乏经营之才，唯书籍之内，为吾生计所在，岂可一朝弃之。且守数十亩薄地，衣食无忧，且于书中度日可也。子孙如我，不善经营，世风日下之时，畏其邯郸学步，故以此（指条幅）戒之且诱之也。”

有几十亩薄地，得一两间陋室，衣尚蔽体，腹且不饥，当然可以“且于书中度日”。

废名

孙郁

语言有时像魔方一样，很有意思，我们一时说不清楚。读废名作品时，便想起语言的诸多妙处。我很佩服他使用白话文的功力，同样是写乡间琐事，世态人情，他的风格就大异于同代人。那简直是山间隐雾，清淡灵妙，他的沉稳、自然，与苦雨斋主人十分相似，但又另走一路，隐士的书卷气不见了，倒多了一种似禅非禅的秀气。语言到了他手里，如白得不能再白的雪，看似色调单一，但韵致却千姿百态。我觉得废名是设境的高手，沈从文的许多散文不及他，许地山的一些随笔也不及他，那高雅的境界，是我们这些俗人写不出来的。

为什么废名这般迷人？我说不出来。只觉得沈从文受了他影响，汪曾祺也分享了他的余韵。文人中，有废名气的不多，想故意摹仿他者，亦难。人只有到了一种境界，才会有这种语言。他不求新，亦不出奇。废名的语言，贵于平直，但却有深湛的东西在。陶渊明在乡中写隐居乐趣，把语言由汉代的繁芜，引向清彻单纯，这实在值得夸讲。明清的一些“性灵”派人物，语言也不求隐曲外饰，到了周作人，那简直就是大白话了。可不凡之气，却悄然而出。这是“天然去雕饰”的妙处。苏东坡书信，我觉得比他的诗赋好，也自然。他写诗作赋，多少还带“做”的痕迹，而尺牍短札，飘然若仙，自如无伪。读鲁迅的书信，不知怎么，就想起苏东坡，随意的平与直之间，洒落的却是纷纷情意，如绵绵细雨，越是无声，越有几番味道。我觉得白话文中，可把语言中的这种味道写好的，实在不多。除了周氏兄弟，废名确是一个高手。可惜他写得太少，当代青年知道他的不多。但我以为，没有废名，便不会有汪曾祺这一类作家。文学史，就是这样一个链条接一个链条排列下去的。

废名的散文大多写身边小事，他不会写雄壮的场面，也没有冲荡迷人的气魄。他太“小桥流水”，太清静安谧。就是写人的哀痛，亦不见痛心疾首的愁容。但读他的文章，却隐隐觉出一丝苦涩，但也仅仅“一丝”，不呼天抢地。他把什么都看得平和，不去计较得失。他写《树与火柴》，是一片童心，那味儿中没有一点成人的杂质；他写《墓》，我本以为要渲染悼念之情，却不料是对尘世净土的勾勒。那对村妇的几笔素描，已把人间爱意写尽，仿佛让人看到一幅宋元的山水图，静静的画面，散着几许冷寂。废名把世间的冷暖写出了，把超然于世俗的清肃写出了。他的语言，像山间飘下的水珠，清凉之中，带着野味儿。我以为他确是白话文中的王维。

废名曾为梁遇春的《泪与笑》写过一篇序言，读后顿生敬意。他的语气太平和，太漫不经心，但却绕梁三日。他大约不爱直写人的痛感，把逝者的旧容描绘得简简单单。可恰恰在这种简单之中，却流出散不尽的人生感慨。他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悟性，思维的方式也迥别流俗。废名的文体的美丽，来自于他的人生态度的超然。他对生与死的理解，似乎得到佛、道的真义。但又不同于旧时文人那么老气，总觉得像似输进了现代人文精神，古而新、俗而雅。只有经历了“五四”的人，才会有这般境界。他把东西方文明中有趣的东西，自塑到自己的文字中了。

周作人也写过山色、风土、人情的文章，那也是少有的明快。废名在一

些语句上，似乎也有意仿照他的老师。有些话，简直就是周作人的。但废名过于单薄，故少了学者气。他像个从书房中走进山野的人，书卷气愈来愈少，而清新气愈来愈多。何以故？此废名世界隐秘也，明乎此，便懂废名大半。

我走过了许多地方，废名描写的东西，大多经过、看过。但却从未能写出过。今读废名旧作，唤起了我思乡的感情。废名写人写物，似写我的所遇所感一样。我的激动，难以言表。惟其如此，我才对他敬之又敬，引为心灵上的老师。

作文的背后是做人

刘仰东

有年秋天在长沙，我因事到学者钟叔河先生家，由于同是编辑，话题难免离不开书。当时市面上盛行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随笔作品，钟先生说，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还不同，周氏是学人，他们两位是文人。这个评判让我顿悟。我读林语堂的作品，固然每每要荡气回肠，却总以为当中该有些迷人的“肥皂泡”，似可点破一下，是钟先生的话提醒了我。

我看周作人，他首先是读书家，然后才是学者和作家。他的作品，不论写的是什么，总抹不去深重的书卷气，他对人生的全部理解，大抵都潜入潜出于书堆，再反馈到他的笔下；林语堂恰好相反，他好像从不为读书而读书，说白了，读书不过是他的一块晃人的生活招牌，他的作品飘逸起的是灵性，飘落下的是浮泛的生活观。周作人可以不写书，却不能不读书；林语堂可以不读书，却不能不写书。读周作人的作品要有一种氛围，比如冬季的夜晚，在床头灯下静静地反复赏诵；林语堂的书则可以拿到随便什么场合去读，读一遍便可记住，也就足矣。周作人的作品大多写给与他同好的读者，曲高韵雅，和者寥寥；林语堂的作品则走街串巷，流行起来，几乎风靡一时，称得上雅俗共赏。换一言以蔽之，林氏的作品，除了“灵”而外，倘说再做一个字的结论，大体要落在这个“浅”上。“浅”字究其实质，并不带有太多的贬义，只是难避哄人之嫌。无怪深识其人者如鲁迅先生，在言及林氏30年代于上海倡导“灵性小品”时，不免要说一句“此公亦诚浅陋耳”的话。

“文如其人”，这话不假，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了林文的大背景他是怎样为人的。一般人印象中的林语堂，诙谐、博雅、潇洒，这些都并不错，但这些仅仅是林先生做人的一个侧面。据陈望道先生回忆，30年代在上海，一次曹聚仁请客，林语堂到席，很为自得地谈起：“有一次在香港，几个广东人讲广东话，像讲‘国语’似的，讲得很起劲；我就同他们讲英语，就把他们吓住了……”这种卖弄乖巧的俗举，不用说在场的鲁迅先生，他早就“横眉冷对”了，即使于同样通晓外语的一代学人若陈寅恪、周作人、钱钟书者们，我敢说也决然不屑为之。事实上，林语堂英文之好确是公认的，他本可以有更可贵的建树，鲁迅也曾劝勉他腾出精力，把功夫做在西方名著如莎剧的翻译上，“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这显然也是极富建设性的文化大工程，却终为林语堂所唾弃，他宁愿把着消闲式的笔锋，在生活的末梢上抒发灵性。

《林语堂文选》中，有一篇文章题云《我的图书室》，嘲弄某些暴发户，他们有堂皇的书房和所藏浩繁、罗列齐楚的书柜，却难得碰这些书一下，不过藉此附庸风雅而已。但林氏转而也并没能跳出自己指斥的圈子，他所推崇的不过是同样肤浅的形式上不规则的架式：书要摆得处处皆是，甚至成套的书也不妨拆散开了，以达至给人凌乱、随意和高雅的美感。其实这与读书的层次和境界，实在不是一码事。倒是林先生过于讲求这些，步入了智人的误区，反过来仅仅为他的文字作了个俗证。

不过，仍然要交待的是，我们这样议论林语堂先生及其作品，有两个前提：第一，我读林语堂，先看到的自然是他的才华、悟性、灵气、诙谐和雅兴；第二，任何结论都建立在相对的意义之上，林氏的作品也决没低劣到如现在某些诗界“弄潮儿”接二连三的出集子那样不值一品。毕竟，他用英文创

作的《苏东坡传》，是我渴求多年的上作，至今每逛书店，还要搜寻一下。

两种遗憾

常伯工

有两种读书人。

命达者，与千古文章无缘。虽极尽东风鼓帆、万里破浪之便，名亦有之，利亦沾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使左右前后井蛙之属艳羨不已；谄媚之徒，蜂拥蚁聚；——二平庸之辈，嗟叹扼腕。遂自觉海内无过其者，于异口同声的赞扬之云上，飘飘然有“舍我其谁”、“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进而出入翩跹，张口闭口评点文章，指手画脚阔论道德，似乎天下人仅够置其手掌之上，而无资格入其眼皮之中。但有一点却是此类君子可怜之处，即：恰因顺而生速，因速而生粗、而生浅、而生浮，因浮浅而永不可能体会到人间最深、最幽，却最美的那种雅，那种浸入灵魂的快意；永不可能真正地与千年以前的圣贤对话，永不可能使千年之后的睿智者叹服。用林语堂的话说，就是他“永远被幽囚在周遭的环境里。”

命舛者，则与富贵、得意无缘。此辈人或穷经皓首，陶陶然于一词一字之得失；或披荆斩棘，毕其生钟情于一个“渺茫”的目标，并为之受苦。此辈人生前多默默无闻，尼采云：“我的世纪尚未到来！”即其写照。环境萧然，衣他人前年之衣，食他人不屑之食。茕茕子立，终岁无笑，仅为他人提供笑料！其境遇真算是凄惨了。然而，然而！他们的胸中世界几人得晓？他们的能量高低几人得晓？陋颜丑躯的外表下，有风雅万千，风雷云霆、龙吟虎啸，时时酝酿于胸，不动则已，一提笔便可成就千古文章！其寿虽短犹长，可以长过人类，长过地球，长过银河，长过宇宙！其精神是永在的。

两类读书人，两种遗憾。

前者生时心高气傲，以为自己俨如那不知几千里长的大鹏，一展翼便扶摇直上九霄。遗憾的是，他们不知这仅是幻象，非但别人无睹，就是自己，再睁眼也是一片空茫。他们的遗憾又在身后，古来讲究“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此辈生时虽香风四溢、色彩斑斓，其生死之际却必有一天大句号，死后仅肥一步之土；更遗憾的是，他们浑然不觉这诸种遗憾。

后者则于生时困厄无奈，四处碰壁，终日里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于是只好一丝不苟地向内求灵魂的修炼，中夜扪心时或可得些平衡。他们的遗憾在于，意识不到自己的价值，意识不到自己将会永存。如尼采敢言未来者是绝少数！即如尼采预知可独领风骚于来世，作为有知肉体，他却无法看见，这无疑还是一种遗憾。更悲哀的是，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遗憾！

如此说来，读书人莫不有憾。不同的不过是他们知或不知，知道得多或少罢了。谁也甩不脱遗憾，因为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谁也换不掉自己那份遗憾，因为从来到去，他一生的轨迹已定了他该属于哪种遗憾。所以，不妨从容坦然地接受、享有，反倒使遗憾退掉几分苦涩，多了几分恬适；使我们反宾为主，永远地笑对遗憾呢。

“注解”里的学问

王武子

静夜读书，最难选择读物。艰深晦涩之著，令人头晕脑胀；平淡浅显之作，又难开卷有益。处此两难的境地，以我个人的读书经验，不妨选读一些颇具学术意味的随笔注解文字。

注解可分为大注解、小注解，但不论是大或小，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唐德刚先生为《胡适的自传》做注，注文几至超过原文，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但这还只能算是“小注解”。何谓“大注解”？如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今人对其展开研究阐释。便是大注解。中国古代的几部经书，后世学者们不断进行研绎疏证，同样也是大注解。不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亦莫能外，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关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分析。就理论上言，也是一种注解。因此，从泛意义上讲，做学问也就是做注解。

把做学问简单地说成是做注解，似乎太小瞧了“学问”。其实不然。以中国历代学者治学论：汉儒治经，长于注疏，倘若没有汉代学者的一番努力，先秦诸子的精论宏议就很难昭昭于世。后人在研究古圣先哲的思想时，至少有格于字词上理解的困难。宋儒治经，重在义理，发挥微言大义，虽说多有穿凿附会，然诚如朱子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毕竟还是丰富发展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容。清儒治经，不满于自宋以降“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空疏学风，刻意纠弹此弊，以恢复朴实的汉学。但实际上，清学又是一路风格。汉儒治经儒生气重，清儒治经学究味浓，乾嘉诸老的考证学，其精密深邃已远迈汉唐。

寓学术见解于精微的考证之中，本是中国传统的治学特点之一。聪明的学者常常能于有形中无形外，表述自家的学识见解。而陋儒们则只会死记古训，不能越雷池，无怪有书橱、书簏、书痴一类的笑料了。不论是秦汉、唐宋、明清乃至近现代学人，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皆是希冀学能致用，把“体”与“用”的关系辩证统一起来。但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学者们。因而同一种思想学说，在彼时很盛行，在此时就不行，学者们往往得曲申己意，不能说其努力是徒劳。“皓首穷经”虽含讥讽之义，然能皓首穷经一实在也不易。所谓“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极言读书治学不容易。由于学者们学养功底、识断能力、思想倾向等各不相同，在治学风格上自然表现各异。如赵普注《孟子》，虽自称“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然观其所注孟，义理发挥良多，且多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孟学思想体系，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不无干系。康有为治“公羊学”，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藉托古求改制，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色彩。现代新儒家承接宋儒，注解“内圣外王”之学，意在“返本开新”。尽管他们有时显得陈义过高，或者其思想理论并不适用于今世，但他们那种经国济民的价值取向、以及以述为作、释古义倡新说的治学方式，仍是无可非议的。冯友兰先生有座右铭：“阐旧邦以开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好道出现代新儒家们道义承担的勇气，其精神境界不可谓不高。

早些时，曾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朱正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对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作注解，是一篇很好的注解文。朱文持之

有据，言之有理，就“孺子”和“千夫”之所指者，均作出了圆满的解释，令人信服。也许朱文只算是“小注解”，但它所显示出的学术思想价值，则实在并不小。

忍不住想说几句

热线电话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式，很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它丰富知识、寻求帮助和参与社会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话在人和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我个人来看，这种形式也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对于深化社会学研究大有帮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及时捕捉到这一新事物，组织国内较有影响的热线电话，策划出版了一套颇具特色的《人生热线夺标》丛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社会学的领域很大，对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分别产生了专门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等等，剩下来还没有专门学科去研究的领域就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天地。社会学理论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中国目前的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电话热线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社会学的理论要靠社会调查才能和实际结合起来。可是，要搞好社会调查，会碰到许多困难，如果我们向别人寻根问底，即使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也是不太会受人欢迎的。电话热线的出现，为我们作社会调查提供了不少的便利。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热线了解不同领域的人的新思想、新困惑，容易与被调查的对象深入交谈，取得信任，加强合作，获得的资料也才可能有较高的真实性。可以说，国内不同类型的热线电话相当于在空中架起了几十、几百个调查基地，为社会工作者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热线电话也是目前解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一种较好方式，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必要手段。热线电话服务也应该算是社会学的一种方法。从理论上讲，社会学可以满足社会上几个层次的需要，其中，最基层的就是为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基本知识，充实精神文明，帮助人们自觉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环境，步入发展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生活。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确实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单凭个人的经验和常识处理会碰到诸多困难，的确需要利用各方面专家的智慧来加以解决。热线电话这种方式，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限制，进一步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并且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因此，是值得大为推广的。我注意到，这套丛书的内容是非常之广泛的，有婚恋热线、文化名人热线、法律咨询热线、书友热线、专家旅游热线、儿童咨询热线、心理健康咨询热线、妇女健康热线、生活帮助热线等等，很有参考价值。它是对热线电话精神资源的一次再利用，更加有助于知识和经验的传播。相信，随着我国通讯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家用电话的普及，热线电话这种形式也将更加丰富和完善，热线电话将会继续热下去。

社会学是一种极其复杂，但又颇具研究和实践价值的事业，在未来的社会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愿《人生热线夺标》丛书会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一事业中来。

杨逢春

1998年10月

